

# 目 录

## “鲁尔危机”和德国革命形势的成熟

鲁尔冲突。德国的国际环境 .....	1
消极抵抗 .....	7
1923 年上半年德国的经济情况 .....	11
德共的政策和策略 .....	17
德国统一战线建立 .....	33
对消极抵抗的“背后打击” .....	41
两条战线上群众斗争的开始 .....	46

## 革命危机。无产阶级的失败

资本主义经济的破坏和瓦解 .....	53
8 月罢工。推翻古诺政府 .....	60
行动中的“大联合”。斯脱莱斯曼第一届内阁的危机和辞职 .....	67
9至10 月的悲剧 .....	77
反革命势力的胜利 .....	103
译者后记 .....	

## “魯尔危机”和德国革命形势的成熟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的头几年，整个资本主义世界都发生了深刻的政治危机。在许多国家、首先在德国，形势特别紧张——是一种革命的形势。1918年11月里德国爆发革命的时候，大战尚未宣告结束。随之而来的是：1919年1月的战斗、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1919年春夏两季的革命高涨、群众的政治积极性由于卡普叛乱而大为提高，嗣后，是1920年的苏波战争（曾激起群众性的抗议，反对再一次武装干涉苏联），1921年德国中部的战斗，最后，是1923年的革命危机。德国人民又处在革命前夕了。

### 魯尔冲突。德国的国际环境

帝国主义之间、特别是法德两国之间的矛盾，在1923年已形成为所谓的魯尔冲突；这种矛盾的日益增加，对于德国国内政治气氛的日趋紧张，有着决定意义。法比两国的军队借口德国没有支付已规定的赔款，占领了德国工业的心脏——莱因—魯尔工业区。

普恩卡尔政府所推行的政策，是根据下面两点决定的：法帝国主义力求在西欧大陆上确立自己的经济和政治霸权；害怕已战败的德国将来进行报复。

英国外交的两面派策略和美国统治集团的利己政策，对普恩卡尔的冒险行为，起了不小的促进作用。

外表上，英国政府装作冷淡旁观的模样，甚至要法国政府确信它是忠诚的，在法德两国冲突的初期更是如此<sup>①</sup>。可是，这样作并不影响英国政府在外交上暗地里促使法国遭到失败。寇松及其集团竭力煽起法德两国的冲突，希望它们互相削弱，这样，英国就可能在欧洲政治舞台上取得霸权。

欧洲国家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美国的帝国主义集团也就酝酿好了长远的计划。美国的外交在巴黎和会上遭到失败，主要是由于英法反对美国统治世界的计划的结果。当这两个欧洲国家采取一些一致的行动时，美国出来干涉欧洲事务，是没有取得胜利的指望的。

但是，在1922年末至1923年初期，英法的团结却发生了严重的裂痕。美国便力求加深这一裂痕，以便在欧洲引起危机，从而以“公正”仲裁者的身份来进行干涉。后来，美国拟定“赔款计划”的道威斯将军很有理由这样说：“法国不来到鲁尔，我们也就不会到这里来”（指欧洲）<sup>②</sup>。美国没有答复德国关于指责法国侵略行为的照会，反而采取了令人怀疑的观望态

① “德国人民党”的首领 F. 斯脱莱斯曼在1923年1月17日的日记中写道：“英国内阁毫无动静，很刻薄。对法国人毫无妨碍……” G. Stresemann. Vermächtnis. Der Nachlass in drei Bänden (“遗著三卷集”——译者). B., 1932—1933, B. I, S. 32 (以下称: G. Stresemann. Vermächtnis...). 社会民主党的政论家克维塞耳写道：“在能看透事物本质的人看来，鲁尔战争是贴有‘英国制’的商标的” (Sozialistische Monatsheft, 1923, №7, S. 399. 以下称: S. M. №……)。

② R. Dawes. The Dawes Plan in the making. With foreword by F. O. Lowden (“道威斯计划制订过程”，有罗慎写的“前言”——译者). Indianapolis. Bobbs-Merrill. Co. 1925, P. 185.

度，法德两国的冲突日益展开和加剧，美国并未加以阻止。同时，摩根曾通过自己的巴黎分行——同法国重工业银行“L'Union Parisienne”有着密切关系的“P. 摩根”，洛克菲勒曾通过“Банк де Пари ө де Ная-ба”（巴黎荷兰银行——译者）和“法美公司”，来协助法国的帝国主义集团为侵略德国作好准备<sup>①</sup>。

以斯丁纳为首的德国工业大王曾促使德国走上同法国发生冲突的道路。在H. 维尔特的“执行政府”<sup>②</sup>于1922年11月辞职之后，古诺—罗真别格<sup>③</sup>的“事务内阁”上台执政就意味着：1920年斯丁纳在斯贝会议上所宣布的“灾难政策”已经取得胜利。消极地向协约国支付赔款，就是这一政策的基础。

① K. Obermann. Die Beziehungen des amerikanischen Imperialismus zum deutschen Imperialismus in der Zeit der Weimarer Republik (“魏玛共和国时期美帝国主义与德帝国主义的关系”——译者) (1918—1925). B., 1952, S. 119.

② “执行政府”的目的在于：使德国根据凡尔赛条约所承担的义务逐渐化为乌有，并通过创造有利于德帝国主义的条件来准备复仇。——译者

③ 就政治倾向来说，古诺属于“德国人民党”和中派；卡普叛乱之前，他就参加了“德国人民党”。在经济上，古诺接近克虏伯—维登菲耳德集团，而这个集团同美国资本，特别同哈里曼和洛克菲勒又有着联系。古诺是“德美石油公司”（“美孚石油公司”的德国分支）管制委员会的委员和德美轮船公司的经理。这些关系，也成了古诺在对外政策的方针上亲美的基础。古诺在作政府首脑后不久的一次发言中曾声称：“他将使自己和数国在事务上的良好关系，为德意志国家服务”（Die Internationale. 1923, № 12, S. 335）。古诺同意解决和法国的冲突时，指望得到美国的支援（S. M., 1923, № 6, S. 334）。古诺政府的外交部长罗真别格是德皇的外交官，参加拟订过布勒絮特和约，他属于“德国人民党”的极右翼。担任经济部长职位的，是斯丁纳的走狗别克。古诺政府一上台执政，大资产阶级便公开执掌德国的政权了。

法国占领鲁尔的威胁，并没有使斯丁纳感到一点惊慌。斯丁纳有理由作这样的指望：法国占领西欧的工业中心，必然会使英法的关系紧张起来，复活德帝国主义的计划便能得到英美统治集团更有效的支持。

法德两国的工业家卢什尔和斯丁纳关于成立鲁尔—洛林煤炭钢铁联合辛迪加的谈判破裂以后，才发生公开的冲突。法国的垄断组织贪图得到预计的辛迪加 60% 的股票，鲁尔的大资本家却只同意给与 50%。“和平”交易没有成功。嗣后，双方都一心指望通过武力来实现自己的计划，并且为采取行动制造借口。

工人阶级的一致行动，是可以防止伦敦和纽约所煽动的法德垄断组织的争吵的。1923年1月6至7日在埃森举行的国际工人代表会议，就是一个尝试。这次会议，是为了反对法国占领和帝国主义战争的威胁而召开的。会议曾号召工人共同行动，阻止法国占领鲁尔。但是，国际无产阶级的统一战线，却被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的分裂分子破坏了。

德共对鲁尔被占领一事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早在1922年，当法德关系显然紧张了的时候，德共就曾建议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在反对法德侵袭威胁的斗争中，采取一致的行动。可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却拒绝了 this 建议。不过，尽管社会民主党的首领采取了这种立场，德国的工人阶级仍然一致表示决心，要防止侵略。1月7、8两日，格森基亨、杜伊斯堡、汉波伦、埃森等许多城市都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以表示抗议。

在这种情况下，德共曾再一次呼吁德国社会民主党和德

国工会联合总会建立工人的統一战綫。德共的建議<sup>①</sup>中指出，在魯尔占領的問題上，古諾的罪过并不亚于普恩卡尔；建議中还提出在德国举行总罢工，以便回击法国侵略势力的阴谋，并把賠款的負担加到有产阶级的肩上，以工人政府代替古諾政府等等。但是，德国社会民主党机会主义的领导者又拒絕了德共的建議，反而同资产阶级勾結在一起。这样，必然会削弱德国人民的反抗力量，便于法德两国的統治集团挑起魯尔冲突。

可見，魯尔危机乃是法、英、美三国侵略势力施行帝国主义阴谋的結果，乃是以斯丁納“人民党”为首的德国资产阶级采取挑撥行为的結果，——上述情况，是在社会民主党和改良主义工会的首領拒絕同共产党合作因而使工人阶级陷于分裂的情况下发生的。

魯尔冲突迫使欧洲面临着新的国际大屠杀的威胁。外国奴役的危險临到了德国头上。当法比军队强占魯尔的时候，德国东面的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只等待他們出动的信号。波兰外交部长斯克爾任斯基曾声称：“假若法国要我們共同行动，毫无疑问，我們会表示同意的。”<sup>②</sup>“真理报”当时写道：“波兰出动的危險是存在着。”然后，“捷克斯洛伐克也会掙脫鎖鏈的。”<sup>③</sup>德国受到敌对同盟的夹攻，在资本主义国家結成的陣綫面前，它是孤立无援的。希望落空了，古諾痛苦地說道：“在全世界，我們都是孤零零的。”<sup>④</sup>

① Rote Fahne(“紅旗”——譯者)，1923年1月11日。

② “真理报”，1923年1月24日。

③ 同上，1923年1月19日。

④ G. Stresemann. Vermächtnis, B. I, S. 41.

在这危急的时刻，德国人民得到了国际无产阶级、首先是它先进的先锋队——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强有力的支援。1、3月里，欧洲国家共产党在埃森和美因河上的法兰克福召开了两次代表会议，号召工人共同斗争反对国际资本家的帝国主义冒险行为。欧洲国家的共产党根据无产阶级革命团结的原则，一致决心要全力支持战斗的德国无产阶级。

在所有的国家中，只有苏维埃共和国断然发出了愤怒的呼声，抗议法帝国主义的侵略行为。1923年1月23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发表了告各国人民书<sup>①</sup>，苏联政府揭露了鲁尔危机的实质及其祸首。苏联政府把欧洲面临的流血威胁预告给各国人民，并号召他们积极争取和平。苏联全国都举行了抗议法国侵略者、保卫德国的群众性示威。苏联人民最热烈、最真诚地参加了鲁尔无产阶级的斗争，给他们以巨大的物质援助。1923年3月，苏联全国总工会曾送给德国10万金卢布和50万普特粮食。

同时，为了制止法德冲突蔓延，使它不致于扩大到全欧，苏联外交方面还采取了一些具体措施。为了同一目的，人民外交委员会的代表曾访问邻国的首都——华沙、里加、列维尔和科甫诺。苏联政府坚决建议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保持中立，并警告说，苏联决不容许对德国采取军事行动<sup>②</sup>。最后，德国东面的邻国尽管未曾同意签订正式的中立协定，但是，它们也不敢参加法国的冒险行动。

<sup>①</sup> “苏联对外政策文件汇编”，莫斯科，第2卷，1944年，第707页。

<sup>②</sup> “苏联人民外交委员会向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提出的1923年年度报告”，莫斯科，1924年，第42至43页。

在魯尔危机的初期，德国的国际环境就是如此。

### 消极抵抗

古諾政府宣布，对魯尔的被占领实行消极抵抗。德国从巴黎和布魯塞尔召回了外交代表。对法比两国停止了煤炭和焦炭的供应。魯尔区的德国企业，凡是它們的产品可能为占领国所利用的，則必須停工。魯尔的官吏、铁路工人及全体居民都得到命令說，不許执行占领当局命令。“魯尔战争”开始了。

在这次“战争”中，德国壟断資本家当然是最不考慮德国的民族利益了。他們追求着特殊的目的：以組織消极抵抗、把資本家和国家的利益混为一談的方式，来动員全德国的人民，保护資本家的利潤。在敌人面前表現的“民族团結”，必須成为一个压制法国資本家的工具，以便从他們手里，取得比1922年12月卢什尔提出的更为有利的交易条件。同时，由于政府撥款援助，消极抵抗便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发财致富和投机倒把的机会。

可是，这些自私的打算，都用肆无忌惮的“民族的”和“愛国的”煽动宣傳掩盖起来了。德国資產階級提出了“祖国在危險中！”的口号。占领魯尔曾比之于拿破侖对俄国的侵略<sup>①</sup>。1月14日，宣布为“举国哀悼日”。根据政府的命令，1月15日魯尔举行了半小时的抗議罢工。全国都卷到民族主义的集会和示威的浪潮里来了。形形色色的資產階級报刊，壟断組織的

<sup>①</sup> Deutsche Allgemeine Zeitung (“德意志总汇报”——譯者)，1923年1月18日(以下称：D. A. Z.)。



· 8 ·  
文人，都声嘶力竭地号叫着：必須忘記階級仇恨，而建立統一的民族陣綫，使“共和国与祖国”不至于受到“世仇”的侵襲。

和凡尔賽的耻辱一样，魯尔被占領一事也造成了法西斯运动及其“民族的”、“社会主义的”煽动宣傳猛烈高漲的局面。“魏瑪民主共和国”以及德国社会民主党和改良主义工会领导机构所推行的政策，使群众日益感到失望，反对卡特尔和資本主义的情緒在不断增长；德国极端反动的帝国主义势力力图利用上述情况，来破坏資產階級民主制，而用武力建立起財政資本絕對的专政。

法西斯的宣傳首先是要爭取中間阶层，因为它們是民族社会运动主要的群众支柱。就社会地位來說，正是这些居民阶层在政治上的愛憎最不堅定，这决不是偶然的。法西斯的鼓动分子到处許愿，根本不考慮还愿的問題，他們仅追求一个目的：尽量地收罗支持他們的人們。他們曾答应实行“托拉斯国家化”、“銀行国有化”、“取消股票資本”，保証“工人参与生产管理和利潤分配”，实行土地改革，“改善中間阶层的状况”，等等<sup>①</sup>。法西斯分子拼命装成从“凡尔賽桎梏”下爭取德国民

<sup>①</sup> 參閱：Chronik des Faschismus (“法西斯紀事”——譯者)，1924，№ 2，S. 22—23；以及下列論文：V. M. Walter. Die Landwirtschaft und der Faschismus (“法西斯与农业”——譯者) (同上，№ 4)；Das Program der völkischen Kampforganisationen (“人民战斗职工会綱領”——譯者) (同上，S. 23—24)；G. L. Alexander. Die Frauen und die Stahlhelm (“妇女与鋼盔团”——譯者) (同上)；K. 格依登：“德国法西斯主义的历史”，莫斯科—列宁格勒，1935年。在我們研究的这一时期，德国的法西斯运动尚未集中起来。在国内北部活动的是“德国工会”，在南部活动的，是希特勒的“社会民族工人党”。此外，还建立了許多更为細小的、具有民族主义色彩的集团(号称“Фёлькише” (民族的——譯者)以及法西斯的恐怖組織，它們具有分支很广泛的代理机关在萊茵区和魯尔更是如此。这些組織同国防軍的联系很密切，并且常常得到政府的補助。

族解放的“战士”，贴出一幅自己是民族思想的唯一代表这种动人听聞的广告。一部分在危机中遭到破产的小资产阶级参加了法西斯运动，他们希望去掉凡尔赛的锁链与危机的痛苦，摆脱破产与无产阶级化的命运。

社会民主党的报刊及其首領曾按照 1914 年 8 月 4 日的先例，和资产阶级结成统一战线，同资产阶级的宣傳唱着一个調子。該党的領導者承認过古諾政府“……并未体现德国意志不可分割的統一性”<sup>①</sup>，同时又公开放弃爭取社会主义原則的斗争<sup>②</sup>；他们仅仅爭取“参与管理”，建立“大联合”——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政府。社会民主党和工会的上层官僚不顾资产阶级上层統治者忽视这些要求的事实，仍然提倡资产阶级所宣布的“人民统一战线”。他们借口說，在敌人面前“分散力量”是危险的，而要求放弃两条战线上——反对德法两个帝国主义——的斗争。

1923 年 1 月里，德国工会联合总会、职员联合会和官吏联合会都曾表示支持政府。总罢工可能削弱政权的地位<sup>③</sup>，因此，1 月 23 日在柏林通过了放弃总罢工的決議。同时，工会的領導者和企业老板一道，組織了一系列具有民族主义性质的罢工<sup>④</sup>。

① S. M., 1923, № 1, S. 2. Гр. К. 哲維林格：“时机的要求”。

② Ф. 梅耶尔曾写道：“以后，社会民主党的实际政策不見得必須和社会化的要求有关。在目前，社会化的問題并没有实际的政治意义”（S. M., 1923, № 3, S. 150）。

③ “国际工人运动”，1923年，第 2 期，第 2 頁。

④ 同上，第 3 期，第 3 至 4 頁。

在社会民主党和改良主义工会积极的配合下，资产阶级的宣传曾一度在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旗帜下，把德国广大的群众，诱骗到帝国主义的鲁尔冲突中来。甚至有很大一部分工人，在谎言和“民族的”煽动宣传下，也曾站在同本国资产阶级保持“阶级和平”的立场上，反对过法国侵略者。由于法国军队迫害以梯森为首的六个大工业家而引起的罢工，最明显地表现了这一点。根据“Vorwärts”(“前进报”，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中央机关报)的报导<sup>①</sup>，15座大矿山在1月23日举行了罢工。为了表示抗议，梯森的企业里有65,000名工人于1月23日宣布了罢工<sup>②</sup>。“埃森矿业公司”和格森基亨的矿山、斯丁纳的“维克托里”等许多企业，都举行了罢工<sup>③</sup>。国家矿山联合工厂委员会决定成立被捕矿山主的“援救委员会”，并派遣该委员会去见法国占领军的司令德古特将军<sup>④</sup>。“Фр.梯森”矿山和“A.梯森”冶金工厂组成的工厂委员会代表团见到德古特以后，曾代表3万工人要求释放他们的“供养人”——梯森<sup>⑤</sup>。1月21日，鲁尔10万工人的抗议书交给了德古特<sup>⑥</sup>。

① “Vorwärts”，1923年1月23日。

② H. Spethmann. Zwölf Jahre Ruhrbergbau (‘鲁尔矿业十二年’——译者)，B., 1928—1931, B. IV, S. 105 (以下称：H. Spethmann; 上引著作……)。

③ 技术人员和职员离开了企业，可见，工人们在许多场合下是被迫举行罢工的。例如，斯丁纳矿山的情况就是如此(Rote Fahne, 1923年1月21日)。还查明了这样的情况：来到英国救打救梯森及其企业经理的代表团并没有一点工人授予的权限，他们是行政当局派去的(“国际工人运动”，1923年，第3期，第4页)。

④ “Vorwärts”，1923年1月20日。

⑤ Frankfurter Zeitung (‘法兰克福新闻’——译者)，1923年1月21日。

⑥ D. A. Z., 1923年1月23日。

根据改良主义者的倡議，抗議代表团也曾派往美因茲，当时，法国的軍事法庭正在这里审理被捕的企业主（資產階級报刊把他們吹嘘为“民族英雄”）的案件。

为了从經濟上支援消极抵抗，为了援助政府，德国社会民主党、德国工会联合总会、德国工业帝国联合会、德国雇主工会联合会以及“民族团結”的其他組織，便成立了“援助魯尔”（Ruhrhilfe）委员会。

“援助魯尔”的基金，是由社会上各个階級筹划的，用来支付罢工企业的职工的工資，賠償这种企业的老板的损失。同时，“援助魯尔”委员会是“埃夫里登”——改良主义者所吹嘘的劳資合作——的形式之一。

魯尔巨头的“爱国主义”，也得到了政府慷慨的报酬。德国国立銀行給了企业主总数达几十亿馬克的大宗貸款。由此看来，在魯尔冲突的初期，德国資產階級就在自己的“社会主义”走狗的配合下，把大部分人民，都暂时地引誘去追隨帝国主义政策了。

### 1923 年上半年德国的經濟情况

不过，“民族团結”的政策取得上述成就的基础，是极不穩固的，暫时的。从占領魯尔的最初起，國內的經濟生活就不斷遭到破坏；这就成为以后产生尖銳的階級斗争的最基本的原因。

1923 年經濟遭到破坏，在主客观方面，都有重要的前提。当法国的占領使德国失去煤炭总产量的 80%<sup>①</sup>、生鉄 76% 以

<sup>①</sup> 烏布利希：“德国的战后危机与 1923 年的事件”，“历史問題”，1954 年，第 5 期，第 62 頁（以下称：烏布利希：上引著作……）。

上、鋼鐵 82%<sup>①</sup> 以上的时候，当德国分裂为两部分——占领区和非占领区的时候，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首先是通货膨胀，还没有消除。工业发达的莱茵—鲁尔区，和德国其余的部分隔开了。国内各地区几十年来形成的经济联系，已遭到破坏。煤、铁等重要商品，几乎不运往德国的非占领区。在国内的两个区域里，外汇牌价和商品价格各不相同。占领军在德国西部的统治和消极抵抗所引起的后果是，生产急剧地下降。工厂和矿山先后宣告停工。1923年生铁的熔炼量，比1913年几乎减少了3/5，比1922年减少了1/2以上；煤的开采量，比1913年下降了1/2以上，比1922年下降了1/2；钢的产量，比1922年的水平几乎降低了1/2<sup>②</sup>。以1913年德国工业产量的指数作为100，1923年则只等于46.9%<sup>③</sup>。

由于大资产阶级的卖国政策，经济日益崩溃了。垄断资本家公开宣布：“今天谁只想到私利，谁就该枪毙”（梯森语），他们煽动民族主义的宣传，拼命地利用非常有利的形势，以便大发横财，并巩固自己在国内的阵地。

为了从财政上支援消极抵抗，政府曾给予鲁尔的大王们数十亿贷款：赔偿他们由于占领而遭到的损失，并付钱给停工的企业，发给失业补助费，还向罢工工厂的职工发“工资”。根据官方的统计，4月底以前已发出两万多亿纸马克<sup>④</sup>。这笔巨

① Wirtschaft und Statistik (“经济与统计”——译者)，1923，№ 2，S. 39（以下称：W. und St.）。

② M. H. 奥尔洛娃：“1924至1929年的德国”，莫斯科，1955年，第3页。

③ Э. Я. 布列格里：“资本主义国家的货币流通与信贷”，莫斯科，1952年，第245页（以下称：Э. Я. 布列格里：上引著作……）。

④ E. 瓦尔加：“1923年的世界经济和经济政策”，莫斯科，出版年月不详，第89页（以下称：E. 瓦尔加：上引著作……）。

款是在完全无人监督的情况下发给企业家的。常有这样的事：从“援助鲁尔”和“信贷援助”得到的、用来支付工资的贷款，却被壟断资本家用到通货方面捣鬼去了<sup>①</sup>。斯丁纳家族、梯森家族、克虏伯家族、沃尔夫家族这些巨大的集团，都抓住国家预算，他们一再要求新的贷款。结果，德国国立银行的黄金储备消耗很快<sup>②</sup>，国家预算的赤字大得惊人。在1923年上半年，国家大约平均能负担25%的开支，在6月中旬，能负担10%的开支，在6月底，则只能负担2%的开支了<sup>③</sup>。

财政日益遭到破坏，也是工业大王们无耻地拖税的结果；大家知道，税收是预算极其重要的来源。

1923年的头4个月，有产阶级在所得税总额中所占的比重不到5%，而对工资的课税则超过了80%<sup>④</sup>。为了负担国家日益增大的开支，政府只好不断地使用印刷机。结果，通货膨胀日益增长。

2月里，政府曾企图稳定马克。首先为了维持抵抗着的“统一战线”，这样作是必要的；通货膨胀引起经济混乱，“统一战线”就可能遭到破坏。政府的企图，曾取得某些暂时的、相对的成绩。1923年春季里（大约从2月7日至4月7日），马

① Berliner Tageblatt, 1923年4月25日；沃尔夫的3家公司曾使用作为工资的4亿马克的贷款，来进行投机活动(Rote Fahne, 1923年4月28日)。

② 在消极抵抗时期，德国国立银行的黄金储备减少了1/2以上。

③ E. 瓦尔加：上引著作，第110页。

④ E. 瓦尔加：上引著作，第40至41页；1923年3月里，所得税方面有95%的进款，是通过扣工资而得来的(E. P. 马恩里和K. H. 施瓦格-格瓦尔：“德国的支付能力”，莫斯科，1924年，第227页)。

克大概穩定在兩萬馬克換一塊美元的水平上。

暫時穩定通貨，有利于壟斷資本家：國家銀行給予他們巨額貸款（以穩定的馬克計算<sup>①</sup>），同時按照很低的牌價，把外幣和外匯拋到市場上去。搞金融的生意人，用政府貸給的紙馬克收買外幣和外匯。

假如穩定馬克的企圖獲得成功，得貸款的人又能用足值的馬克還清期票，那末，德國國立銀行也不會受到任何損失。可是，魯爾的大王們竭力避免的正是這一點。他們專門指望用貶了值的馬克償還帝國銀行的債務。為此，他們便走上了挑起通貨膨脹、使馬克無法穩定的道路。

在通貨的災難方面，斯丁納也是個主要的倡議者。3月15日，他對德國國立銀行穩定馬克的措施提出了抗議<sup>②</sup>。斯丁納不只是提出了空洞的抗議，而且通過大力收買外匯，使德國的通貨完全破產。4月12日，他向德國國立銀行買了6萬英鎊的外匯。同時，他要求政府在5至6月以前，還向他的企業支付55,000英鎊。照他的樣辦事的有O. 沃爾夫等金融巨頭。混亂的局面開始了。對紙馬克的信任已被破壞。買外匯的申請書大量散發，政府已無力加以滿足。結果，馬克的穩定遭到破壞而迅速地貶值了。後來曾多次企圖穩定馬克，都由於同樣的理由而失敗了。政府發行的兩億黃金公債，並未賣

<sup>①</sup> 通貨膨脹時期，帝國銀行曾幾次提高貸款的利息。可是，利息的提高跟不上幣值的貶值，這樣，債務人就占了便宜。例如，從1月18日至8月2日，德國國立銀行的貼現率根據以紙馬克計算的契約，已從12%提高到30%，即提高了2.5倍；可是，在這個時期，馬克本身的貶值大約為39%（G. H. 布列格利：上引著作，第224頁）。

<sup>②</sup> G. Stresemann. Vermächtnis. B. I. S. 42

掉。德国资产阶级只不过购买了公债的 1/4, 可是, 根据某些估计, 他们在国内掌握了约 30 亿金马克<sup>①</sup>。

通货膨胀恶性地增长着。4 月份, 一块美元大约等于两亿马克, 9 月里, 就等于 3, 800 万马克了。斯丁纳、沃尔夫之流所追求的, 正是这种情况。他们用已贬值几百万倍的纸马克, 来偿还国家的债务(借的是金马克)。例如, 他们在暂时稳定时期得到过两万亿马克(约 1 亿美元), 后来, 他们偿还这笔债务所花的马克, 只等于 1, 500 万美元。这样, 交易所的生意人在通货的投机上, 就发了 8, 500 万美元的横财<sup>②</sup>。通货膨胀, 为一小撮金融巨头集中资本和生产造成了有利的条件。这样, 斯丁纳便利用马克不断贬值的情况, 建立了一家具有许多国外分支的规模宏大的康采恩, 集中了大量的贵重物资。

在德国, 人们编了一个歌子<sup>③</sup>:

Kräftigen Beutels, kräftigen Sinnes  
Koalirt Herr Hugo Stinnes.  
Von dem Rohstoff bis zum Zeitung—  
Alles unter seiner Leitung.

通货膨胀和经济全面破坏(这已成为斯丁纳家族的威力日益增长的原因)一样, 对工人阶级和小资产阶级阶层广大群众的情况, 产生了极端有害的影响。生产急剧下降、原料不够

① “共产国际”, 1923 年, 第 26 至 27 期, 第 7285 页。

② E. 瓦尔加: 上引著作, 第 89 页。

③ 歌词大意为: P. 斯丁纳把坚定的思想和饱满的钱袋结合起来了。从原料直到报纸, 都受他支配。



等等所引起的后果,是失业现象日益严重。到4月底,全德国(鲁尔除外)仅有14.7%的企业全部开工<sup>①</sup>。消极抵抗宣布3个月以后,有1/17的工人完全失业,1/6的工人只工作一部分时间(4月份,有1/4的工人是这种情况)<sup>②</sup>。到6月,除鲁尔区以外,完全失业的大军已达1百万人,部分失业的则达3百万人<sup>③</sup>。失业工人(而且不是所有的失业者)只拿到一点点可怜的补助费,根本不够维持生活。日益增长的通货膨胀,使日用品的价格每天上涨,工人的工资不断减少。从1月中旬至3月,食物等商品的价格平均提高了300至400%<sup>④</sup>。5月里,甚至全德改良主义工会联合会的主席拉帕特也不得不承认,“工资的购买力只等于发生灾难以前的1/3。”<sup>⑤</sup>

① Rote Fahne, 1923年5月23日。

② S. M., 1923, № 4, S. 208; Rote Fahne, 1923年5月9日。

③ Rote Fahne, 1923年6月9日。

④ Die Internationale (“国际”——译者), 1923, № 5, S. 151. 下表可以说明物价显然已经上涨的情况:

	每磅食物的价值(以马克计算)	
	1913至1914年	1923年4月中旬
面包(口粮)	0.45	900
市场上的面包	"	1,800
黄油	1.30	9,800
鸡蛋(每个)	0.06	370
马铃薯	0.03	50
人造乳酪	0.50	3,600
牛奶(1公升)	0.20	960
食糖	0.20	1,200
猪油	1	8,400

(Die Internationale, 1923, № 9, S. 284).

⑤ “共产国际”, 1924年, 第3至4期, 第300页。

群众的貧穷和不幸在逐月增长，它們为国内革命情緒的高漲創造了客观前提。革命形勢已經成熟了。

这样，大資产階級就用自己的双手——資本主义社会发展的辯証法正是如此，破坏了本来就很虛幻而又易于分裂的“国民統一战线”的基础。

### 德共的政策和策略

1923年的局勢，向德共提出了复杂的政治性和策略性的任务。一方面，共产党人在法帝国主义侵略的面前，必須支持消极抵抗，何况占領的結果使工人階級的状况急剧恶化？德国人民已遭到損害的民族感情，也不容忽視。但另一方面，魯尔冲突又成了法德壟斷資本家利潤方面的爭端。后来，“Rote Fahne”曾公正地指出，德国資产階級进行法德战争，“并不是为了民族利益，而是为了10%的利潤”<sup>①</sup>。“国内和平”意味着，在国内反动勢力的地位日益巩固的同时，德国資产階級在冲突中占有的障地加强了，冲突就拖延下去，并且变本加厉了。从最初起，双方就有可能进行勾结，魯尔的巨头們就有可能公开出卖民族利益，这种情况后来也发生过。共产党人預見到这一点之后，曾公正地警告說：“敌人就在自己的国家里：那就是資本及其政府。”<sup>②</sup>切实反对法帝国主义，保护根本的民族利益，只有人民政府才能作到。因此，从德国方面說，只有革命民主的力量取得胜利，才能把魯尔战争完全变作正义战争

① Rote Fahne, 1923年1月8日。

② 同上, 1923年1月10日。

和國內戰爭。局勢決定了一條戰綫上鬥爭的策略，共產黨在1月中旬提出的“打敗魯爾和斯普累的古諾和普恩卡爾！”這一口號，就是上述策略的反映。

共產黨人揭露資產階級民族主義者的“愛國主義”時，曾號召“用同樣的力量”來反對法帝國主義及其同謀——德帝國主義<sup>①</sup>。在魯爾區的許多城市里，共產黨在兩條戰綫上作鬥爭的口號下，舉行了工人群眾大會。1月24日，在德共的領導下，埃森舉行了被佔領區工廠委員會的代表會議，參加會議的有187家規模極大的冶金企業的246名代表。這次會議提出了反對法德兩個帝國主義的具體要求，並通過決議，要從臭名遠揚的“解放委員會”召回所有的工人<sup>②</sup>。共產黨人反對為“援助魯爾”捐款，而號召大家交錢作為工人階級的革命基金（德共、工廠委員會全德革命委員會等組織的軍用基金）。為了具體、全面地研究黨的政策和策略，1923年1月底在萊比錫召開了德共的第8次代表大會。

用列寧的話來說，德共當時所面臨的任務是：“……尋找、探求和正確判定一種能夠引導群眾去作真正的、堅決的、最後的偉大革命鬥爭的具體道路或特別轉變關頭……”<sup>③</sup>

很自然，對當前時局的估計、統一戰綫和工人政府的問題必然成為代表大會注意的中心。

可是，在政策和策略的這些根本問題上，黨內並不是一致

<sup>①</sup> K. Zetkin: Gegen Poincaré und Cuno (“反對普恩卡爾和古諾”——譯者)，B.，1923，S. 13。

<sup>②</sup> “國際工人運動”，1923年，第2期，第5頁。

<sup>③</sup> “列寧全集”，中文版第31卷，1958年人民出版社版，第78頁。

的。在代表大会上，党的左翼<sup>①</sup>对那些甫见代表党的正式领导机构发言的右倾机会主义者——布兰德列尔、塔里格麦尔等人，展开了尖锐的斗争。台尔曼代表大会上的左翼少数派，提议把当前时局的估计问题作为日程上的第一项，因为日益明显的是：由于鲁尔的占领，德国空前的危机已经到来，不久

---

<sup>①</sup> 左翼所依靠的，是柏林—勃兰登堡、沿海地区、鲁尔的许多工业中心（“共产国际”，1924年，第1期，第398至402页）。可是，左翼反对派并不一致，而且不是一类的。柏林反对派处在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P. 菲雪尔、马斯洛夫等人）强烈的影响下，这些人是在入党内的，他们倾向于德国无政府主义工农党。这些知识分子常常发表“革命的”演说来夸耀，同时又散布消极情绪，不要大家参加无产阶级斗争的日常行动；他们反对为局部要求而斗争——以集聚力量的进行坚决的打击作为借口。例如，P. 菲雪尔在一篇论文中写道：“现在，德国的工人群众居于防御地位，精疲力竭，情绪消沉，并且心灰意冷”（“共产主义革命”，1923年，第10期，第64页）。这类议论对左翼很有利。例如，别特赫尔引用了菲雪尔上述说法，并很有理由地表示：在这种情况下能谈到什么斗争？（Die Internationale, 1923, № 7, S. 203）。

汉堡和鲁尔的反对派直接反映了群众的战斗情绪，他们充满革命意志，渴望采取行动。反对派的某些领袖、特别是台尔曼（汉堡）在统一战线、对待社会民主党工人的态度、局部要求等问题上，并不同意柏林左翼领导者的观点。可是，在党内的右倾危险日益增加的面前，真正的左翼和具有“小资产阶级革命性”的分子常常联合起来，采取共同行动。再者，总的说来党并未成熟，这时候，工人当中并没有十分有经验、思想上很成熟的领袖，因此，柏林反对派得以团结并领导德共内部的各种反对派别。同时，柏林反对派也不是一致的，其中有些人抱有更严厉批判菲雪尔—马斯洛夫领导机构的情绪（参阅：Die Internationale, 1923, № 8, S. 305; Die Internationale, 1924, № 2—3, S. 131）。在本文里，不带引号的左翼一般指德共内部反对布兰德列尔的左派；带引号的左翼，首先指的是菲雪尔—马斯洛夫集团和他们的志同道合者。还要注意的，在工人群众的强大压力下，德共柏林混乱的领导机构在某时某刻，提出过许多合理的要求。

以后，德共的使命将是领导工人阶级夺取政权的革命斗争。

但在右翼的影响下，代表大会并未专门研究“鲁尔问题”，而仅仅简要地报导了鲁尔的情况。后来，台尔曼在共产国际第5次代表大会上指出德共左翼和布兰德列尔分子在估计鲁尔占领的事实本身方面所表现出的原则分歧的时候曾说道：“我们要求，把鲁尔占领和德国革命危机加剧的问题列为日程上的第一项。莱比锡代表大会上的大多数人声称，当然，占领的问题是一件大事，但是，无论如何，先讨论这事件本身仍然是不应当的。党必须从鲁尔占领一事中做出的一些结论，大多数人都想加以回避。”<sup>①</sup>

由此可见，鲁尔危机可能成为引导群众进行革命的起点，这个意义并未及时地被了解到。不仅右翼机会主义者、而且党内许多因革命事业而著名的积极活动家（例如蔡特金等人）；都未能立即抓住国内的新情况，抓住群众积极性高涨的情况，而仍然以1922年共产国际关于革命低潮所通过的、业已不适合德国具体情况的决议<sup>②</sup>作为准则。后来台尔曼曾指出，这一点乃是“第一个严重的政治错误，它必然会引起一系列的错误。”<sup>③</sup>从最初起，党就没有认真地准备推翻资本的统治，没有动员群众进行革命。

#### 其他的重大问题——关于统一战线和工人政府的问题

<sup>①</sup> E. Thälmann. Reden und Aufsätze(“言论与著作集”——译者)，B. I, S. 68(以下称：E. Thälmann: 上引著作……)。

<sup>②</sup> 许多“左派”和右派把德国的局势和1905年革命后俄国的情况相提并论。在党内争论时，他们甚至互相用“召回派”和“取消派”的称号来称呼(Die Internationale, 1923, № 8, S. 235; № 10, S. 307)。

<sup>③</sup> E. Thälmann: 上引著作，第1卷，第68页。

題——能否解決，在很大的程度上，也就為上述情況所決定了。

由於德國中部無產階級3月發動(1921年)的失敗，便迫切地要求認真改變黨在黨外工人中的工作，要求建立群眾性的德國共產黨。

由於德國共產黨和德國社會民主黨在選舉中取得了勝利<sup>①</sup>，由於後來改良主義工會和社會民主黨內的革命派日益加強，關於統一戰綫和工人政府的問題便有了具體的依據。

由於反動勢力的囂張和德國外交部長B. 拉捷納烏的被殺，德共在1922年曾開始採取一些實際步驟，以實行統一戰綫的策略。不久(1922年11月5日)，薩克森議會舉行了選舉，結果共產黨人和社會民主黨人得到了50個席位(社會民主黨人——40，德共——10)，資產階級政黨只得到46個席位<sup>②</sup>。這樣就造成了建立共產黨—社會民主黨人政府的機

① 1921年9月選入紹林吉亞議會的，有6個共產黨人和22個社會民主黨人(共28人)，各資產階級政黨的議員為26人。1922年1月在不倫瑞克市的選舉中，共產黨人和社會民主黨人在議會中總共得到31個席位，資產階級政黨只有29個席位。在薩克森議會中，德共與社會民主黨人從1921年起就擁有大多數。在盧卑克，經過1921年11月13日的選舉以後，工人政黨所得的票數和資產階級政黨相同(45比45)。關於建立工人政府的談判，甚至都開始了。在許多地方，共產黨人和社會民主黨人在市政、地區和行省的管理機關的選舉中，都得到了大多數選票(在萊比錫、德累斯登、紹林吉亞的某些公社以及丕姆尼茲等地)(Bericht über die Verhandlungen, 111 (8) Parteitag der Kommunistischen Partei Deutschlands (德國共產黨第3(8)次代表大會，關於談判的報告——譯者)，B., 1923, S. 41—45; 以下稱：111 (8) Parteitag KPD……)。

② W. Fabian. Klassenkampf um Sachsen. Ein Stück Geschichte 1918—1930 (“薩克森階級鬥爭，1918—1930年史”——譯者)。Verlag der Ostsachsen—Druckerei Löbau, 1930, S. 126 (以下稱：W. Fabian; 上引著作……)。

会。选举以后，薩克森議会的社会民主党党团曾向共产党党团提出問題，問共产党人是否准备参加“以帝国和区的宪法为基础”<sup>①</sup>的政府。德共在薩克森的組織，曾提出必須作为建立工人政府的基础的十條綱領<sup>②</sup>。除要求保留8小时工作制、必須保証供給居民煤炭、馬鈴薯和面包等等以外，共产党人还坚持（第7、9两条）要武装无产阶级（建立无产阶级的“战斗队”并加以武装），要工人政府对工厂委员会的代表大会負責。这些要求薩克森的社会民主党人并没有接受<sup>③</sup>。但是，議会的共产党党团声称：在一定的条件下，愿意支持社会民主党人政府。結果組成了布克—里平斯基的社会党人政府，在議會中，这个政府所依靠的是共产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的选票。

可是，1923年1月30日在薩克森又发生了政府危机。布克內閣宣布辞职。曾试图建立新的政府，可是很长时期沒有产生效果，因为每个党团都提出了自己的候选人，而其中任何一个人都沒有得到必要的多数。解散議會而进行重选的問題便出現了，資产階級政党特別坚持要这样作。这些政党指望

① W. Fabian: 上引著作，第127頁。

② Die Bildung der linkssozialdemokratische Regierung in Sachsen. Eine Material-Zusammenstellung (“薩克森左派社会民主党政府的建成，資料汇编”——譯者)。B. o. J. S. 14—15. (以下称：Die Bildung...)

③ 甚至在大家都已知道，薩克森的社会民主党人已經拒絕共产党人最重要的要求(第7、9两条)的时候，德共出席共产国际第4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团在最初大多数人还是贊成共产党人参加薩克森政府的，只有4票表示反对。只是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和列宁本人加以干預以后，参加政府一事才被否決 (Die Internationale, 1924, № 2—3, S. 103)。

利用“社会党人内部”的爭吵，利用籠絡群众的民族主义情緒和“爱国主义”情緒，来取得胜利。通过建立依靠共产党人支持的工人政府或是新的社会党人政府的途徑，业已出現的僵局也是可以打开的。

这样一来，关于統一战綫和共产党人同社会民主党人合作的形式問題(薩克森問題)，在第8次代表大会上，便作为德共实际政策中的問題而提了出来，这个問題是具有原則意义的。

然而，德共党员对于統一战綫和工人政府的实质和任务的估計并不是一致的。再者，左派、特别是右派都曲解了全部問題。只有台尔曼及其志同道合者(当时人数还不多)，找到了正确解决一系列問題的方法<sup>①</sup>。恰恰相反，許多“左派”实际上都反对和社会民主党人取得一致行动，仅仅把統一战綫的策略看作是“战略上的巧計”、接近工人們的“公式”以及鼓动和动员群众的方法；他們預先就否認通过一些什么方式和

---

① 和“左派”相反，台尔曼及其同志曾提出是否参加工人政府，应以解决武装工人的問題与否为轉移(Die Internationale, 1923, № 4, S. 114)。在代表大会上，台尔曼确实声明过：作为争取无产阶级专政的斗争中一个阶段来说，工人政府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这个政府应当依靠武装起来准备斗争的群众的战斗积极性。当时台尔曼說，“如果有誰說想，捍卫工人政府可以采取合法的途徑，而不需要无产阶级作斗争的話，那末，他就会看到(der wird erleben)：一有机会，资产阶级就会叫这种坐上內閣安乐椅的工人去見閻王的。只有在这个政府內部，工人阶级已經如此强大，能够用自己的专政来对抗资产阶级专政的时候，工人政府才会具有生命力”(III(8) Parteitag KPD, S. 289; S. 358)。



社会民主党进行合作的实际可能性<sup>①</sup>。

对于从統一战綫全部策略中作出的一个必要的結論——“工人政府”的口号，德共的“左派”就这样錯誤地加以解釋了。共产国际第 5 次代表大会和第 3 次全体會議都把工农政府和社会党人——共产党人政府看做是夺取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起点”<sup>②</sup>，看做是“通往无产阶级专政的途徑”<sup>③</sup>；“左派”違反

---

① “左派”的观点，在“Materialien zum V. Weltkongreß der Kommintern, B., 1924”中，表述得最清楚，也最全面。有趣的是，“左派”关于統一战綫和工人政府的策略問題的一些表述，几乎一字不差地列入了共产国际第 5 次代表大会的決議。柏林“左派”的机关报——“Taktik und Organisation”（“策略与組織”——譯者）也是站在類似的立場上說話的；最初，这种报是“Rote Fahne”的附录，从 1924 年起，它就用“Der Funke”的名称单独出版了。还参閱：德共第 8 次代表大会的決議（111(8) Parteitag KPD, S. 145—150，以及 Die Internationale, 1923, № 3, P. 菲爾尔的論文；Die Internationale, 1924, № 10/11, Sonderbeilage）。“左派”要求立即夺取政权，否認在通往无产阶级专政的道路上存在中間阶段（Zwischenstufen）的可能性（例如，共产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联合組成的政府）。只有在推翻资本的統治以后，“左派”才考虑建立工人政府的問題。在这个問題上，季諾維也夫实质上是同意“左派”的观点的。早在 1922 年 6 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举行的扩大会議上，季諾維也夫就曾把“工人政府”說成是“苏維埃共和国的別号”（“共产国际第 5 次代表大会速記报告”，第 69 頁）。在 1924 年討論“德国問題”的 1 月代表會議上，季諾維也夫曾承認自己的立場是錯誤的（Die Internationale, 1924, № 2/3, S. 36）。可是，在共产国际第 5 次代表大会上又出現了“左的”說法：“在共产国际看来，——代表大会的決議中說道，——‘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譯成革命的語言和人民大众的語言，就成为‘工农政府’这一口号”（“共产国际第 5 次代表大会速記报告”，第 2 部分，莫斯科——列宁格勒，1925 年，第 45 頁）。

② “1919 至 1932 年共产国际文献”，莫斯科，1933 年，第 302 頁。

③ 同上书，第 371 頁。

这些会议的決議，而死硬地認為“中間阶段”沒有必要，并作出这种解釋：“无产階級专政”的口号譯成革命的語言和人民大众的語言，就成为工人政府这一口号。實質上，这就是越过运动中的困难阶段和复杂任务的冒充革命的策略；上述策略沒有考虑到德国的现实环境，忽視了根据群众自身的政治經驗来“引导群众进行革命”（列宁語）的必要性。这种“左傾的”立場帶有强烈的宗派主义和冒險政策的气味，严重地妨碍了广大的劳动群众团结到德共的周圍，不利于动员全部民主力量去反对壟断組織的統治和外國的侵襲。

德共的右派分子在布兰德列尔和塔里格麥尔的领导下，在共产国际的代表拉德克等人的支持下，用露骨的机会主义精神，解釋了統一战綫和工人政府的問題。

實質上，德共的右派分子把統一战綫理解为同社会民主党（实际上是該党的上层分子）組成的毫无原則的集团和联盟，社会民主党被描写成“資产階級的左翼和无产階級的右翼”<sup>①</sup>。工人政府被看做是在資产階級民主的範圍內，通过資产階級国家来推行工人政策的一种嘗試<sup>②</sup>。布兰德列尔分子在代表大会上硬說，資产階級共和国“和平轉为”工农国家似乎是可能的。这是一种对于馬克思主义的国家和社会主义革

---

① Die Internationale, 1924, №2/3, S. 102; 同上, № 10/11, Sonderbeilage.

② 111(8)Parteitag KPD, S. 420。德共热奈代表大会曾报导，早在1921年，布兰德列尔就曾写道：在“魏瑪宪法的基础”上，实现无产階級专政在理論上是可能的(Bericht über die Verhandlungen des 2. Parteitages der KPD (“德国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关于談判的报告”——譯者) B., 1922, S. 222.

命理論的修正。

烏布利希写道<sup>①</sup>，尽管代表大会上絕大多数人完全不同意右派的立場，但起草委员会在討論決議时，却向布兰德列尔分子妥协了；由于某些成員采取調和的立場，另一些成員的經驗不够，布兰德列尔分子便得以偷运自己的路綫。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号称为“关于統一战綫和工人政府的策略的指示<sup>②</sup>”的決議，是根据右派的精神拟成的，这个決議变成了在薩克森和紹林吉亚同右翼社会党人进行机会主义联合的起点。

这样一来，右派便在代表大会上取得了胜利。在反对党内左右傾的決議中，重心是摆在批判左傾方面的，这份文件上說道<sup>③</sup>：“机会主义总是以左的外衣出現的”。在代表大会选出的中央委员会中，布兰德列尔的伙伴們占了絕大多数<sup>④</sup>。

由此可见，茨比錫党代表大会表明了德共在政治上是不够成熟的，德共的队伍并不团結，沒有馬克思主义的有經驗的干部。这次大会并沒有完成摆在它面前的、动员全党和工人阶级去迎接即将到来的革命战斗的任务，也沒有正确地指出德国事变发展的远景。

代表大会召开以后，在实际执行大会決議的进程中，党的主要口号——結成統一战綫反对法西斯主义、結成統一战綫

① 烏布利希：上引著作，第65頁。

② III (8) Parteitag KPD, S. 415。

③ 同上书，第419頁。

④ 德共中央委员会中，左派仅有3个代表。后来在共产国际的建議下，中央委员会以自行加聘的方式，曾三次补充反对派的拥护者。这样，5月里中央委员会已自行加聘4个新委員，包括台尔曼在內。

反对古諾和普恩卡爾、同時在兩條戰綫上展開鬥爭，日益被中央的布蘭德列爾分子用機會主義的精神加以歪曲了。

1923年2月里，在共產黨的理論刊物“國際”<sup>①</sup>（編輯是塔里格麥爾）上，出現了編輯部的一篇論文“魯爾戰爭中的幾個策略問題”，里面提出了德國資產階級在魯爾沖突中具有“客觀革命性”的說法。後來，塔里格麥爾曾論証這種概念<sup>②</sup>，他從資產階級似乎在“捍衛”本國的民族利益之中看出了資產階級的“革命性”。塔里格麥爾寫道：“由於1918至1919年社會主義革命的失敗，德國社會主義革命應當扮演的角色便由古諾、斯丁納之流來擔任了。”<sup>③</sup>實質上，這是高唱“國內和平”的文人的濫調，是拒絕在兩條戰綫上作鬥爭的政策，使黨失去方向。由於塔里格麥爾的言論，共產黨的報刊上展開了熱烈的爭論並不是偶然的<sup>④</sup>；在爭論的過程中，革命派的代表曾揭露這樣提出問題的機遇主義。以B.什普克爾為首的魯爾組織，拒絕了塔里格麥爾的路綫<sup>⑤</sup>。德共法蘭克福區委會，支持了反對塔里格麥爾的佐麥爾所採取的立場<sup>⑥</sup>。

同時，對於把德國革命的民族任務和社會任務結合起來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對於解決歷史上早已成熟的、把民族傳統和民主傳統統一起來的問題——建立社會力量對德國進行革

① Die Internationale, 1923, № 4, S. 99.

② 同上，第8期；“共產國際”，1923年，第25期。

③ “共產國際”，1923年，第25期，第6861頁。

④ 參閱：Die Internationale, 1923年，第4、7、8、11等期；“共產國際”，1923年，第25期。

⑤ Rote Fahne, 1923年1月23日。

⑥ Die Internationale, 1923年，第7期。

命改造这个过程中的基本环节之一——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德共并没有彻底的了解。

德共薩克森领导机构所推行的，也决不是革命的策略。

已經指出，“薩克森問題”早在党的第8次代表大会期間，就很尖銳地提出来了。政府危机延长了一个半月以上。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內，特别是薩克森組織內，对“国内和平”政策的不滿情緒日益增长<sup>①</sup>。在德累斯登区的非常代表大会（1923年3月4日）上，不願社会民主党帝国管理部和薩克森右翼社会民主党人首領所提出的要求，通过了拒絕（85票对30票）和資產階級政党联合的決議<sup>②</sup>。大会选出了由左翼社会民主党人組成的“七人委员会”，以便就共同建立政府或者由共产党支持社会党政府的问题和德共进行談判。經過长期談判以后，“七人委员会”認為有可能接受薩克森共产党人所提出的、关于支持社会民主党新政府的許多条文<sup>③</sup>：（1）关于大赦某几

<sup>①</sup> 社会民主党的领导机构所鼓吹的“民族团结”政策，使某一部分党员感到不滿。根据“Leipziger Volkzeitung”統計，有20多家社会民主党的报纸坚决抗議在援助魯尔方面同企业主进行合作，并要求建立社会主义的統一战綫。“Leipziger Volkzeitung”写道：“和形形色色的法西斯分子、警察、部长們的杀人犯以及民族主义者結成統一战綫！和格里弗里赫、布列、埃尔哈尔德特及希特勒結成統一战綫——我們謝謝了！”（引自 Rote Fahne, 1923年1月19日）。五金工人工会和萊比錫工会卡特尔都有反对“援助魯尔”的情緒（“国际工人运动”，1923年，第3期，第3頁；第7期，第1頁）。

在薩克森，許多企业的工人都通过了決議，要求根据共产党的建議組成工人政府（Die Internationale, 1923, № 7, S. 190）。

<sup>②</sup> Die Bildung..., S. 20。

<sup>③</sup> Die Bildung..., S. 3—5; 还參閱: P. Bötcher, Die Regierungsabildung in Sachsen (“薩克森政府的組成”——譯者) (Die Internationale, 1923, № 7, S. 196—198)。

类犯人的法令和赦免政治犯的几項条例、(2)在各个巨大的居民点(10,000人以上的)里,建立反对物价高涨和投机活动的机构,建立管制物价的机构;其中也应当包括管制委员会。(3)政府必须提出建立“工人议院”(Arbeiterkammer)的法令。(4)建立无产阶级防御性的联合义勇队,以便保护游行、集会和工人组织的财产。

分析一下协议就可以看出,在谈判的过程中,共产党放弃了一系列的基本要求。例如,在工人政府要对革命工厂委员会的代表大会负责这一问题上,共产党就作了让步。用来代替的是双方达成了关于建立所谓“工人议院”——议会附属的、具有一定权利的一个谘议机关<sup>①</sup>——的协议。社会民主党人暗中建议成立“工人议院”,以代替工厂委员会的代表大会,其目的在于破坏生产委员会的思想,使这一思想庸俗化,把工厂委员会的代表大会葬送掉,并散布工人已“参加”管理的幻想。事实上,在武装工人的问题上,共产党人也被迫作了让步,因为所建立的防御性组织“同宪法是完全吻合的”<sup>②</sup>:这种组织没有警察的职能,没有武装。这个协议,实际上是实现了布兰德列尔这样的公式:“在共和国的基础上”,“在资产阶级国家的范围内推行工人政策”。

萨克森新的内阁首脑蔡格涅尔所发表的政府声明(4月20日)<sup>③</sup>,也充满了同样的精神。蔡格涅尔虽答应促使“私有

① 议会的议员,必须在根据工厂委员会的法令可以建立工厂委员会的企业里选举出来。

② W. Fabian: 上引著作,第133至134页。

③ 同上,第135页; Die Bildung..., S. 27--32。

經濟變為公共經濟”<sup>①</sup>，同時，又不能不對現存的無產階級百人團表示不滿。他聲稱：“有一個方法可以使這些防禦性的組織成為多餘的東西。託國家來反對法西斯組織吧。”<sup>②</sup>嗣後，議會的共產黨黨團對政府的宣言，發表了一個奉公守法的聲明<sup>③</sup>。

也許，共產黨人支持薩克森社會民主黨人政府的問題是由于環境的關係，共產國際曾表示贊同<sup>④</sup>。但是，共產黨揭露社會民主黨人包括“左派”在內的政策不夠，甚至在原則問題上也作了退步，德共領導機構在準備全黨和群眾進行革命戰鬥的問題上所表現的積極性不夠——這一切使工人們關於和平過渡到社會主義的幻想（如同蔡格涅爾和一切社會民主黨人所答應的）加強了，促使一些人仍然信任社會民主黨的首領，也不利於動員群眾團結到德共的周圍。

機會主義對統一戰線策略的曲解，遭到了左派的批判。代表大會召開以後，德共黨內的鬥爭加強了。一些巨大的黨組織都反對中央委員會的路線。勃蘭登堡區德共委員會和柏林—勃蘭登堡中央委員會，都曾指責黨領導機構的“薩克森政策”，要求在工人政府的問題上不要玩弄機會主義的把戲，

① W. Fabian: 上引著作, 第 135 頁。

② H. Gast. Die proletarischen Hundertschaften als Organe der Einheitsfront im Jahre 1923 (“1923 年無產階級百人團——統一戰線的組織”——譯者)(Zeitschrift für Geschichtswissenschaft (“歷史科學”——譯者), 1956, Heft № 3, S. 444, 以下稱: H. Gast: 上引著作)。

③ W. Fabian: 上引著作, 第 139 頁。

④ 參閱“關於德共內部意見分歧問題的決議”(“共產國際”, 1923 年, 第 25 期, 第 6848 頁)。

要求召开工厂委员会的代表大会，要求在蔡格涅尔政府对工厂委员会代表大会负责、武装工人而解除反革命组织武装的条件下，给这个政府以支持<sup>①</sup>。值得强调指出的是，德共在萨克森的政策从下列三点来看是危险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队伍革命化的过程受了影响；工厂委员会的运动受到了打击；“工人政府”的口号遭到了破坏，因为已造成一个幌子，似乎萨克森现有的社会民主党政府，也就是真正的工人政府。

3月在埃森举行的莱茵兰—威斯特法里亚区的党代表大会，就党的政策和策略问题，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出席代表大会的，有中央的代表蔡特金（作了主要的报告）和汉堡、柏林反对派的代表——台尔曼和P. 菲雪尔。左派批评了党中央的路线，并在提出的决议<sup>②</sup>中指出：德共没有采取明确的立场，没有向无产阶级指出当前的任务。要尖锐地提出必须加紧准备夺取政权的问题，建议作为具体的斗争目标的是，必须从管制物价和向居民分配煤炭与粮食，转为监督生产，占领企业。决议中着重指出，无产阶级自卫组织的加强，乃是斗争取得胜利的重要条件之一。左派的决议，被微弱的多数票所否决了。

可见，讨论是围绕党的政策和策略上的具体问题进行的。3至4月间，意见分歧和党内派别斗争都十分严重，存在着分裂党的威胁。柏林、汉堡、法兰克福和科伦等城市，都对党中

<sup>①</sup> Die Internationale, 1924, № 10/11, Sonderbeilage, S. 6—7; 还参阅: Die Bildung..., S. 24—28.

<sup>②</sup> 同上, S. 9—11。在估计党中央的“萨克森”政策时，决议实际上重复了共产党柏林—勃兰登堡组织的观点。



央的政策提出了严厉的抗議书。因此，在共产国际的促使下，德共中央和反对派之間于4月5至7日<sup>①</sup>，召开了“和解會議”。在討論的过程中，曾确定調解与爭取党的統一是一必要的。在一致通过的決議中說道：“反对派和党的大多数人都有义务采取一切必要的手段，来阻止破坏这一合作的一切人們进行活动。”<sup>②</sup>

但是，党內的情况并无变化。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再一次地试图使德共的情况正常起来。5月初，在莫斯科召开了德共中央和反对派之間的第二“調解會議”。就爭論的問題进行了討論，結果一致通过了一項決議；里面承認說：“策略上現有的分歧并不很大，不会妨碍党的少数派和党的多数派进行合作。”<sup>③</sup>同时指出：德共中央尽管有种种失策之处，但仍然是“无产阶级的一个革命机关，应充分地得到共产国际和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工人的信任和支持。”<sup>④</sup>

① Die Internationale, 1923, № 8; 同上, 1924, № 2/3, 第130頁。

② 同上, 1923年, 第8期, 第236頁。

③ “共产国际”, 1923年, 第25期, 第6849頁。

④ 同上。決議中无条件地贊同德共在薩克森的策略(第6850頁), 这是一个錯誤。对于德国资产阶级在魯尔冲突中的作用估計得不准确——說德国资产阶级被迫推行了“革命政策”(第6853頁), 这和塔里格麦尔关于“资产阶级的客观革命性”的論点等等, 乃是一个論調。

同时，決議公正地譴責了右派在萊比錫代表大会上提出的下列公式：必須迁就“社会民主党工人的幻想和偏見”，可以“依靠現有的国家机关来推行工人政策”(第6844頁)。左派往往过高地估計了革命事件的发展速度，他們口号中的弱点已被看了出来。例如，左派关于在魯尔占有企业和控制生产方面(以后，这类行动再扩展到全国)提出的3月的“当前要求”，未必是及时的，因为在当时，群众的革命运动刚刚开始，接受左派的口号只会使共产党的情况更为复杂。決議中对“牵制群众”的策略提出了警告；这个文件中說，党“力求推迟斗争”，就会“无法在全国的范圍內，动员广大的群众来支持薩克森政府”(第6851頁)。

正象決議的其他原則一樣，這些原則也證明，從組織和動員群眾進行鬥爭的觀點來看，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在決定性的時刻里，並沒有估計到布蘭德列爾分子所進行的右傾機會主義歪曲的嚴重性，也沒有傾聽左派的呼聲，因而對於德共以後的許多失策和失敗，是負有一分責任的。

當不幸的“魯爾真相”日益暴露的時候，當民族主義的浪潮（在魯爾剛被占領的時候，這股浪潮本來就衝擊了大部分德國人民）開始退落因而發揮了群眾的革命積極性的時候，德共的情況簡單說來就是如此。在“堡夫里登”的廢墟上，無產階級的統一戰綫逐漸建立起來了。

### 德國統一戰綫的建立

由於德國的特殊情況，各種政治派別——工廠委員會、管制委員會、無產階級百人團——的下層工人進行合作便產生了特殊的組織形式。

隨着群眾的革命熱情在改良主義工會和社會民主黨同企業主和政府“團結一致”的條件下日益加強，工廠委員會<sup>①</sup>的作用便不斷地增長了。工廠委員會，成了無產階級的、組織和團結工會會員和各個政黨以外一切工人的主要的階級機構。工廠委員會積極爭取整個無產階級的共同利益，主動組織無產階級的互助，它們是統一戰綫的有威望的體現者和宣傳家。與共產黨影響下的革命工廠委員會有關連的問題，首先就是這一些。1923年上半年，工廠委員會活動的中心是選舉鬥爭的問題（1至3月改選了工廠委員會）；1923年德國無產階級在它們的領導下，舉行了一系列大規模的發動——魯爾的5月

罢工、西里西亚的斗争、推翻了古诺政府的8月罢工等等。工厂委员会也成了反击法西斯匪徒的组织者。莱茵兰—威斯特法里亚工厂委员会的委员会，主动召集了两次反对鲁尔占领的国际代表大会。按照事变发展的逻辑，工厂委员会应当从提出

① 体现着企业苏维埃这一思想的工厂委员会(Betriebsräte)，是在1918年11月革命的进程中产生的。在群众的进攻下，工厂委员会在魏玛宪法中已经“合法化”。1920年颁布了关于工厂委员会的法令；根据这道法令，至少有20名工人的企业均享有选举工厂委员会的权利。有20至49名工人的企业可选出由3人组成的工厂委员会，有50至99名工人的企业——5人组成的工厂委员会，有100至199名工人的企业——6人组成的工厂委员会，类推；工厂委员会的人数最多不得超过30人。根据工厂检查处的报导，德国拥有选举工厂委员会权利的企业，有340,000个。

有20至50名工人的企业——170,000个

有50至200名工人的企业——130,000个

有200至1,000名工人的企业——40,000个

超过1,000名工人的企业——2,000(“共产国际”，1924年，第1期，第289页)。

在1920年10月举行的全德第一届工厂委员会代表大会上，通过了工厂委员会在改良主义工会的范围内联合起来的原则。工厂委员会，被看作是在企业里执行工会基本职能的机关，看作是工会的“据点”。但是，与立法者的思想相反，与工会和德国社会民主党首脑的意志相反，工厂委员会在国内革命高潮日益增长的过程中都革命化了。除了根据工会路线建立的工厂委员会联合会以外，还出现了(最初是在地方范围内)工厂委员会的革命委员会：柏林的“15人委员会”，绍林吉亚、萨克森、瓦塞尔康特的工厂委员会联合委员会，莱茵沿岸威斯特法里亚“21工厂委员会的委员会”，等等。工厂委员会的这些地方委员会和省级委员会曾向根据工会路线建立起来的委员会展开激烈的斗争，它们力图使工厂委员会的工作具有革命内容。由于这一运动的成就，柏林的工厂委员会便主动地召开了革命委员会的第一届代表大会。大会是在1922年11月召开的。出席大会的，有2,000个(340,000个里面的)工厂委员会的代表。革命工厂委员会的帝国委员会成立起来了(“共产国际”，1924年，第1期，第383至389页)。

純粹的經濟要求的发动，轉入直接的政治斗争。莱茵区、薩克森、紹林吉亚和柏林的工厂委员会，都很积极地展开了活动。1923年6月，德共中央向工会国际提出的报告中說道：“实际生活表明，工厂委员会运动比德共及其工会支部更受欢迎。”<sup>①</sup>

工厂委员会成了建立监督委员会和无产阶级百人团最重要的中心，成了日益形成的无产阶级统一战线、最初的“基层”细胞。监督委员会是最广泛的统一战线组织。监督委员会，是在工厂委员会、德国工会联合总会地方分会、职员工会、官吏工会的全体大会上宣布成立的，是在工人组织的大会上宣布成立的。工人是监督委员会的核心，其中起领导作用的通常是共产党人。但是，居民中的各个阶层（不论属于什么党派）——失业者、主妇、职员、小商人及手工业者等等，都被广泛地吸引到监督委员会的活动中来了。可见，监督委员会在使居民的“中间阶层”团结到共产党的周围一事中，可能具有严重的意义。

监督委员会之所以面向实际生活，首先是因为具有使广大群众贫困和破产的威胁的危机，因为必须反对物价暴涨和黑市。因此，今后监督委员会的职能需要扩大一些。德共中央工会部在1923年夏天曾指出，“监督委员会当前的主要任务，在于反对物价昂贵，竭力取得工人对于生产、商业和运输的监督……在反对投机和走私的斗争中，监督委员会在一定的情况下，可以变成为……国家机关，可以执行国家的职

<sup>①</sup> “红色工会国际”，1923年，第7期，第59页。

能。”<sup>①</sup>

到1923年年中，尽管有资产阶级及其走狗的迫害，监督委员会仍在各个最大的城市和许多居民点里进行着工作<sup>②</sup>。在监督委员会被当局允许合法存在的地方（萨克森、绍林吉亚、卡塞尔、汉诺威、不伦瑞克、莱茵区和柏林等地），监督委员会曾积极展开活动，在个别场合下，甚至已过渡到对生产实行某些监督。例如，埃森的监督委员会曾征集市内面包师储藏的全部面粉。在莱比锡的近郊，监督委员会自己动手收过庄稼，因为地主竭力避免把粮食送进城去，故意拖迟收割的时间。在左德尔乌兹，监督委员会曾组织大家到邻近乡村搞牲口：它们按照征集的办法用固定的价格收买牲口，就地宰掉，然后送进城来<sup>③</sup>。

但是，在现阶段监督生产的问题实际上已摆到次要的地位，因为国内革命高潮总的水平还是不够的，而日益发展的通货膨胀和物价上涨的情况又要求监督委员会的活动，为了消费者的利益，首先应当集中在调整物价、供应产品并加以分配

---

① 引自德共中央工会支部向工会国际提出的报告。“红色工会国际”，1923年，第7期，第59页。

② H. Gast: 上引著作，第441页；在1923年6月，计有800个监督委员会（Jahrbuch für Politik, Wirtschaft und Arbeiterbewegung, Hamburg, O. J., 1923/1924, S. 589. 以下称：Jahrbuch...）。根据A. M. 潘克拉托娃的统计，到8月罢工的时候，德国共有605个监督委员会（A. M. 潘克拉托娃：“德国革命中的工厂委员会（1918至1923年）”，莫斯科，1923年，第93页。以下称：A. M. 潘克拉托娃：上引著作……）。

③ C. П. 姆斯基斯拉夫斯基：“德国的阶级斗争”，莫斯科，出版年月不详，第125页（以下称：C. П. 姆斯基斯拉夫斯基：上引著作……）。

的問題上，应当集中在爭取“廉價市場”的鬥爭上。正是在這一方面，監督委員會取得了最大的成績。同時，工人們通過它們便有可能進一步了解資本主義經濟的組織。監督委員會也日益深信，僅僅監督小鋪老板是不成的，必須進而監督批發和生產。但是，只有在掌握國家政權以後才能夠實現這一着；於是監督委員會的活動，便引導工人羣眾去認識消滅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而奪取政權的必要性。

資產階級和容克地主的報刊大肆渲染，指責監督委員會的“搶劫行為”。用暴力來消滅它們的計劃業已制定。法西斯分子和資產階級娼羅的武裝隊伍經常痛打委員會的委員，破壞他們的工作。但是廣大的居民階層却非常同情監督委員會的工作，給予它們各種支持。

正象法西斯危險日益增長的情況一樣，對監督委員會的恐怖行為也迫使工人自衛隊——無產階級百人團面向現實<sup>①</sup>。例如，早在2月15日召開的索林根工廠委員會的會議上，就曾決定立即着手組織自衛隊。在克虜伯企業工人的全體大會上，在窩伯特爾工廠委員會的代表會議上，在波呼姆的一系列會議上，以及由勒姆斯却德的地方工會卡特爾等等，都曾通過類似的決議<sup>②</sup>。勒姆斯却德城的工會在決議中寫道：“勒姆斯却德的街道已被納粹惡棍所包圍。工人們遭到侮辱和毒打。警察同情這些惡棍，並且慫恿他們。社會治安已沒有保障。因此，我們決定建立勒姆斯却德及其近鄰的無產階

① 早在1922年夏天，在反革命勢力大為猖獗的情況下德國的外交部長B. 拉捷納烏被殺害以後，工人自衛隊就自發地建立起來了。

② “國際工人運動”，1923年，第6期，第2至3頁。

級的民警。”<sup>①</sup>广泛地、有计划地組織百人团，是在3月間开始的，特别是在法兰克福国际代表會議召开以后开始的；这次會議曾提出建立工人自卫队，把它作为反击法西斯主义最重要的工具。5月間，总共已有300个无产阶级百人团，到10月初已发展到800个。这些百人团，大約团結了10万人<sup>②</sup>，并且其中有1/3是在薩克森<sup>③</sup>。各个工业中心和大城市里，都有无产阶级的自卫队存在。在薩克森、紹林吉亚、符騰堡、柏林、波罗的海沿岸地区、特別在鲁尔区，这种自卫队都有极为巨大的意义<sup>④</sup>。

百人团通常是在企业里建立起来的，全部工人都参加，不論他們属于什么党派；百人团象工厂委员会和监督委员会一样，也是德国无产阶级统一行动极其重要的形式。领导这一运动的德国共产党，始終建議自己的党员不要建立純粹的共产党人百人团。早在德共的第8次代表大会上，就已提出下列要求：“无产阶级必須在企业里，不分党派地着手建立自卫机关。”<sup>⑤</sup>4月里，德国工厂委员会的帝国委员会在給工人的呼

① Rote Fahne, 1923年11月19日。

② H. Gast: 上引著作, 第452頁。

③ 同上书, 453頁。

④ 鲁尔的百人团之所以具有特殊的意义是因为，到了月底，这里的德国警察已被法国人所消灭(被解除武装并加以驅逐了)。鲁尔的警察一被驅逐，各种刑事犯和法西斯組織便猖狂起来了，资产阶级也成立了許許多多的“保卫队”，他們都仇視革命工人，常常进行血腥的挑釁。这种情况，就直接迫使鲁尔的无产阶级建立起自己的自卫組織——无产阶级百人团。

⑤ 131 (8) Parteitag KPD, S. 218。德共中央在1923年5月16至17日召开的會議上，專門討論了“作为統一战綫机关的企业无产阶级百人团”的問題(H. Gast: 上引著作, 第443頁)。

呼声中写道：“不許分散力量，不許建立任何党的百人团……不許玩弄士兵。应当建立百人团，使它成为企业中有組織的、准备作斗争的統一战綫的形式。”<sup>①</sup>

百人团中的絕大多数(650/800)<sup>②</sup>是統一战綫的組織。例如在萊比錫，百人团的成員共产党人占40%，社会民主党人占20%，无党派的和工会會員占40%<sup>③</sup>。百人团的領導机构也往往是联合組成的。例如，指导百人团建立和活动的萊比錫“15人委员会”中，有7个社会民主党人，5个共产党人和3个党外人士。德累斯登、士維考等許多薩克森城市的情况，也相类似。值得注意的是，在不少的居民点里，联合自卫队的建立，比在萊比錫、开姆尼茲和德累斯登这些社会民主党人的堡垒里要容易得多，迅速得多<sup>④</sup>。

无产阶级百人团在1923年革命运动中所起的作用是很明显的。它們保护了工人的示威和无产阶级組織的所在地，保證了監督委员会收到实效，并打退了法西斯分子的挑衅。例如，4月里在埃森的近郊曾举行失业者的示威；前来保卫的有5个无产阶级百人团。“周圍連一个法西斯分子也看不到。资产者看到百人团从四面八方有組織地走出来的时候，簡直吓得目瞪口呆了。短時間內，商店一律閉上了門，惊惶失措的资产者只敢偷偷地从已經关上的百叶窗縫里瞧上一眼。”<sup>⑤</sup>

① 引自 H. Gast 的著作，第443頁。

② 同上书，第454頁。在德共的陣地不巩固的企业里，自卫小組完全由共产党人組成；这种小組有150个。

③ 引自 H. Gast 的著作，第454頁。

④ 同上书，第446頁。

⑤ Ruhr-Echo (“魯尔回声报”——譯者)，1923年4月12日。



百人团常常领导罢工，保护罢工的企业，使这些企业免除工贼的破坏。百人团保卫着监督委员会，因而也就成了它们的执行机关。这就是德国工农政权军事力量的萌芽。

争取建立无产阶级自卫队的运动日益扩大，监督委员会和工厂委员会日渐活跃，都反映出德国工人阶级的团结性和战斗性正在不断增长，反映出“下层”人民中的革命统一战线正在日益形成。资产阶级及其在社会民主党中的走狗拼命要阻止臭名远扬的“民族团结”趋于瓦解，便对上述工人组织疯狂地进行诬蔑和攻击，并迫使它们停止活动。5月里，鲁尔的内政部长——社会民主党的哲维林格曾禁止现有的无产阶级百人团进行活动。许多其他的区政府也步了他的后尘<sup>①</sup>。实质上，监督委员会和革命工厂委员会都得不到法律的保护。这一切，当然为统一战线组织、首先是无产阶级百人团和监督委员会的活动造成了莫大的困难。在大多数的情况下，这些组织都是冒着危险进行活动的。它们的成绩每每是局部的、不牢靠的，有计划的工作已被破坏。这些困难之所以日益加深也因为，德共的布兰德列尔领导机构对于工厂委员会也好，对于百人团也好，对于监督委员会也好，都没有予以足够的重视。

但是，尽管有种种困难，工人阶级的一致行动仍然自行开辟了道路。德共中健康的力量克服了“左派”的亲派主义和布兰德列尔分子的机会主义，并对“鲁尔的普恩卡尔和斯普累的古诺”展开了斗争。

---

<sup>①</sup> 只有萨克森和绍林吉亚是例外，因为这两处执政的，是得到共产党人支持的社会民主党人政府。

### 对消极抵抗的“背后打击”

已經指出，对于魯尔的大王——这些斯丁納家族、克虜伯家族和梯森家族——來說，魯尔冲突实际上只是一个爭論利潤多少的問題，只是它們爭奪西歐工业中心的霸权的反映。祖國民族利益的概念，对它們是格格不入的。它們帶着关于狹隘的私利的成見，来理解德國的福利。当德國人民英勇地肩負着消极抵抗的重担的时候，德國的工业大王只追逐发财致富的目的。他們使馬克无法穩定，因而破坏了进行抵抗的經濟基础。同时，他們还背着人民和法国人談起投降的条件来了<sup>①</sup>。早在2月里，巴登大型化学工厂的老板就曾以5百万法郎的代价，把自己的“秘訣”出卖給法国政府：在对德國的斗争中，法国是需要这些“秘訣”的。事实上，斯丁納及其法国竞争者——H. 克列左和H. 汪德尔之間的談判、克虜伯和H. 汪德尔之間的談判，都沒有停止过。法西斯分子主要的庇护者之一——著名的工业家A. 列赫別尔格，曾保證德法两国的鉀公司取得“諒解”。不久，魯尔的企业主便逐漸和占領当局直接勾結起来了。这些企业主忘記了自己在1月发表的关于反击“世仇”的演說，而开始用武力强迫工人为占領者作工、首先是开采煤炭，法国当局答应付給現款。

民族主义的浪潮已开始低落，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在日益增高，也是想和法帝国主义勾結起来的企图日渐加强的原因。斯丁納的傳声筒——“Deutsche Allgemeine Zeitung(“德意志

<sup>①</sup> 參閱 M. A. 布拉金斯基的論文：“魯尔大王和1923年的‘消极抵抗’”，苏联科学院通报，历史哲学丛刊，1951年，第8卷，第4期。

总汇报”）”早在3月22日就恬不知耻地写道：“敌人并不在国外，敌人就在国内。”巴伐利亚法西斯分子的头目希特勒曾在各个十字街头叫喊道：“不要反击法国人，而要消灭共产党人和11月的罪犯——这就是我们的主要任务。”<sup>①</sup>社会民主党的报刊，也一直在号召和法国结成“紧密的联盟”。他们拼命地寻找必须投降的“论据”和“理论根据”。社会民主党的政论家克维塞尔曾写道，英国也好，美国也好，都无法解决鲁尔冲突。应当“在大陆上来为大陆寻求和平”<sup>②</sup>。克维塞尔和壟断组织的文人唱着同一个调子，他高呼道：“把洛林的矿石和威斯特法里亚的煤结合起来，乃是关系德国和全欧的生命问题……”<sup>③</sup>

不久，联合政府的代表发表了类似的声明，这是官方同法国谈判的序幕。3月7日，“人民党”的首领斯脱莱斯曼在自己的演说中，曾指出进行谈判的必要性<sup>④</sup>。3月17日，斯丁纳和斯脱莱斯曼一同进早餐时，对于进一步抵抗是否适当一事，也曾表示怀疑<sup>⑤</sup>。同一天，斯脱莱斯曼和德国外长罗晋堡谈话时，向他发挥了社法德谈判的<sup>⑥</sup>思想。在4月17和22日的两次演说中，斯脱莱斯曼都表示准备和法国进行谈判<sup>⑦</sup>。社会民主党的布拉依特沙德曾建议，在法国占领鲁尔区以前就和法

① “真理报”，1923年3月20日。

② S. M., 1923, № 2, S. 85.

③ 同上，第70页。

④ G. Stresemann. Vermächtnis, B. I, S. 41.

⑤ 同上，第42页。

⑥ 同上，第43页。

⑦ 同上，第55页；Verhandlungen des Reichstags（“国会的谈判”——编者），B: 359, S. 10573（以下称：Reichstag...）。

國開始談判<sup>①</sup>。

可見，尽管 1、2 月間古諾和資產階級政党的首領都爭先恐后地喊叫过，向法国的談判要在恢复 status quo（直譯为“事物的真正位置”，即“恢复旧秩序”之意——譯者）、即清洗魯尔以后才会进行，可是从 3 月份起，准备立即談判的声明就紛紛提出了。社会民主党的克瓦尔克写道：“英雄們在魯尔的爭吵并无好处；工业家的抵抗已在削弱；法国人运煤的数量已日益增多；財政状况十分危險；最好的办法是，老老实实投降，认真地提出建議来”<sup>②</sup>。

可是，德国政府在“老老实实投降”以前，曾在外交上和普恩卡尔长期地討价还价，指望得到英美两国的支持。5 月 2 日，古諾向法国、比利时、英国、美国、意大利和日本发出照会，就賠款問題提出了建議<sup>③</sup>。照会中着重指出，德国的消极抵抗将要繼續下去，直到占領区完全撤出为止。賠款的支付，以得到的外債多少为轉移。法国和比利时在 5 月 6 日的回照中也表示，“在消极抵抗停止以前要进行談判，是不可設想的。”<sup>④</sup>德国的建議对于英国政府來說，也是个“莫大的失望”<sup>⑤</sup>。英国外交大臣寇松曾建議德国，要它“就准备賠款的問題提出比过去更为重要而又明显的証据来”<sup>⑥</sup>。这样一来，古諾的一切指

① H. Spethmann; 上引著作, 第 4 卷, 第 153 至 154 頁。

② 引自“共产国际”, 1924 年, 第 3 至 4 期, 第 294 頁。

③ 参阅: Spethmann; 上引著作, 第 3 卷, 第 348 至 350 頁。

④ 同上书, 第 350 至 354 頁。

⑤ 同上书, 第 354 頁。

⑥ H. Spethmann; 上引著作, 第 3 卷, 第 355 頁。

望都是虛張聲勢而已。英美兩國仍然忠于“觀望”的原則。

和法國的沖突，德國外交上的孤立、國內經濟的日益崩潰以及工人運動的高漲，使德國的資產階級集團更加分裂了。西部地區的一部分大資產階級（分立主義者）要求政府投降，並以肢解德國相威脅<sup>①</sup>。另一部分大資產階級指望在同法國的競爭中取得最後勝利，便在外表上繼續“抵抗”，同時又不斷地敲打“西方的門窗”。再者，德國資產階級中最有遠見、思想健全的一部分人則指望擺脫經濟危機，至少希望通過和蘇聯做生意的途徑來削弱危機，於是他們要求東方政策活躍起來。在法帝國主義實行侵略和美英統治集團保持可疑的“沉着”的面前，和蘇聯合作的政策便被各個社會集團看做是最明智的政策，最符合德國利益的政策。

德國資產階級的報刊，空前熱烈地討論着蘇德關係的種種問題。“德國和俄國”、“俄國——德國”、“俄國和我們”、“德國應當開辟俄國市場”等等標題，每天都出現在報刊的篇幅上。資產階級政黨的報刊硬說，英、美、國際聯盟都樂意支持德國，同時又象“真理報”所指出的，它們的報刊“向蘇俄頻送秋波，儘管是羞答答的、不堅決的樣子。”<sup>②</sup>當時蘇聯的報刊寫道：“德國普通的居民，對東方的援助抱有莫大的希望。”<sup>③</sup>關於蘇聯狀況和蘇德關係的報告會，在德國很受歡迎。1923年

---

① 在一次分立主義者舉行示威時，E. 阿登納曾這樣表示：“要不我們就作為一個緩沖圈，干脆同法國合併，要不就成為西德共和國，第三種情況是沒有的”（引自烏布利希的著作，第73頁）。

② “真理報”，1923年1月16日。

③ 同上，1923年1月25日。

春天，“民主黨”的哈茲、德帝國的前任元首維爾特等許多德國大公司的代表先後訪問了蘇聯，商談租讓權的問題。回到德國以後，哈茲在一次演說中，曾號召“坦率地、誠懇地、毫無條件地”和蘇聯政府攜手合作<sup>①</sup>。1923年8月，哈茲和維爾特為了和蘇聯政府簽訂有關森林租讓權的條約，曾第二次來到蘇聯。和他們一同到達莫斯科的，還有德國一部分工業家和大康采恩的代表<sup>②</sup>。哈茲在莫斯科聲稱：“就最近的將來來說，德國的經濟前景在各方面都是困難的……正是在這些嚴重的考驗即將到來的時候，我們的國家愈會了解到，同俄國建立緊密的經濟聯系對於德國有着多么巨大的意義，因為俄國能夠使德國得到使用勞動和銷售商品的新的機會。”<sup>③</sup>

“德俄聯合會”團結了大部分關心蘇聯市場的公司，該聯合會的活動也是服務於同蘇聯達成協議的。1923年德國工商界提出的租讓申請書空前之多——216份，關於建立混合公司和給予租讓權的條約締結得非常多。1923年秋天，某些德國公司參加了莫斯科的農業展覽會<sup>④</sup>。

德國在外交上的投降路線，並不是由於特殊的必要性所決定的。德國許多具有愛國思想的代表，曾指出並在實際上

---

① “消息報”，1923年7月21日。

② 正像哈茲和維爾特一樣，別克項間和阿曼教授也是“東方經濟聯系協會”的代表，該協會團結了各個工業部門的近40家大公司。希麥爾巴赫和比爾菲格代表大陸上製造枕木的最巨大的公司（弗萊堡的“希麥爾巴赫兄弟”）。“歐洲森林業股份公司”和3家巨大的鐵路修築公司——“上萊茵工業股份公司”、“波普和萊捷爾”、“布留恩和比爾菲格”的代理人也來到了。

③ “經濟生活”，1923年3月9日。

④ Rote Fahne, 1923年7月31日。

开辟了保持民族尊严的实际道路。“通往东方的大门”已经打开。可是，德国政府企图在东西方之间保持平衡，要引导“国家大船通过一条狭窄而又危险的水道——在凡尔赛条约和布尔什维主义之间左右为难”<sup>①</sup>，它尽管没有决心放弃拉帕洛方针<sup>②</sup>，但由于要执行垄断组织特别反动而又利己的阴谋，便远远地没有用尽拉帕洛的一切机会，它与其要拉帕洛，不如要一条进行屈辱性的买卖和投降的道路。

### 两条战线上群众斗争的开始

古诺反人民的内外政策引起了群众的反抗，为统一战线的各个组织带来了生命力，在这样的基础上，德国展开了争取社会与民族解放的尖锐斗争。德国的无产阶级从最初的反对法国的罢工（还没有明显的阶级性质），逐渐转到为控制生产和分配，为工人政府而斗争了。

两条战线上的群众斗争于3月开始，首先在鲁尔发动，其目的在于反击鲁尔垄断资本家无耻的卖国阴谋。矿井老板不给工人煤炭（尽管到处都堆着煤炭），拒绝提高工资，而接受了于己有利的、和占领当局所缔结的“煤炭协定”。3月17日，法军占领了“康柯迪亚”煤矿。该煤矿的管理处不但不予以反击，反而要求矿工开始工作——为法国人采煤。为了回击企

① “Kölnische Zeitung（‘科伦日报’——译者）”报的议论。引自 Reichstag, B. 387, S. 3422。

② 1922年热那亚会议期间，俄德两国曾在拉帕洛签订条约。根据这项条约，两国之间取消一切要求，恢复外交关系，并保证了和平经济合作的可能性。——译者

业主同占领者勾结的这一公开的行为，工人们宣布罢工了。矿井老板和占领者结成统一战线，对工人进行反扑。配备着坦克和机关枪的法军，开到矿工管理处的门前，使该管理处免受本矿工人们的袭击。改良主义者也起来保护矿井老板，他们号召矿工“屈从武力”，恢复工作。其他矿井里也出现过类似的情况。3月底，在埃森克虏伯的工厂里，事情已发展到工人和占领军发生流血冲突的地步。鲁尔的无产阶级，对企业主的投降政策进行了顽强的抵抗。

在共产党人的领导下，展开了争取工人监督煤炭生产与分配的运动。3月底在埃森召开的采矿工业和冶金工业工厂委员会的代表大会，是在“把煤廉价地分配给鲁尔区的工人、职员和官吏！”的口号下进行的。大会号召鲁尔的居民说：“动荡不定的时期已经过去！准备采取广泛的联合阵线来行动！让法帝国主义者和德国资本家看看：你们满怀决心，一定要亲自来保护自身的利益。”<sup>①</sup>

4、5月间，革命浪潮一直在上升着。马克的稳定已遭破坏，物价昂贵的浪潮重新掀起，物价拼命上涨，极端的反动势力日益膨胀，帝国主义围绕鲁尔危机讨价还价，武装干涉苏联的新计划已经制定（寇松的最后通牒）——这样，工人们便完全看清了民族主义的烟幕。发动此起彼伏，广大的人民群众日益卷入革命的漩涡了。从5月起，突然爆发的罢工震动了整个德国。成千上万的工人参加了罢工。5月1日，劳动者在留斯特加尔夫花园和动物园里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11月革命以后，柏林70万工人手拿红旗和五角星，完

<sup>①</sup> H. Spethmann: 上引著作，第4卷，第160页。



全在德共的口号<sup>①</sup>下举行示威，这还是第一回。即使在慕尼黑，尽管有法西斯分子的恐怖和威胁，仍然有7万多人参加了示威<sup>②</sup>。虽然占领当局禁止示威，资产阶级和改良主义者企图破坏，但在多特蒙德、杜伊斯堡、波呼姆、埃森等地，还是举行了强大的“五一”示威。

德国政府5月2日提出的照会，在国内引起了强烈的反应。德共把古诺的这一步骤看作是“对鲁尔无产阶级的背后打击”<sup>③</sup>。5月4日，柏林举行了工人群众大会，工人们要求停止“甩卖鲁尔区”，加强对出卖德国民族利益的古诺政府的斗争。首都的无产阶级在自己的决议中，号召继续反击法帝国主义，推翻古诺政府，建立工人革命的政府，和苏联结成联盟<sup>④</sup>。5月13日，柏林又举行了12万劳动群众的大示威<sup>⑤</sup>。首都的无产阶级走在最前列，举起巴库工人的旗帜<sup>⑥</sup>——决心斗争的象征。5月16日，尽管有倾盆大雨，柏林仍然在德共的口号下，举行了人数众多的游行，迎接从洛桑运来的伏罗斯基的骨灰<sup>⑦</sup>。有3千多名工人直接从工厂奔向火车站。盛大

① 德共的口号是：“打倒法西斯主义！工人政府万岁！和苏俄结成联盟！”等等（Rote Fahne, 1923年4月29日、30日、5月1日）。

② 同上，1923年5月2日。

③ 同上，1923年5月4日。

④ 同上，1923年5月5日。

⑤ 为了回答普维林格警察的打击，普鲁士议会的共产党人议员（包括皮克在内）组织了一次示威游行。

⑥ 1923年4月29日，为了表示革命的团结一致，巴库共产党人的代表把这面旗帜送给了柏林工人（Rote Fahne, 1923年5月8日）。

⑦ 苏联出席洛桑会议的代表 B. B. 伏罗斯基，于5月初被帝国主义的奸细所暗杀。

的殯儀的行列，伴着裝有伏罗斯基尸体的棺材到达苏联大使馆。參加送靈的人數多極了，一般的交通也不得不宣告中斷。特別是送伏罗斯基的骨灰去莫斯科時，也是人山人海的：有15萬多人參加，並且其中有一半是工人、社會民主黨人、無黨派人士和知識分子。

如此眾多的群眾對蘇俄表示關心與同情，這就雄辯地說明了國內的革命情緒正在增長。德國無產階級爭取和平和同蘇聯合作的鬥爭，已成為他們反對國內反動勢力和外國武裝干涉的鬥爭的組成部分。

魯爾礦工和五金工人的罷工，在1923年5月工人階級的一系列武裝發動中，占居中心地位。這次罷工是自發爆發的，它象森林的火災一樣，非常迅速而又猛烈地一個緊接着一個地延及魯爾各區——短時間內，這次罷工就把40多萬人卷入鬥爭，並擴展到德國的非占領區了。

罷工於5月16日在“凱撒什士爾”礦井（在多特蒙德）開始，提出了以下的經濟要求：礦工們堅持提高工資，這是因為隨着物價的上漲工資已日益減少了。可是，後來遇到企業主堅決的拒絕以後，魯爾罷工便逐漸具有政治性質，並同警察與軍隊發生了武裝衝突。例如，5月23日格森基亨的無產階級在百人團的支持下，強佔了市警察局所在地，在上面插起了紅旗，迫使資產階級的“自衛”隊逃散了。工人們變成了城市的主人。

可是，由於缺乏必要的領導，工人們既不能鞏固自己的勝利，也無法加以擴大。鬥爭初期成立的“罷工委員會”力圖得到支援，却毫無結果。工會和社會民主黨的首領都宣布罷工

是“野物”，不肯加以承認和領導。這次罷工也使德共感到出其不意。黨中央堅持“不要受人挑撥”的論點，拒絕出面領導，它企圖使鬥爭倒退，只容許它是純粹的經濟罷工。根據布蘭德列爾分子的論斷，其所以採取這種立場，是由于下列的想法：不讓資產階級得到另外的、加緊和占領者勾結的借口<sup>①</sup>，是由于“聚集力量”而予以堅決打擊的策略；主要的原因，却是不相信群眾的戰鬥力。

大約兩個星期以後，黨的領導機構才採取具體步驟來引導這次罷工，它曾推動“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工作者聯盟”（受着德共影響的一個聯盟）來擔任這一工作。但是，這樣作也不是為了指導和推動發動，向工人們提出明確的目標，而是為了“恢復運動的紀律，使它完全回到純粹的經濟鬥爭的軌道上來。”<sup>②</sup> 黨中央所採取的這種“沉着”的立場，是工人們無法了解的，工人們滿腔革命熱情，一心想投入戰鬥。

5月末，企業主和工人的談判就提高50%的工資達成了協議。改良主義工會的領導機構，曾號召復工。接着，“聯盟”和德共也這樣作了。但是，對於如此微小的讓步是否同意的問題，工人們想也沒有想過。最大的罷工中心——多特蒙德、格森基亨、波呼姆——的罷工委員會的會議舉行得非常熱烈，罷工者充滿着繼續鬥爭的決心。根據一家報紙的記載，工人們對改良主義工會的憤怒是“無法形容的”。但是，“聯盟”和共產黨領導機構的立場，也引起了同樣的憤怒。復工的號召

<sup>①</sup> Die Internationale, 1923, №12, S. 322; Rote Fahne, 1923年5月10日, 等等。

<sup>②</sup> “紅色工會國際”, 1923年, 第7期, 第22頁。

被看作是一种叛徒行为。当共产党人瓦格涅尔在格森基亨一次会议上开始鼓动大家停止斗争的时候，“混蛋！叛徒！”的一片叫喊声就指到他的头上来了。多特蒙德罢工委员会的信差要求停止罢工的时候，曾连续地为工人们的呼声“Weiter streiken！”（继续罢工！）所打断<sup>①</sup>。

值得注意的是，不仅布兰德列尔及其党羽主张使斗争倒退，而且某些“左派”，首先是夸耀自己“革命性”的P. 菲雪尔也是如此。乌布利希写道，在一次热情高涨的夜间会议上，菲雪尔和布兰德列尔分子一道，通过了关于停止罢工的决议<sup>②</sup>。德国每一处似乎都是静悄悄的，鲁尔将陷于孤立，并且会流血牺牲，这种判断就是菲雪尔主要的论据。

这样，本来可以取得巨大成果、严重破坏鲁尔资本的威力而成为一个夺取政权斗争中的里程碑的一次斗争，便在紧张的时刻，由于上面的强制和命令而宣告中断了。动员群众进行革命的过程，于是遇到了严重的障碍，因为局部的战斗——罢工“乃是训练工人们进行伟大斗争的军事学校”<sup>③</sup>，它能“……全部瓦解资产阶级政权，组织无产阶级，成为无产阶级夺取专政斗争中的阶段。”<sup>④</sup>不预先作长期的准备，不展开和扩大武装发动，决不能转入革命，正象不跑起来就无法跳高是同样的道理。可是，德共的领导机构仅仅把局部发动的展开，看作是

① H. Spethmann: 上引著作, 第4卷, 第180页。

② 乌布利希: 上引著作, 第70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俄文版第3卷, 第106页。

④ “共产国际文献”, 第190页。

“过早地、徒然地耗费了群众的革命精力。”<sup>①</sup>

后来的事变表明，象菲雪尔关于“鲁尔孤立”的论点那样的策略是多么不合理，多么有害。当鲁尔大部分企业的罢工已经停止的时候，工人又有新的队伍投入了斗争。运动已扩展到整个德国。6月4、5两日，上西里西亚爆发了罢工，短时间内，就有10万采矿工业和冶金工业的工人参加<sup>②</sup>。6月里，西里西亚在4个礼拜内有12万农业工人举行了罢工<sup>③</sup>。全国的雇农，都举行了罢工。柏林有15万五金工人举行罢工。还有许多罢工事件。罢工的浪潮冲击着全国。无产阶级想粉碎“堡夫里登”枷锁的群众意志，表现得非常明显。罢工者常常解除警察的武装，占领警察分局，某些地方还赶走了地方政权，统治权便转到在罢工委员会中起着作用的工厂委员会的手中来了<sup>④</sup>。街道和广场上，不断地出现了失业者的示威、飢

<sup>①</sup> “第5次共产国际代表大会速记报告”，第310页。德共中央“放弃”斗争的策略——硬说党是从“突然的打击”而开始夺取政权的，和共产国际第3次代表大会的决议相违背（参阅：“共产国际文献”，第190至193页）。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于1923年6月举行的第3次全体会议，实际上默认了布兰德列尔分子这个孕藏着悲惨的后果的策略（参阅：“1923年6月12至23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扩大会议”，莫斯科，1923年）。在全体会议上，“德国问题”没有专门地、从革命危机成熟这一角度加以研究，这一事实也说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领导人物未曾十分明确地认识到德国形成的局势——革命危机已经成熟。当然，在6月里提出直接夺取政权的问题仍然为时过早。但是，下面这样估计局势未必是正确的：“预示强大的革命浪潮日益增长的细小的征兆”，甚至也没有出现过（O. B. 库西宁：“德国10月失败的痕迹”，莫斯科，1924年，第10页。以下称：O. B. 库西宁：上引著作……）。

<sup>②</sup> Rote Fahne, 1923年6月12日。

<sup>③</sup> “红色工会国际”，1923年，第7期，第22至23页。

<sup>④</sup> “共产国际”，1924年，第1期，第326页。

民的造反和流血的冲突。鲁尔5月的罢工，似乎成了掀起汹涌澎湃的罢工浪潮的起点，后来，这股浪潮曾波及全德国，并冲走了古诺政府。

## 革命危机。无产阶级的失败

### 资本主义经济的破坏和瓦解

危机的现象和趋势说明了德国上半年的经济情况，从夏末起，这种现象和趋势便开始急剧地增长和突出起来。秋天里，德国的经济几乎完全陷于瘫痪状态。通货膨胀猛烈上升，稳定马克的一系列措施都宣告无效。

1个金马克 <sup>①</sup>	1923年7月	价值	262,000纸马克
	1923年8月底	价值	2,453,600纸马克
	1923年9月28日	价值	38,100,000纸马克
	1923年10月31日	价值	17,270,000,000纸马克
	1923年11月20日	价值	1,000,495,000,000纸马克

在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的过程中，各个环节都已遭到破坏，通货膨胀便成为一匹脱缰的野马了。工业生产日益减少。工厂有的关门了，有的开工不足。例如，官方的统计说，开工不足的企业8月里为49%，到9月就增加到71%了<sup>②</sup>。根据商业局报告上的统计，在10月里，每调查一百户工业企业，其中正常开工的只有6家<sup>③</sup>。生产减少也刺激了通货膨胀，流通

① Jahrbuch(“年鉴”——译者)，1923/24, S. 574。

② E. 瓦尔基：上引著作，第180页。

③ 同上，第210页。

过程里塞满了剩余的大量纸币。货币流通的速度空前加快，这是一个刺激通货膨胀的重要因素。纸马克即使短期留下也会遭到损失，因此，每个人都力图使纸马克即刻“脱手”。作为支付手段的货币的职能范围，在日益缩小。即使作为流通手段来说，纸币也逐渐在脱离流通过程。货币几种职能之间的正常联系已遭到破坏。商品所有者愈来愈不肯接收纸马克，而要求用实物来交换商品了。

通货膨胀在10月里达到了最高点<sup>①</sup>。根据官方的统计，最低的生活费指数仅仅在10月里，就增加了338倍（从40,400,000马克升到13,671,000,000马克）<sup>②</sup>。政府利用通货膨胀作为维持消极抵抗的财源，大资产阶级有意缓交捐税，结果，使国家财政遭到德国历史上空前未有的破产。早在9月里，收入就只顶1%的支出了<sup>③</sup>。

政府有个时候企图使收支相抵，减少预算上的赤字，于是一味求助于印刷机了，但，这一措施却只能加剧通货膨胀。

这一措施直接引起的后果，是生活费用拼命上涨。根据官方的统计，和战前时期（1913至1914年）相比较，9月3日的生活费用——食品、住房、照明、取暖和衣服，已增加1,845,261倍<sup>④</sup>，在9月下半月，又增加4倍——和8月下半月

① W. und St. 1924, № 1, S. 11.

② 同上，第12页。

③ Jahrbuch, 1923/24, S. 573; G. Stresemann. Vermächtnis, B. I, S. 87.

④ W. und St. 1923, № 17, S. 533. 官方关于最低生活费等方面的统计，在共产党的报刊上曾多次受到批驳。例如，关于1923年6月帝国统计部门的计算，“国际”杂志有位记者曾写道，和 Statistische Reichsamt 关于6月里生活费用提高7,650倍的论断相反，和战前时期相比较，实际上大约提高了15,000倍，即比官方的指数所表明的几乎大两倍（Die Internationale, 1923, № 14, S. 404）。

相比較，几乎增加了28倍<sup>①</sup>。1923年10月里，取暖和照明的費用已增加（和1913至1914年的水平相比較）5,715,000倍，住房——54,000,000倍，衣服——6,160,000倍，食品——4,301,000倍<sup>②</sup>。坐一趟電車得花10万馬克。美元成了价值的真正尺度。工人的工資还未拿到手，就已經貶值了。实际工資在日益下降<sup>③</sup>。

情况之所以日益严重是因为，生产减少，小生产者破产，失业的情况便达到了严重的地步。1923年10月里，单說在工会会员中，完全失业和部分失业的就占66.4%<sup>④</sup>，紡織工人中部分失业的占62.9%，工厂工人——39%，服装企业的工人——47.2%<sup>⑤</sup>。

① Deutschland und Frankreich. Ihre Wirtschaft und ihre Politik（“德国与法国，它们的政治与經濟”——譯者），1923/24. Herausgegeben von R. Kuczynski. B., 1924, S. 335.

② W. und St. 1924, № 1, S. 11.

③ 关于1923年秋天德国工人的实际工資，要得到确切一些的統計是不容易的。以下的数字可以表明一个大致的概念：和战前相比，熟练工人的实际工資1月里等于48.7%，7月等于48%，10月等于52%（W. und St. 1924, № 3, S. 87）。德国建筑工人所挣得的，平均只有战前工資的40%（“1923至1924年的国际工会运动”，莫斯科，1924年，第145頁）。縫紉工人的工資，等于战前的45%。縫紉工人一天的工資，等于美国同样熟练的縫紉工人1小时的工資（同上，第159頁）。根据官方的統計，生产部門工人的工資在10月10至16日这一星期內，只等于战前的47%（W. und St. 1923, № 22, S. 704）。

④ Jahrbuch, 1923/24, S. 564.

⑤ Statistische Jahrbuch für das Deutsche Reich（“德国統計年鉴”——譯者），1924/25, S. 297（以下称：St. Jahrbuch...）。縫紉工人中失业的情况达到了严重的地步。工会总共只有5%的会员是全日工，其余的不是失业，就是一礼拜工作1至3天（“1923至1924年的国际工会运动”，第159頁）。紡織工会2/3的会员，都被迫失业。紡織企业一星期开工2至4天（同上，第137頁）。



德国资本主义制度的崩溃，也许对于中间阶层处境的影响是最为强烈的。在8月底以前——在小商品生产者和商人的财政结算改为黄金计算以前，他们受剥削的过程发展得特别迅速。成千成万的手工业者、小铺老板等人之所以破产，是因为在通货膨胀时期，他们竞争的能力在垄断组织的冲击下大为削弱的缘故。小企业主商品价格的提高，赶不上资本主义大工业商品价格的上涨，因此，他们的生产费用不断增加。例如，从1至10月，所谓肥煤的价格上涨了400%以上，铁条和铁器上涨了200%以上，机器几乎上涨了300%，这时候，服装、家具等等的价格即使从夏天以后，也只有些许的提高<sup>①</sup>。

零售价和批发价变化的趋势，也很说明这方面的問題。零售价通常要低15至20%<sup>②</sup>。再者，以柏林为例，6月底食品的批发价增加了（和1913年的水平相比较）31,434倍，而零售价只增加13,873倍<sup>③</sup>。这一切所引起的后果是，使小生产者的收入减少，使他们遭到贫困与破产。手工业者的工资，往往低于工人的工资<sup>④</sup>。

通货膨胀的结果，储蓄银行成千成万的小额存款人实际上已经失去自己的存款：根据“一马克等于一马克”的原则，他们的存款已经变为没有价值的纸马克了。几十年的过程里，官吏的养老金都是按照足值的货币扣除的，现在，却用贬值的

① W. und St. 1924, №-1, S. 16-17.

② W. und St. 1923, № 13, S. 404.

③ 同上。

④ 例如，柏林手工业者的工资在10月10至16日这一周内，只等于战前的34.77%（W. und St., 1923 №, 22, S. 704）。

馬克來支付了。人壽保險公司也正是这样办事的。下級職員和官吏的实际工資,只等于他們战前的30至70%<sup>①</sup>,教師的实际工資則不够維持最低的生活<sup>②</sup>。由于許多企业和机关关了門,編制緊縮了,職員中的失业大軍也在日益扩大<sup>③</sup>。这一切便使城市的中間阶层广泛地无产階級化了。民族主义者的首領格里弗里赫,在国会中談过“中間阶层的危机”<sup>④</sup>。

小資产階級和知識分子拼命寻找出路,他們在战斗力量的极左翼和极右翼之間乱跑一气,想为自己开出治病的葯方,比如他們企图建立合作社来对抗大資本。但是,分析一下合作社建立和瓦解的过程,就可明显地看出这类嘗試的实效是不大的。例如,1923年重新建立了2,689个合作社,却解散了1,612个<sup>⑤</sup>。特別不巩固的是信用合作社:建立451个,解散了397个<sup>⑥</sup>。中間阶层的專門組織,例如職員工会,已經涣散和削弱了。1923年一年中,工会人数几乎减少3/4,即从729,006人减少到199,020人了<sup>⑦</sup>。合作社的报纸,每一期都刊载指示,說明“坚持”的方式,劝自己的會員准备牺牲。

---

① “1923至1924年的国际工会运动”,第175頁:“国际工人运动”,1923年,第32期,第2頁。

② 同上,第181頁。

③ S. M. 1923, № 11, S. 680. 10月里,通过了关于裁减1/4官員的決議。

④ Reichstag, B. 358, S. 9555.

⑤ W. 和 St. 1924, № 2, S. 37.

⑥ 同上。和1922年相比較,1923年一年农业合作社增加的数字几乎减少了2/3 (M. 罗晋菲尔德:“农业合作社最新发展的基本特点。土地問題”,1927年,第3至4卷,第204頁)。

⑦ Jahrbuch, 1924/25, S. 289.

經濟总危机也严重地打击了德国的小农經濟<sup>①</sup>。小农經濟也失去了信貸，繳納的捐稅比大地主要多4至5倍<sup>②</sup>。捐稅占去了小农60至70%的收入<sup>③</sup>。和容克地主不同，小农更加尖銳地感到了通貨膨脹的影响，首先感到农产品和工业品的价格不相适应<sup>④</sup>。短期的小佃农处境极为困难。由于貨幣贬值，地主們不是完全不肯出租土地，就是大大地提高地租。現以勃兰登堡的情况为例，和战前相比較，地租的数量增加了2至3倍<sup>⑤</sup>。在克罗琴根附近，一块8.8公頃的土地，地主要求的地租如下：37公担小麦，12公担黑麦，12公担大麦，7公担燕麦，22公担土豆，88磅黄油，858个鸡蛋，50磅脂肪，9公升伏特酒，50磅胡桃，1公担水果，71磅用作飼料的草，20只鵝，

① 根据1925年的調查，德国77%的农业居民仅占有17.6%的土地面积；并且在所有的具有两公頃土地面积的农户中，59.4%的农户只占有6.4%的土地。在上西里西亚的132,400个农户中，有107,000戶經營的土地都不到5公頃（“农民国际”，1924年，第3至4頁，第105頁）。

② Einiges Volk, 1924, № 5, S. 24.

③ 同上，1923年，第1期，第3頁；还参閱：“第一次国际农民会談。演說、提綱、宣言集”，莫斯科，1924年，第92頁。

④ 官方公布的农产品和工业品价格的指数如下：（以1913年作为1）

1923年	面包、土豆	畜产品	工业品	人造肥料
1月	20.9	26.4	35.2	12.5
4月	37.7	43	75.7	417
7月	641	627	934	3,329
10月	4,100百万	7,700百万	10,200百万	

（P. 格尔別尔：“土地問題論綱”，第1卷，第2輯，德国，莫斯科，1925年，第108頁。以下称：P. 格尔別尔：上引著作……）。

⑤ P. 格尔別尔：上引著作，第129至130頁。

6公升植物油脂, 5磅猪油, 以及10磅火腿<sup>①</sup>。德国农业无产阶级有7,172,000人、即占国内农业居民总数的34%<sup>②</sup>, 他们的生活条件特别难以忍受。农业无产阶级的工资, 要比工业工人低 $\frac{3}{4}$ 至 $\frac{5}{6}$ <sup>③</sup>。

小资产阶级群众的破产和无产阶级化, 并不能使他们的政治方向永久不变。反对卡特尔和资本主义的情绪蓬勃高涨, 就雄辩地说明了这一点<sup>④</sup>。

1923年初, 小资产阶级容易接受民族主义的欺骗, 热烈祝贺“民族团结”, 可是, 秋天的客观情况则促使小资产阶级走上革命的道路了。台尔曼写道: “甚至国家最忠实的仆人——官吏, 也造起反来了(rebellieren)。”<sup>⑤</sup>

然而, 这种“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只有在成熟的、富有政治经验的工人阶级政党的领导下, 才能走上进步斗争的轨道。

可见, 1923年秋天德国的经济已处在完全破产和普遍紊

---

① “农民国际”, 1924年, 第2期, 第93页; 参阅: Freie Landpost 中类似的例子, 1923年, 第1期。

② “共产国际年鉴”, 1923年, 第615页; “红色工会国际”, 1923年, 第10至11期, 第338页。

③ “国际工人运动”, 1923年, 第28期, 第1页。

④ 例如, 在1923年6月举行的德国消费合作社中央联合会的代表大会上, 曾专门讨论如何对待卡特尔的问题(在这以前, 地方上展开过热烈的讨论)。所通过的决议, 要求帝国政府采取反对卡特尔暴行的措施(S. M., 1923, № 10, S. 622)。

⑤ Rote Fahne, 1923年10月23日; 这一点请参阅: G., Stresemann. Vermächtnis, B. I, S. 110。

乱的邊緣。財政大王所挑起和擴大的通貨膨脹，使廣大的人民群眾陷於貧困。被壓迫階級的貧困和苦難異乎尋常地加劇了，因而引起並加深了“下層的危機”。

### 8月罷工。推翻古諾政府

德國的政局從7月底開始，便急劇地緊張起來。廣大的人民群眾都極為緊張。大中城市里，常常發生罷工和反飢餓示威、舉行群眾大會和失業者的會議，從而使局勢緊張起來，提高了群眾的革命情緒。柏林革命的無產階級在接受阿塞拜疆工人的旗幟時曾表示：“我們在保衛着！叛徒和胆小鬼決不能再一次欺騙我們了！”<sup>①</sup> 為了反擊日益猖狂的法西斯勢力，德共曾號召工人階級動員、團結自己的力量，參加7月29日的反法西斯示威。7月22至29日，舉行了反法西斯主義周。在加根、勒姆斯却德、索林根、法蘭克福、哈雷、柏林以及萊茵省的許多地區，無產階級都結成打擊法西斯匪徒的統一戰綫，建立行動委員會<sup>②</sup>。甚至德國社會民主黨的中央機關報也不得不承認：“社會民主黨的群眾不會而且也不可能把保衛共和國的責任委託給政府。”<sup>③</sup> 千千萬萬的工人不顧政府7月27日的禁令和德共領導機構關於只准在秘密場所舉行群眾大會的決議，於7月29日，向法西斯主義舉行了強大的示威。

---

① Rote Fahne, 1923年7月15日。

② “國際工人運動”，1923年，第27期；第2頁。

③ Vorwärts, 1923年7月18日。

7月里，石勒斯物穆斯丁、波麦拉尼亚、汉诺威、东普鲁士以及萨克森等地区的农业工人，先后举行了罢工<sup>①</sup>。在反法西斯运动期间，不满情绪和准备斗争的决心达到了这种地步，以致于在许多地方，共产党费了很大的劲，才使农业无产阶级没有立即进行发动<sup>②</sup>。

8月初，马克又大为贬值了。印纸币的工厂来不及印刷急需的大量纸币，发工资的时间便推迟了。同时，农民拒绝以纸马克作为支付手段，不肯运货进城。商人们大批地关闭了空无一物的铺子。全国每个角落，都爆发了反饥饿的骚动和所谓“意大利式的罢工”<sup>③</sup>。格森基亨、波呼姆、多特蒙德、埃森以及鲁尔的其他城市里，有20多万矿工和五金工人举行了罢工。8月罢工在参加的人数方面，虽次于5月罢工，但在政治的尖锐性方面却有所超过。在上西里西亚、绍林吉亚、萨克森以及德国其他地区，都爆发了声势浩大的罢工。全国有300多万工人罢工<sup>④</sup>。许多工厂派了代表团到议会，到工会和社会民主党的领导机构，要求立即采取稳定马克的措施，保证供应粮食，并提高工资。在许多场合下，经济要求都带上了共产党提出的推翻古诺政府而建立工人政府这样的政治口号。

群众自发地进行猛烈的冲击，其力量是如此强大，本来表示工人政府简直是“胡说八道”、没有人可以代替古诺的工会和社会民主党的上层人物便要起手腕来了；为了拖延时间，他

① “国际工人运动”，1923年，第28期，第1页。

② P. 格尔别尔：上引著作，第149页。

③ 工人们到了工作地点，但不肯作工。

④ “1923至1924年的国际工会运动”，莫斯科，1924年，第32页。

們便同意舉行8月10日召开的、有德共參加的代表會議。

國內局勢無疑說明了日益加劇的政治危機，表明了群眾廣泛地革命化的過程。領導已經開始的鬥爭的任務，十分緊迫地擺在共產黨的面前；普通的共產黨人都走在戰鬥的無產階級的最前列（首先是通過工廠委員會）。可是，德共中央仍然跟在事變的後面跑，一再叫喊臭名昭彰的策略——“沉着”的口號。

即使在古諾內閣作垂死掙扎的時候，布蘭德列爾分子也沒有動員力量來反對資本的統治，他們仍然說：“社會民主黨的群眾尚未爭取工人政府，所以黨還不關心推翻古諾政府的問題。”<sup>①</sup>當時德共領導機構的伙計和師傅拉德克曾反對組織反法西斯鬥爭日<sup>②</sup>，後來又在“Rote Fahne”<sup>③</sup>上發表了論述德共任務的論文；他在論文中硬說，在德國，進攻的時刻尚未到來。拉德克寫道，布爾什維克奪取政權時有個7萬人的政黨；但是德國的資產階級比俄國的強大得多，組織得更好，因此，德國的工人階級為了取得政權，至少需要一個100萬人的政黨<sup>④</sup>。拉德克之流儘管這樣表示，但並未作一點工作來迅速增強黨的力量，爭取群眾到黨這一方面來。在推翻古諾前幾天舉行的黨中央全體會議上，曾提出“工人們準備舉行總罷工，我們應當領導他們；”當時塔里格麥爾回答說：“這是胡說

① “共產國際第5次代表大會速記報告”，第246頁。

② 同上，第451頁。

③ Rote Fahne, 1923年8月2日。

④ Ф. 格克爾特：“1923年10月的德國”（“共產國際”，1934年，第5期，第60頁。以下稱：Ф. 格克爾特；上引著作）。

八道!”作主要报告的布兰德列尔,坚决反对提出“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sup>①</sup>。

德共中央按照“莱比锡的精神”,执行着和平的、“分级的”革命发展方针——“最初是资产阶级联合,取而代之的是由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组成的社会民主政府,然后是共产党政府——不经过严重的流血斗争。”<sup>②</sup>

也许在1923年的德国,革命的“分级”发展在原则上是可能的。但是,只有群众的革命斗争才能推进事变、使革命从一个阶段进到另一个阶段。只有工人阶级统一的意志,才能迫使德国社会民主党同意建立工人政府——加以在议会中,社会民主党人和共产党人并没有取得大多数<sup>③</sup>。可是在社会民主党和工会的上层分子拒绝(8月10日的会议上)组织工人政府以后,德共实际上已取消这个口号;德共认为夺取无产阶级专政的斗争为时过早,也没有另外提出什么积极的政纲来。结果,“推翻古诺政府!”的口号只得到“大联合”的下场了。

在决定的关头,布兰德列尔分子退却了,不肯领导业已展开的斗争。走上政治斗争舞台的,实质上是党外的工厂委员会,它们也“领导了”8月罢工。

莱茵—威斯特法里亚工厂委员会的代表大会和柏林工厂

---

① Rote Fahne, 1923年8月8日。

② Die Lehren der deutschen Ereignisse (“德国事变的教训”——译者), Hamburg, 1924, S. 30 (以下称: Die Lehren …)。

③ 共产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在议会中共有190个议席,资产阶级政党——269个议席(Jahrbuch, 1923/24, S. 576)。



委员会的代表会议，于8月11日同时开幕。<sup>①</sup>除经济要求——规定平时的工资、没收储存的粮食等等，还提出了推翻古诺政府而建立工人政府的政治要求。在上述口号下，柏林工厂委员会的代表会议宣布了为时三天的总罢工。负责领导罢工的，是“15人委员会”——号称为“罢工委员会”的柏林工厂委员会执行委员会。在这一号召下爆发的总罢工，展开得如此猛烈，拥有这样的规模，以致震动了资本主义统治的整个大厦。

德国资产阶级害怕8月罢工转变为武装起义，便决定牺牲古诺内阁，而同意和社会民主党勾结在一起。

从5月罢工以来，政府在不产阶级一系列的群众发劲的面前，日益显得孤立无援。早在6月里，古诺就在一次演说中说过：“红色革命的危險籠罩着德国……”<sup>②</sup>在7月底至8月初，国内的政治气氛紧张到了极点；“上层分子的危机”——无法照旧生活和统治下去，在迅速地增长。“中派”的机关报“德国”带着恐惧的心情写道：“人们都带有不满情绪，更确切些说，是带有愤怒情绪。空气中充满着电流。一簇火花，就能引起爆炸。11月9日的情绪支配着一切。”<sup>③</sup>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上层分子拼命寻找出路。8月10日，斯脱莱斯曼在“人民

---

① 出席代表大会的除共产党人以外，还有97个社会民主党人，11个“独立派”，10个中派的代表，以及184个资产阶级政党的代表(Jahrbuch, 1923/24, S. 606)。出席代表会议的，有70%以上的柏林工厂委员会——20,000——的代表(同上；还参阅：“1923至1924年的国际工会运动”，第210页)。

② D. A. Z., 1923年6月12日。

③ 引自 Rote Fahne, 1923年7月29日。

党”議會党团的會議上，探討政府可能提出的方案——“大联合”、維尔特少数派的內閣或者是工人社会政府——时，曾坚决要求古諾辞职，要求采納社会民主党的首領关于組織資產階級和社会党的联合政府的建議<sup>①</sup>。斯脫萊斯曼指出：“再者，对于我們來說，这是一个使社会民主党中温和的、为国家着想的一派离开激进派的最后机会。”<sup>②</sup> 在討論新內閣合适的名单时，特別討論了駐陸軍部当时的领导人——格斯列尔繼續領導該部的必要性，因为把国家这条大船掌握在大資產階級手里（用斯脫萊斯曼的話來說，掌握在“我們手里”），总是妥当的<sup>③</sup>。

可是，正当上层的統治人物議論紛紛的时候，柏林8月11日的总罢工在头一天，就推翻了古諾政府。

“从古諾政府垮台的时刻起，內战的火花就飞遍了整个德国。”<sup>④</sup> 爭取建立工人政府的有利形势完全出現了。“积极情緒在街头激蕩。”<sup>⑤</sup> 广大的人民群众都已投入运动。罢工的浪潮从一个地区冲击到另一地区。8月13日，中央罢工委员会提出反对“大联合”、繼續展开斗争的号召，要求解散議會，重

① G. Stresemann. Vermächtnis, B. I, S. 78.

② 同上。在德国革命危机日益成熟的条件下，德国社会民主党內的力量向两极分化的过程加速了，“左派”形成了，它主要是由原来的独立党人組成的。7月29日，他們在魏瑪代表會議上，向党的領導机构提出了許多要求。一部分“左派”表示不信任古諾政府，不同意建立“大联合”。

③ G. Stresemann. Vermächtnis, B. I, S. 78.

④ Rote Fahne, 1925年10月23日，台尔曼的論文：“汉堡起义的教訓”。

⑤ “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速記报告”，第212頁（摘自布兰德列尔的发刊）。

新进行选举。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許多地方委员会(柏林、法兰克福、开姆尼兹等地)不願领导机构的意图,而要求不和资产阶级联合<sup>①</sup>。在工厂委员会中央委员会的号召下,罢工已經遍及全国。农业工人、特别是德国中部的农业工人,广泛地参加了运动<sup>②</sup>。有过这样的场合:为了組織对城市无产阶级供应粮食的工作,农业工人和監督委员会进行过合作。

但是,在最紧要的关头,共产党的布兰德列尔领导机构停止了斗争<sup>③</sup>。8月14日,柏林工厂委员会的全体大会通过了停止罢工的決議。工厂委员会的中央委员会和德共中央已把这項決議,分发给全国各地。

布兰德列尔分子不顧事实地宣称,要繼續作斗争“并没有内力”,推翻古諾以后,“运动就軟弱无力了。”<sup>④</sup>然而斗争是在高潮中被迫停止的。平靜一些的首都(順便說說,并不是沒有魯特菲雪尔分子参加),本来繼各地投入运动之后,可能重新动荡起来。在柏林停止罢工的时刻,汉堡爆发了声势浩大的罢工。在薩克森、紹林吉亚、符騰堡和德国中部,罢工都逐漸具有普遍的性質。卢卑克、馬格德堡、汉諾威、基尔等許多城市,都准备学习这个榜样。几天時間内,整个德国都轉入罢工和反飢餓的騷动中了<sup>⑤</sup>。

然而糟糕的是,并没有誰来組織和加强群众这种本能的、

① “国际工人运动”, 1923年, 第29期, 第2頁。

② P. 格尔别尔: 上引著作, 第149頁。

③ “共产国际第5次代表大会速記报告”, 第247頁(摘自台尔曼的发言)。

④ Die Lehren..., S. 30--31。

⑤ Jahrbuch, 1923/24, S. 603。

自发的抗議。台尔曼曾指出：“在反对古諾政府的运动中，这一点表現得很明显：群众比党前进得多，并使党感到意外。”<sup>①</sup>

8月12、13两日德共中央就支持工厂委员会主动精神所发表的声明，乃是落在运动后面的典型例証。推翻古諾以后，共产党实质上并没有斗争的政綱：“工人政府”的口号虽然还出现在党的报刊上，但已失掉具体内容了。

德共的毫无作为，对初期張皇失措的资产阶级上层分子很有利。“人民党”顺手取得了建立新政府的主动权。8月13日，該党首領斯脫萊斯曼組成了第一屆內閣，并在第二天，把內閣提交議會加以审核。除主要的资产阶级政党（不包括德国民族主义者）的代表以外，参加新內閣的还有4个社会民主党人：左尔曼——内政部长，吉尔费丁格——財政部长，拉德布魯赫——司法部长，P. 什米德特——副首相兼复兴部长<sup>②</sup>。按照“Kölnische Zeitung”的說法，这是一个“整齐的集团”。正象11月革命前夕一样，社会民主党又挽救了德国資本的統治地位。

### 行动中的“大联合”。斯脫萊斯曼

#### 第一屆內閣的危机和辞职

德国的上层統治分子又要了11月革命前夕的手腕，他們打算让革命热情有点出路，以便贏得時間，在集聚力量以后，再发动进攻。为了这个目的，让斯脫萊斯曼来担任首相的职

① E. Thälmann: 上引著作, 第1卷, 第50頁。

② Reichstag (“德国国会档案”——譯者), B. 809, S. 1183B。

位是最合适的了。斯脱莱斯曼是小商人的儿子，住过纳乌曼牧师的学校。尽管在策略上和党内同志有些分歧，但他把帝国主义政策和广泛的社会蛊惑宣传结合在一起，非常巧妙而又灵活地捍卫了德国垄断资本的利益。

由于德国在战争中的失败和 11 月革命，当时领导“民族自由党”的斯脱莱斯曼把战争进行到“胜利结束”的“爱国”活动便热火朝天了。他迅速地变换了自己扮演的“角色”，而挂上了“民主党人”的招牌。早在当时，他就企图钻出来领导国家，但由于他同斯丁纳和鲁登道夫的关系过分明显，结果便失败了。斯脱莱斯曼是个保皇党，是革命的敌人，他接受共和国是因为它已是既成事实。他认为魏玛宪法和同社会民主党人的联合，乃是为了走向公开的垄断组织专政而被迫采取的步骤。

斯脱莱斯曼的外交纲领——破坏凡尔赛条件、复活军国主义以及为战败复仇，也是完全符合德帝国主义的利益的。但是，和斯丁纳所偏爱的策略不同，他反对粗暴地、公开地拖延协约国的要求。他认为，采用“迂回的手段”和随机应变的政策，德国可以得到更多的东西。在自己的“Die Zeit”报上，斯脱莱斯曼在一篇没有署名的论文中写道：“我们所处的这个时期，乃是一个过渡时期。”<sup>①</sup>他不得不卷得象条黄领蛇，不得不恬不知耻地、根本不择手段地来保护日益复活的德帝国主义在国内外的障地。无怪乎编出了这样两句小调<sup>②</sup>：

① G. Stresemann. Vermächtnis, B. I, S. 272.

② 斯脱莱斯曼可以向左，也可以向右。

Strosemann, der mal links kann

Und mal rechts kann.

斯脱莱斯曼—吉尔费丁格联合的行动纲领，反映了工业大王的要求——镇压革命运动、“改善经济”以及消除鲁尔冲突。斯脱莱斯曼在议会中演说时，曾无耻地提出威胁：政府要全力利用自己“合法的专政”<sup>①</sup>。同时，他呼吁西方消除冲突，并且激动人心地宣称：“鲁尔冲突一解决，世界革命是否从东方传入中欧的问题也将得到解决；”他的政府可能就是“德国最后一个资产阶级政府”<sup>②</sup>；“德国的布尔什维主义就意味着英国的布尔什维主义。”<sup>③</sup>

在8月罢工高涨的时期，由于这次罢工的声势浩大而惊慌失措的资产阶级和社会民主党的上层人物改变了策略和手腕，而宁愿表示让步。在举行罢工的工厂里，企业主赶紧通知提高工资，发“临时补助”。社会民主党的财政部长吉尔费丁格宣布，对有产阶级课以“重”税。议会就对于收入和股份公司增税的法令进行了紧急的表决<sup>④</sup>，这件事和古诺的辞职，立刻在同一时刻通告给全国人民了。德国工会联合总会发出了传单，告诉无产阶级说，为了输入粮食，政府已拨出5千万金马克。几十辆汽车在街头散发传单，德国社会民主党和工会的

① Reichstag, B. 361, S. 11943.

② G. Strosemann. Vermächtnis, B. I, S 111.

③ Reichstag, B. 361, S. 11772.

④ 罢工前，计划提高税收100至140%（Berliner Tageblatt, 1923年8月9日）；新的法令则规定增税400至600%（同上，1923年8月13日）。8月11日发出了通知：根据物价飞涨的情况，来调整工人的工资和失业工人的补助款。提高工资立刻实行（同上，1923年8月11日）。

领导机构在传单中拼命许愿，号召停止罢工。

可是，无产阶级的战线上一发出停止战斗的信号，资产阶级就利用运动的自发性，利用群众由于突然停止斗争而陷于紊乱和茫然的状态，转入了疯狂的进攻。“大联合”政府首先注意的，是“内部危险”这一面：正象菲格列尔所宣称的，“不是对内政策的主人，就决不能顺利地推行对外政策。”<sup>①</sup> 革命工厂委员会已日益转变为共产党和动员群众的政治中心，因而首先遭到了打击。8月15日，哲维林格禁止工厂委员会中央执行委员会进行活动。几乎所有的地方政府，都照样行事了。柏林警察局长——社会民主党的里赫捷尔，于8月29日解散了柏林工厂委员会的执行委员会。工厂委员会的任何会议和代表会议，一律禁止举行；原订8月15日举行的柏林—勃兰登堡工厂委员会代表大会已被取消，后来才秘密地举行。全国开始了大规模的迫害。在德共柏林—勃兰登堡组织的区委委员会里，几乎有1/2的委员遭到逮捕和打入地下<sup>②</sup>。作为工厂委员会柏林执行委员会积极分子的共产党人，也被逮捕了。

头一次恐怖刚一过去，企业主立刻就取消了8月的诺言和让步。垄断组织的报刊号召关闭企业，解雇工人——“一箭双雕”的办法：免交很高的生产收入税，用饥饿来迫使工人们就范。工厂里开始大批地“清洗”8月罢工的积极参加者。单说柏林一处，就有10,000个工厂委员会的会员和革命工人被迫走向街头。8月中旬，鲁尔的矿主也采用了大规模的同盟歇

① G. Stresemann. Vermächtnis, B. I, S. 118.

② “国际工人运动”，1923年，第33期，第1期。

业——被解雇的有 200,000 名工人。

这一点也很明显：经济不改善，首先是马克不稳定，就不会出现持久一些的“内部平衡”。委派吉尔费丁格担任财政部长的职位除开政治原因以外，还有这样的意图：在实践中利用“财政资本”一书的作者广泛的理论知识。提高一点马克的购买力，这就是交易所对于吉尔费丁格上台执政的反映。

和前些时候不同的是，壟断集团已乐意消灭通货膨胀了。第一，这时候他们已经摆脱债务，发够了横财：通货膨胀的机器是为他们服务的，在德国社会各个阶级之间重新分配了国民收入。在国内革命危机日益增长的情况下，“能够挽救的尽量加以挽救”的任务已提到首要的地位。第二，从 8 月下半月开始，随着经济混乱的情况日益增长，保留下来的中间阶层在货币结算当中，逐渐采用美元或金马克来计算了。由于总罢工的影响，曾宣布对工人实行硬性的工资率——使工资和日益上涨的物价相适应。这些新的因素使发财致富的机会受到了限制。假如考虑到通货膨胀的政治后果，那末，保持马克贬值的局面不仅无益<sup>①</sup>，而且是危险的。

从 8 月底起，报刊上陆续出现了吉尔费丁格、德国工业帝国联盟以及格里弗里赫所提出的几个通货改革方案。要求立即建立新的稳定通货的呼声，从四面八方包围了政府。资产阶级的许多经济组织在给经济部门的一份专门报告中写道：“……几天以内，必须采取必要的措施，不然，全部经济生

<sup>①</sup> 原文是“有益”（выгодно），但从逻辑上看，应当是“无益”（невыгодно）；可能印刷上有错误。——译者



活就会完全破坏。”<sup>①</sup>

对于吉尔费丁格的无所作为，我们不能加以责备。为了改善财政状况，吉尔费丁格曾采取不少措施。可是，在他表现出改革家的主动精神的时候，果然遇到了壟断組織的反抗。对于“社会主义”部长的一切财政措施，大资产阶级都公开地予以破坏：他们逃避重税，大批地关闭企业，破坏吉尔费丁格的货币改革计划，等等。德国真正的主人决不能把如此重要的、牵涉到他们统治基础的改革，委托给一个社会民主党人；再者，这位社会民主党人由于某种必要，在自己的行动上还不得不保持着“社会主义的門面”。同时，德国真正的主人本身也无法采取什么措施——他们“既不能进行统治，也不能表示屈从。”有好几个月，德国资产阶级都无法克服通貨上的混乱现象，这一点和其他事实一样，也雄辯地说明了“上层的危机”。

“大联合”在财政上試驗的失敗（包括吉尔费丁格在内），以及通貨膨脹和預算赤字的日益增长，已經彻底破坏了消极抵抗的經濟基础。9月里，消极抵抗每天得花費4千万馬克<sup>②</sup>。同时，法国的冲突以及人所共知的外交上普遍孤立的局面，使德国政府无法镇压“内部的敌人”——工人运动。这一点斯脫萊斯曼是了解的。他曾在“人民党”議會党团的會議上宣称：“应当在严冬到来以前結束（消极抵抗——作者）。这种形勢乃是对外政策的基础。应当和法、比两国的代表建立联

① E. 瓦耳加：“德国最后一战的前夕”，莫斯科，1924年，第65頁。

② G. Stresemann, Vermächtnis, B. I, S. 110.

系。”<sup>①</sup>

官方应当使既成的事实合法化。实质上，从4月起退却就已经开始了。各资产阶级政党，仅仅在表面上支持抵抗。大家知道，鲁尔大王在镇压5月罢工时，曾公开地和占领者勾结在一起。当工人们的斗争规模很大的时候，杜塞尔多夫政府的副主席留捷尔别克曾写信给法军总司令<sup>②</sup>，信上提到德军曾帮助镇压巴黎公社，用革命来吓唬法军总司令，并请求把杜塞尔多夫、汉堡和杜伊斯堡的德国警察调往“受威胁的地区”，特别是调到格森基亨。在8月运动期间，几乎鲁尔所有的大企业都曾利用占领军的帮助来镇压工人。同时，和占领者进行的其他各种接触和联欢，也日益频繁了<sup>③</sup>。

从秋天起，特别在9月里，资产阶级报刊就公开主张停止对鲁尔的援助，“假如德国不愿意完全破产的话。”<sup>④</sup>斯丁纳在一篇论文中，曾呼吁政府“立即和协约国取得联系，共同决定应办的事项（提高德国人民的劳动生产率除外），以便使德国、欧洲和全世界免除必然的灾祸。这种步骤也许不是对外政策上软弱的象征……这也许只是在真理面前的勇敢表现而已。”<sup>⑤</sup>

斯脱莱斯曼政府企图反驳关于“背后打击”的责难，便力

① 同上，第116至117页。

② “红色工会国际”，1923年，第7期，第21至22页。

③ Rote Fahne, 1923年7月28日，标题“爱国者”一文；G. Stresemann. Vermächtnis, B. I, S. 95.

④ 参阅：Berliner Tageblatt, 1923年9月12日；Vossische Zeitung, 1923年9月17日。

⑤ G. Stresemann. Vermächtnis, B. I, S. 114—115.

求至少保持一个幌子，似乎停止抵抗是在取得一項内容貧乏的協議之后，而不是由于德国一方面投降的結果。可是，这些企图却遭到了普恩卡尔的鄙弃。普恩卡尔要求公开地、无条件地举手投降。

9月27日，即在魯尔的主人进行多日的討論和多次的商議以后<sup>①</sup>，政府正式宣布了“不幸的必要性”——停止消极抵抗，并号召人民“为了祖国而恢复工作”。<sup>②</sup>同时，为了禁止大規模的抗議发动，全德国便实行了戒严。行政权已由国防部长格斯列尔来掌握了。

于是，斯脫萊斯曼—吉尔費丁格政府暴露了：在和法国的冲突当中，要来收拾經濟破坏的局面与保持“民族的荣誉”，它是无能为力的。“下层”人民要抛弃业已破产的“联合”集团的决心，一天天增强了。

同时，“大联合”的政策也遭到了右面猛烈的抨击。德国民族主义者、法西斯分子、分立主义者以及“人民党”的壟断集团，都譴責政府沒有能力摆脱“社会主义俘虏的状态”，譴責它毫无作为，优柔寡断。斯丁納表示，最后5个礼拜并没有加以有效的利用，“应当更多地干活，創造支付手段，蹂躪薩克森和紹林吉亞。連一天也不能放过，不然，外面就会推翻斯脫萊斯曼內閣的。”<sup>③</sup>“Deutsche Allgemeine Zeitung（“德意志总汇报”——譯者）”再一次告訴了斯丁納：“吉尔費丁格既沒有向

① G. Stresemann. Vermächtnis, B. I, S. 第115至116頁。

② Berliner Tageblatt（“柏林日报”——譯者），1923年9月27日。

③ G. Stresemann Vermächtnis, S. 117.

我們提出一种办法，也沒有向我們提出一种适当的公式。”<sup>①</sup>“德国的議會制度已經僵化”，日程上摆的是专政問題<sup>②</sup>。特別感到憤怒的是民族主义者，他們要求行使“强硬的政权”，要求从政府中清除社会民主党人。民族主义者每一次都叫嚣：“我們要求明朗化！反对妥协政策！社会党人滚出政府！馬克思主义使德国陷于毁灭。”<sup>③</sup>日益法西斯化的家伙，曾以煽动的口吻控告“11月的罪人”投降了法国。

在巴伐利亚、魯尔省等地区，分立主义者的积极性都是在法国当局的支持下而得到提高的；分立主义者的企图是：一旦革命力量在国内取得胜利，他們就分裂德国，而建立“独立国家”（“莱茵共和国”、“多瑙联邦”等等）。西德現任总理阿登納，曾积极参与分立主义者的阴谋<sup>④</sup>。毫无疑问，巴伐利亚和莱茵的“福隆达”<sup>⑤</sup>都削弱了德国资产阶级的团结性和战斗性。

統治阶级的政策，出現了明显的危机——已无法用原有形式来保持自己的阶级統治了。上层統治人物，在联合內閣和軍事独裁这两种方式之間搖擺不定。

10月初，“人民党”以最后通牒的口吻提出了下列要求：以容納民族主义者的方式来变换內閣的人員；在解决財政、經濟和社会問題方面、首先在撤消8小时工作制方面，賦予改組

① D. A. Z., 1923年10月4日。

② D. A. Z. 1923年10月5日。

③ G. Stresemann. Vermächtnis, B. I, S. 145。

④ 参閱：O. Winzer. Der Vaterlandsverrat des dr. Konrad Adenauer. Vom Separatismus zur Integration Europas（“阿登納的叛变祖国，欧洲从分到合”——譯者），B., 1952；J. Peck. Dr. Konrad Adenauer (1917—1952), B., 1952。

⑤ “福隆达”是法王路易十四在位时对在朝党宣战的政党。——譯者

后的政府以非常的职权<sup>①</sup>。上述要求使社会民主党的上层领导人感到惊慌，这是因为接受最后通牒，就有党的威信将在工人们面前遭到破坏的危险。然而在分崩离析和动摇不定的情况下，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议会党团在10月2日晚間举行的会议上，本来已同意接受壟断资本家的要求。但是，工会抗議从立法上延长工作日的做法，妥协政策在这种压力下，便被否决了<sup>②</sup>。社会民主党从政府中召回了自己的党员。政府发生了危机，斯脱莱斯曼呈請辞职。根据艾伯特总统的委托，斯脱莱斯曼曾企图在挑选人员的基础上，組成“專务內閣”，但結果失败了。民族主义者拒絕了关于参加政府的建議。他們宁愿在革命环境中利用“左的”內閣行动，宁愿借用社会民主党人的手来压制工人运动。

同时，議會中各个集团正在加紧研究“关于工作日法令的适当的公式”<sup>③</sup>。对于“社会主义的”首領，具有意义的正是公式，因为这些首領早已就問題的实质方面，和斯丁納商議过了<sup>④</sup>。最后，“大家同意的公式”终于找到了<sup>⑤</sup>。“为了减少生

① G. Stresemann. Vermächtnis, B. I, S 139.

② G. Stresemann. Vermächtnis, B. I, S 143.

③ 同上, S. 145—146.

④ 早在3月7日，斯丁納就延长工作時間一事和斯脱莱斯曼談話时就曾宣称：社会民主党人对于这一点是“完全一致的”，“这样延长工作時間是必要的”(G. Stresemann. Vermächtnis, B. I, S. 43—44)。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报刊公开宣布过，必須“迈过”8小时工作制。K. 什米德特写道(S. M., 1923, № 7, S. 18)：“根据很容易达到的8小时工作制得出一項绝对的原则，在这項原则面前，其他的一切理由，由于阶级利益的緣故都必然显得毫无声息，这是不民主的”(还参閱：关于必須“提高劳动生产率”——一种摆脱危机的手段——的議論，Vorwärts, 1923年5月7日；S. M., 1923, № 9, S. 542; № 10, S. 583; 等等)。

⑤ 参閱：G. Stresemann. Vermächtnis, B. I, S. 145—146; Klassenkampf, 1923年10月5日。

产费用,提高生产”,社会民主党人已同意从立法上,把工作日延长到8小时以上。社会民主党人使吉尔费丁格回到了自己的写字台,失去了财政部长的职位<sup>①</sup>,他们然后参加了斯脱莱斯曼的第2届内阁。

重建的“大联合”,是向右转的一个步骤。尽管有人大声反对社会民主党人,但资产阶级的上层统治人物并未下定决心实行公开的资产阶级专政。这些统治人物宁愿在进攻的时候,让社会民主党人走在自己前面,并在他们的援助下,确定国内壟断组织的军事独裁。10月13日,国会通过了赋予政府以非常职权的法令。议会和宪法的保障业已取消,反动势力转入了公开的进攻。

### 9至10月的悲剧

秋天里,德国的局势向政治危机进一步加剧的方面迅速地变化着。9月底至10月,已出现直接的革命形势。发生政府危机、经常更换内阁、实行戒严、取消魏玛宪法的保证以及赋予政府以非常的专政权等等,都雄辩地说明了“上层分子”已无法按旧的方式统治下去,说明“上层分子的危机”。同时,革命力量尽管在8月中旬遭到某些破坏(突然停止8月罢工,宣布提高工资,由于社会民主党人参加政府而出现的一些幻想,“大联合”和企业主的种种迫害),国内的社会骚动并未停止。由于经济破坏和通货膨胀日益加深,引起8月高潮的一

---

<sup>①</sup> 委任的财政部长,是金融集团的代表留捷尔(无党派人士)。代替拉乌麦尔担任经济部长的,是科特(Köth,无党派人士)。

些原因在9、10月間还在发生更大的作用。分立主义者彻底揭露了资产阶级的美国行为，破坏了资产阶级在人民中间的政治领导权；分立主义者的阴谋对于国内革命危机的成熟，也起了促进作用。

经过短期和局部的低潮以后，群众运动在8月底，特别是从9月底开始，又席卷了整个德国。为了对付同盟歇业，鲁尔的矿工和五金工人发动了“叉手”罢工。工人们停工时往往不离开企业，而把企业控制在自己手里。9月初，在鲁尔金属加工工业里、在慕尔海姆和埃森地区，都发生了激烈的冲突；绝大多数(90%)采煤工人，都在“反对服从德国的焦炭老板，反对为法国佬干活”的口号下展开活动。巴登的罢工运动演变成总罢工。格森基亨区、汉堡、梅宁根等地的斗争，均具有普遍的性质。关于陷于绝望的工人及其家小的反饥饿骚动，关于小铺的被捣毁和自发的示威，关于“普遍的混乱”，关于和警察的武装冲突、牺牲情况等方面，四面八方所作出的报导都是一模一样的。例如，索林根的报导说，饥饿的人群万分激动，捣毁了粮食店。埃别尔菲尔德、杜塞尔多夫、格尔里茨、克利茨纳乌、格赫斯特、法兰克福、科伦、惠司巴登、美因兹、曼海姆以及柏林等许多城市，都作出了类似的报导。饥饿和贫困迫使人群奔向街头，举行示威和抗议。运动在日益扩大，并改变着性质。运动已从工人们的要求和对企业主的斗争，日益具有政治性质，并已演变为对政府的斗争：许多城市里都和陆军发生了流血战斗，“工人政府”的口号日益受到欢迎。

农民组织的反对情绪和革命情绪合而为一，同时共产主

义的影响在这些組織中日益加强——这种傾向是秋季革命高潮中突出的新現象。1923年10月10至16日在莫斯科举行的国际农民代表會議，很明显地加速了这种过程<sup>①</sup>。这次會議主要注意解决的，是形成社会主义革命的社会力量中的一个中心問題：建立工人、农业无产阶级和小农的联盟，为这一联盟制定統一的革命行动綱領。

不久，即1923年10月28日，在魏瑪城举行了全德代表會議，出席會議的有“帝国移民佃农联盟”、“劳动小农主联盟”、“巴登佃农联盟”、“黑森移民劳动联合会”、“吉格馬林根佃农移民联合会”，还有一些更为細小的組織<sup>②</sup>。参加會議的有40名代表，代表着各种小农和佃农組織的一百多万會員<sup>③</sup>。很有意义的是，会上也有工人的代表出席<sup>④</sup>。与会者討論的中心問題是，統一全德劳动农民的組織和同城市工人取得一致行动的問題。

由于魏瑪代表會議的召开，成立了“劳动合作”(Arbeitsgemeinschaft der schaffenden Landwirte, Pächter und Siedler)，这个組織在1923年拥有一百多万小农和佃农。参加“合作”主席团的，是各个联合組織的代表。当选为主席的是F. 格甫特，委員有H. 莫尔、F. 拉烏、P. 布尔基等人。會議通过了告城乡劳动人民书，其中說道：“劳动农民、佃农和移民的代

① 参閱：“第一次国际农民代表會議。演說、提綱和宣言集”，莫斯科，1924年。

② “农民国际”，1924年，第1期，第117頁。

③ Einiges Volk (“团结的人民”——譯者)。1923, № 1, S. 2。

④ 同上。



表一方面承担支持工人、职员和官吏的要求和斗争的义务，同时也期待工人、职员和官吏来支持劳动农民、佃农和移民的要求。只有居民中业已形成的一切阶层共同进行斗争，才能防止贫困和没落，挽救国家的统一，并为美好的将来打下基础。劳动统一战线万岁！”<sup>①</sup>

代表会议赞同了在德国建立工农政府的思想。不久，“劳动合作”就参加了国际农民委员会。

“小农佃农移民劳动合作”的成立，乃是建立全德中央劳动农民组织的第一步。该“合作”的个别代表尽管常常表示“不干预政治”<sup>②</sup>，但是“合作”参加农民国际，共产党人参加“合作”的活动，力图和城市无产阶级取得一致行动——这一切都说明劳动农民的立场方面有了非常重要的进展，说明城乡劳动者联盟形成的过程已经开始。

农业无产阶级、小农和佃农日益坚定地转到革命方面来了。例如，“德国农业工人联盟”（Deutsche Landarbeiterverband）中的对立情绪不断增长，该“联盟”的成员从1920年的80万人减少到1923年年中的40万人<sup>③</sup>，这就雄辩地说明了对于魏玛民主制和德国社会民主党政策的不满情绪在日益增长。农业工人——息维林和克尔泽多尔甫（勃兰登堡）的改良主义工会会员的会议上，通过了建立统一战线和赞同鲁尔革命的决议。9月里，绍林吉亚有许多地方——查格尔斯加乌哲、良德斯别格和涅布尔等地——都举行了贫雇农的会议。

① Einiges Volk 就在这一期上发表了“劳动合作”的纲领。

② “农民国际”，1924年，第2期，第100页。

③ Freie Landpost（“自由邮政”——译者），1923年，第3、4两期。

每次会上，都請有共产党人参加。例如，在涅布尔作报告的是甫列里赫。处处都就工农联盟的必要性通过了決議<sup>①</sup>。小佃农联盟在哈雷举行的10月代表會議，曾通过要求建立工农政府的決議。11月初，巴登佃农联盟的200个地方分会在弗萊堡代表大会上，贊同了国际农民代表會議的決議<sup>②</sup>。

资本主义政权最重要的政治支柱——社会民主党和改良主义工会在思想上和組織上开始瓦解，这就說明了“下层”的危机，說明了群众不愿意按旧的方式生活下去。当共产党的人数从1月到9月几乎增加了两倍的时候<sup>③</sup>，社会民主党連原有的一半党员也沒有保持下来<sup>④</sup>。“自由”工会减少了40%以上的会员<sup>⑤</sup>。例如，1922年工厂工会有726,428个会员，1924年就只有424,999个会员了；相应的情況是，紡織工会——715,359和404,279；五金工人工会——1,624,651和905,990；等等<sup>⑥</sup>。基督教等工会的情况也相类似<sup>⑦</sup>。

① “共产国际关于德国局势的公报”，1923年，第2期，第12頁。

② M. 契尔科夫：“农业无产阶级和德国革命”，“紅色工会国际”，1923年，第10至11期，第471頁。

③ 1923年1月，德共共有15万个党员（Die Internationale, №1, 1923, S. 6）；到秋天，德共的人数已增加到40万人（Jahrbuch, 1923/24, S. 51。“紅色工会国际”，1923年，第9期，第296頁）。

④ 根据1924年德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的統計，1923年1至3月間，社会民主党拥有1,261,070个党员（Sozialdemokratischer Parteitag, 1924, Protokoll... B. 1924, S. 16）。1924年初社会民主党的人数沒有記載。根据Jahrbuch(1923/24, S. 51)的統計，1923年底至1924年初，社会民主党只有51万个党员。

⑤ Jahrbuch, 1925/26, S. 747.

⑥ St. Jahrbuch, 1924—25, S. 296

⑦ Jahrbuch, 1925/26, S. 747.

社会民主党和工会中广大阶层深刻的革命化，不仅反映在工人们大批地离开它们的问题上，而且反映在左翼的形成这一点上。在不断的自发斗争的冲击下，左翼在许多场合下已逐渐反对起领导机构来了。斯脱莱斯曼在给从前的皇太子的一封信中，很熟练地预告过由于社会民主党人参加政府而造成的一些不必要的幻想。斯脱莱斯曼写道：“在党团（议会的——作者）和国内的政党之间，应当很明显地区别开来。政党比党团的领导机构更为激进。”如果进行选举，现在的首领能否留在原位上，是很值得怀疑的<sup>①</sup>。再者，斯脱莱斯曼报导梅克伦堡—什特列里茨议会的选举情况（选举的结果是，社会民主党人有 $\frac{1}{2}$ 的议席变为共产党人的了）时曾指出：“这就是群众激化过程如何进展的象征。”<sup>②</sup>

“工人阶级大半极端不满意社会民主党对官方所奉行的政策<sup>③</sup>”，首先是不满意该党和资产阶级勾结、在议会中投票赞成给予政府以非常职权的作法，在勃兰登堡社会民主党区委会（Bezirkverband）中央委员会于10月召开的代表会议上，也有所反映<sup>④</sup>。右翼关于信任德国社会民主党和议会党团的决议，在500票中仅得到5票。所通过的决议，规定要立即撤消党中央机关报“Vorwärts”的编辑什塔姆弗尔，召开党代表大会，叫社会民主党人退出“大联合”，等等。代表会议选出了新的区委会，其中左派占7人，右派仅有1人<sup>⑤</sup>。新的领导机构

① 参阅：G. Stresemann. Vermächtnis, B. I, S. 217.

② 同上。

③ S. M., 1923, № 12, S. 745.

④ 同上。

⑤ “真理报”，1923年10月23日。

表示，准备就一致行动的问题和共产党进行谈判。在法兰克福社会民主党的代表会议上，在绍林吉亚社会民主党的区代表会议上，在萨克森社会民主党人的代表大会（在德累斯登召开）上，以及在柏林党和工会的职员会议上，主要的气氛也大致相同<sup>①</sup>。在德累斯登召开的议会帝国党团的党代表大会上，曾投过不信任票（199票对20）<sup>②</sup>。“德国社会民主运动最后破裂”<sup>③</sup>的危险已经形成了。台尔曼曾表示：“无产阶级处处都相信斗争，并且认为，再过5分钟无产阶级革命必然会爆发。”<sup>④</sup>

但是，改良主义的障地在工人阶级中的削弱，并不是往往直接地引起了革命力量的加强。负号乘正号并不会自动地得出正号乘另一个正号的结果。不满现状的发展过程暗暗地日益成熟，仅能在客观上为革命造成一种潜在的可能性。1923年秋天，在资本主义蹂躏下的德国“土地燃烧起来了”，在事变的进程中，夺取政权的任务已摆在工人阶级的面前。

可是在当时，并没有一种力量能够引导群众的不满情绪走上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道路。

8月罢工以后，德共才开始进行武装斗争的准备<sup>⑤</sup>。“一切为了定在11月上半月的日期。”<sup>⑥</sup>首先，采取了进行军事准

① S. M., 1923, № 12, S. 745—746.

② 同上，第746页。

③ 同上，第745页。

④ “共产国际第5次代表大会速记报告”，第247页。

⑤ Die Lehren..., S. 31.

⑥ “共产国际”，1924年，第1期，第328页。

备的方针。德共中央委员会下面成立了以日.什涅列尔为首的军事委员会。什涅列尔负担武装无产阶级百人团的工作。许多城市里,都在训练工人自卫队。但是,党的领导机构对于军事技术方面给以一定的重视的时候,实质上,却忽视了从政治上动员群众展开斗争的问题。当时没有发动工人们积极购买武器,武装无产阶级义勇队的问题,被看作是一个秘密小组的事情。就是百人团本身,也往往成为装饰门面的了。“百人团并没有积极地和无产阶级的日常斗争有效地联系起来。”<sup>①</sup>这并不是偶然的。

无产阶级的自卫组织,只有在日常斗争的过程中、在工人群众从这些组织方面得到有效支持的时候,才能日益发展和壮大。可是,党的领导机构仍然采取阻止群众进行局部发动的策略<sup>②</sup>。顺便说一下,这一点在1923年秋天德国“下层危机”表现的性质上,已打下某种烙印。群众急于革命的情绪并没有汇合成5、8月罢工那种声势浩大的发动,而大半表现为尽管是大量的,席卷全国的但是小型的、分散的骚动、罢工和示威;这种骚动、罢工和示威是违反布兰德列尔分子而自发地

<sup>①</sup> “共产国际第5次代表大会速记报告”,第310页(引自蔡特金的演说)。

<sup>②</sup> 除大批失业等原因以外,德共的立场和以下的情况很显然有着直接的关系:和上一年相比,1923年罢工和同盟歇业的数字都减小了:

	1922年	1923年	1924年
罢工和同盟歇业的数字	5,361	2,209	2,012
受震动的企业的数字	57,607	31,611	29,218
罢工者和遭到同盟歇业的工人的数字	3,194,177	2,617,956	2,087,017
损失工作日的数字(以百万为单位)	29.2	15.2	36

(Jahrbuch, 1925/26, S. 751)。

出現的，同時，很明顯地反映了人民群眾要求超出“法制範圍”和發動革命的決心。

德共中央對於工廠委員會、監督委員會以及行動委員會等無產階級群眾組織的重視，也日益削弱了，雖然國內的局勢有利於（儘管有戒嚴和種種迫害）“自下而上地”取得一致行動。

德國的工人階級，有可能得到農業無產階級和半無產階級這些同盟者。除了已經指出的促使農村的革命積極性日益提高的原因以外，考慮到農民日益左傾和對立情緒在農民中不斷增長的政治前提，也是很重要的。所謂的对立情緒就是，11月革命和資產階級共和國並沒有解決德國的土地問題，也沒有滿足千百萬農民關於分配土地的要求，結果，便產生了某種失望情緒。德國社會民主黨是革命的領導力量之一和魏瑪共和國的創立者之一，由於一直忽視土地問題，該黨對於農民並沒有產生什麼重大的影響。

可見，1923年資產階級思想在德國農村中已遭到嚴重的危機，鞏固德共的陣地和工农革命聯盟的前提已經形成。黨在農村中的工作之所以大為活躍，也由於必須制止法西斯分子在農村中日益加緊的宣傳的緣故；法西斯分子力圖把農民騙上反動和戰爭的道路，不許農民轉到革命陣營里來。

德共從成立的時刻起，就在加緊摸索接近農民群眾的道路，逐漸擺脫了社會民主黨的傳統和錯誤。1920年在黨的統一代表大會上曾討論黨的土地綱領，就可以證明這一點<sup>①</sup>。

---

① P. 格爾別爾：上引著作（附錄）。

1923年曾几次试图把贫农的组织联合起来，实行“农村红色星期日”，有过在农村建立监督委员会并同工人进行合作的机会，中央的工会部从1923年5月起，为农业工人出版了一种杂志<sup>①</sup>，等等。但整个说来，德共领导机构是忽视农村工作的<sup>②</sup>。即便是在8月份，当准备斗争的方针已经制定以后，德共领导机构也还是没有对农民积极地进行政治工作，而只注意技术问题——计算粮食的储藏量，寻找运粮进城的方法。

党在革命战略和策略的具体问题上并不明确。在德国对待和实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原则和方式，已遭到歪曲而显得很混乱。上面已指出，关于革命和平发展的理论，关于在“资产阶级民主的范围”内有可能推行工人政策的理论，是广泛流行的。另一方面，左派几乎一整年都在要求直接夺取无产阶级专政<sup>③</sup>。关于动员群众进行革命的中心(机关)问题有着争论。许多左派的倾向是，使德国革命的发展成为1917年10月俄国革命的模样。

这方面曾提出以下要求：在德国建立苏维埃——进行武

---

① Freie Landpost.

② 烏布利希：上引著作，第66頁。

③ 8月里，德共柏林—勃兰登堡、汉堡—瓦塞爾康特、黑森—法兰克福、科倫—萊茵以及普法爾茨等几区的代表曾拟定一份決議，里面除战斗的经济纲领以外，还坚决地提出了夺取无产阶级专政的要求。但是，这份決議被党的领导机构否决了。同时，布兰德列尔表示：“现在，毕竟是禁止随意空谈无产阶级专政的时候了”（“共产国际”，1924年，第1期，第424頁）。台尔曼证明，在沿海地区召开的党代表大会上，对于想引导党夺取政权和无产阶级专政的要求，布兰德列尔曾这样回答：“如果你们还不停止空谈专政，你们就会开除出党”（“共产国际第5次代表大会速记报告”，第245頁）。

暴起义的机构和动员群众的政治中心。另一方面，德共布兰德列尔的领导机构指望进行“和平革命”，便否认苏维埃的必要性，他们认为，在德国工厂委员会能起苏维埃的作用。

9月里，德共内部的分歧已成为“德国委员会”讨论的对象。该委员会附属于莫斯科共产国际的执行委员会，里面有德共中央的代表参加<sup>①</sup>。委员会的几个委员（包括斯大林在内）曾断定，工厂委员会无法代替苏维埃，并提议立即建立苏维埃。另外一些委员，首先是托洛茨基、拉德克以及德共中央

---

<sup>①</sup> 参阅：“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10卷，第58至60页。举行8月罢工和推翻古诺政府，共产国际看作是德国局势大为紧张的象征，这种局势要求采取直接夺取政权的方针。8月下半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通过了“德国的局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提纲，里面说道：“危机正在成熟。决定性的事件已经迫近了。在德共的工作中、因而也是整个共产国际的工作中，已开始新的、具有决定意义的一章。德共应当迅速而又坚决地以日益逼近的、决定性的革命危机为目标。”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曾就“放弃”局部发动的策略警告过德共中央：“我们没法时刻加以提防，一直提防到决定性的战斗为止……把任何一种发动推迟到决定性的战斗的时刻，都是理论上的空谈，和实践中莫大的政治错误。”“危机正在成熟。希望是很大。只需要勇敢、勇敢、第三还是勇敢的时刻，已经迫近了”（引自O.B. 库西宁的著作，第11、15页）。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立场马上就告诉德共中央了。当时曾建议德共中央共同讨论既成的局势。为此，曾邀请德共代表来到莫斯科。可是，德共中央几乎在一个月当中，也没有明确地认识到当前事变的意义和严重性。德共中央的代表，于9月中旬才来到莫斯科。这些代表勉强地同意了还是一个月以前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对局势所作的分析。可是，根据库西宁同志报导，当时布兰德列尔已走入另一个极端。他觉得，取得政权已是一件轻而易举的、无可怀疑的事情了。“布兰德列尔过分地夸大了德共的战斗准备和军事准备，因而使执行委员会难于正确地认识到当前的困难和德国运动中的需要”（O.B. 库西宁：上引著作，第11页）。



的委員（經過某種動搖以後，季諾維也夫也附和這些人了<sup>①</sup>）則認為，工廠委員會可以承擔奪取政權的任務。托洛茨基聲稱：“群眾已逐漸團集在工廠委員會的周圍，總的說來，工廠委員會可以完成我們蘇維埃那樣的職能”，蘇維埃會變成一種“毫無內容的重迭形式。”<sup>②</sup>季諾維也夫曾附和托洛茨基說：“我們自己並沒有看出，它們（工廠委員會——作者）如何在實際上轉變為蘇維埃……<sup>③</sup>。……德國革命就其成分來說，將是一次純粹的、典型的無產階級革命。這將是一次地道的無產階級革命……。”<sup>④</sup>

---

① 共产国际的主席季諾維也夫和托洛茨基、拉德克一起，在1923年一整年都堅決地支持德共的右翼。季諾維也夫“離開”這個路線只是短期的，同時沒有改變問題的實質。例如，季諾維也夫站在共产国际執行委員會的提綱“德國的局勢和我們的任務”的立場上，總共只有三星期（O. B. 庫西寧：上引著作，第11頁）。在10月具有決定意義的日子里，季諾維也夫和布蘭德列爾分子一鼻孔出氣，贊同他們“迴避戰鬥”的路線。在10月退却以後，季諾維也夫和托洛茨基、拉德克及布蘭德列爾唱着一個調子，他企圖替德共中央的路線作辯護，便聲稱“我們過高地估計了形勢，革命尚未成熟。”季諾維也夫的“動搖”，為工人階級和德國的革命事業帶來了莫大的危害，不論他的“動搖”是由於這時期偶然的錯誤或者由於有意採取的方針。

② 引自 P. 格克爾特的著作，第 61 頁。

③ “共產主義革命”，1923 年，第 17 至 18 期，第 12 頁。

④ “共產主義革命”，1923 年，第 10 期，第 13 頁。還參閱：Rote Fahne, 1923 年 10 月 21 日。總是和這種理論一樣，季諾維也夫的演說也使德國許多共產黨人猶豫不決，因為他的演說違反了春天在莫斯科舉行的德國共產黨人會議所通過的決議。決議中曾指出，必須把中間階層爭取到德共這方面來（Die Lehren...，S. 18—19）。在把業已破產的城市小資產階級和農民群眾吸引到自己這方面來的問題上，德共的積極性很低，毫無疑問，也從這一“理論”中找到了自己的“根據”。

忽視中間階層、首先是農民——無產階級在革命中的同盟者——的作用，乃是產生這一概念的真正原因。和俄國革命相反，德國革命被看做是“典型的無產階級革命”。

“德國委員會”的大多數委員，都傾向於托洛茨基—拉德克那一面，在德國建立蘇維埃的問題被否決了。

要解決我們研究的這個問題，比當時的情況更要複雜一些。

擺開工廠委員會來進行活動，忽視工廠委員會，十有八九是不成的。工廠委員會（根據1921年的統計）擁有1,800萬工人<sup>①</sup>，工廠委員會的會員在1923年，則已達到150至200萬人之多<sup>②</sup>。8月罷工已表明，工廠委員會也能產生某種組織作用，能夠動員群眾去展開鬥爭。根據大致的統計<sup>③</sup>，到1923年秋天，共產黨人在 $\frac{1}{6}$ 的工廠委員會里擁有大多數，德共和德國社會民主黨的力量在 $\frac{1}{5}$ 的工廠委員會里是相等的，改良主義者則在其餘的工廠委員會里占有多數<sup>④</sup>。但是，關於革命工廠委員會按照企業的大小分布的資料並沒有考慮到，因此，上述數字沒有很確切地表明力量的對比。然而很明顯的是，例如，一個大型機器製造廠的工廠委員會和任何一個有20名工人的半手工企業的工廠委員會，在力量和作用上就不是相同的。根據某些統計，在1923年9至10月里，5,000個工廠委員會，其中包括德國2,000個大企業（有1,000多名工人）中

① C. Д. 姆斯基斯拉夫斯基：上引著作，第116頁。

② A. M. 潘克拉托娃：上引著作，第119頁。

③ 精確的統計未曾查出。

④ C. Д. 姆斯基斯拉夫斯基：上引著作，第119頁。

絕大多數的工厂委員會，都处在共产党的影响之下<sup>①</sup>。

但是，另一方面，如果把 1923 年秋天的那种工厂委員會，看做是对群众进行革命动員的完善而又現成的据点，也是不对的。第一，革命工厂委員會运动不很集中。設在紹林吉亞（在热奈城）的革命工厂委員會的中央执行委員會，在普魯士被禁止活动以后，只留下一个空名，連在 1923 年召开一次全德工厂委員會的代表大会也无法办到。第二，工厂委員會尚未作好进攻的准备。在政治方面，工厂委員會的活动实质上只是要捍卫共和国，可是，10 月里事情已发展到推翻資产階級共和国的地步。其次，在一个 35% 以上的居民从事农业的国家里，在實踐中实现“典型无产階級革命”的理論、而忽視农民的作用和利益，必然会遇到莫大的困难，其中具有对于德国革命前途的危險性。与托洛茨基之流的論断相反，工厂委員會在 1923 年秋天，还没有成为一种已把具有革命情緒的中間阶层团結到自己周圍的机构。这一过程在自发地发展着，并且仅仅处在萌芽状态。

由此可見，正象后来共产国际第 5 次代表大会的決議中所指出的<sup>②</sup>，工厂委員會可以成为苏維埃的基础，变为苏維埃的“先驅”。但是，預先必須切实地把工厂委員會运动集中起

<sup>①</sup> A. M. 潘克拉托娃：上引著作，第 196 頁。革命工厂委員會运动开展的地方首先是大企业，这个事实 M. 別尔捷洛特是承認的（M. Berthelot. Die Betriebsräte in Deutschland（“德国工厂委员会”——譯者），B. —Z., 1926, S. 86）。

<sup>②</sup> “共产国际文献”，第 405 頁。“工厂委员会运动乃是一种組織无产階級的新形式。真正革命的新工会将逐渐从这种形式中成长起来，在有利的条件下，这种新形式将成为建立工人代表苏維埃的萌芽。”

来,更大胆地使工厂委员会超出经济斗争的范围,使工厂委员会成为一种把中间阶层、首先是小农和农业工人的革命潜力集中起来的绝对可靠的中心。

但在实际上,德共领导机构显然低估了工厂委员会的意义。德共中央工会部在1923年6月交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报告中,曾断定“工厂委员会……并没有……作为革命斗争中一种辅助机关的必要,我国的经验已表明,工厂委员会只需要发挥宣传作用。”<sup>①</sup>共产党同意在萨克森建立“工人议会”,来代替向工厂委员会代表大会负责政府,也表现了这种立场。工厂委员会全德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进行得很缓慢,后来又遭到破坏;在很大的程度上,都是由于这一原因。这次代表大会,预定要发挥俄国革命中苏维埃第2次全俄代表大会那样的作用<sup>②</sup>。总的说来,德共忽略了工厂委员会,

① “红色工会国际”,1923年,第7期,第59页。

② 党的左翼曾多次(5或者6次)建议中央,召开全德的工厂委员会代表大会(参阅:德共柏林-勃兰登堡区委会1923年7月的决议,Die Internationale, 1924, № 10/11, Sonderbeilage, S. 18—19; 1923年9月12日的Die Internationale; “共产国际”,1924年,第1期,第493至497页;等等)。9月9日秘密召开的柏林-勃兰登堡工厂委员会代表大会(有300万工人的450名代表出席),曾号召工人、职员、官吏以及城乡劳动者监督生产,加紧为召开苏维埃代表大会和建立工农政府而斗争(Die Internationale, 1924, № 10/11, Sonderbeilage, S. 28—29)。10月4日在汉堡举行的工厂委员会代表大会、10月5日在开姆尼兹举行的工厂委员会大会以及10月9日在魏玛举行的绍林吉亚工厂委员会代表会议,都反映了群众的革命情绪日益增长,这些会议都曾号召建立行动委员会,以便准备总罢工,召开工厂委员会代表大会,以及建立工人政府。

“沒有把工厂委员会变成一种推翻资产阶级武器的。”<sup>①</sup> 尚未根除的社会民主党关于资本主义自动灭亡的偏见，崇拜工人运动的自发性，低估作为革命组织者和领袖的党的作用，这一些便构成了布兰德列尔分子政治战略的基础。

党在政策上和战略上，似是而非地把萨克森看作是德国革命的“熔炉”和“堡垒”，这是有缺点的、有害处的。由于这一方针；鲁尔区、柏林、沿海地区以及西里西亚这些准备作斗争的重要工业区的作用，便被低估了。党如此地醉心于“萨克森问题”，以致对全德国的政治就不重视了<sup>②</sup>。

同时，德共领导机构也不善于利用萨克森这个斗争的桥头堡，萨克森的所谓“政府试验”，终于断送了夺取政权的事业。

10月里，在德国政局大为紧张的情况下，共产党人是否参加萨克森政府的问题又提出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和德共代表一起研究了这个问题，并且作出了肯定的答复<sup>③</sup>。10

① “劳动报”，1924年1月11日。

② 后来，有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参加的1924年1月会议，严厉地谴责了德共选择起义中心的作法。“片面的、呆板的方针——仅仅从防守德国中部的阵地转入决定性的战斗——是错误的。这个方针忽略了其他的重要工业区和桥头堡，在萨克森的阵地不战而退以后，上述方针便成为组织遭到严重破坏的原因。党把一切的一切都摆到萨克森方面，并且达到这样的程度：党甚至没有设法对付失败的场合，准备退却的路线和一份后备的进攻计划，这是个严重的错误”（Die Lehren...，S. 103）。

③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德共的指示中说到：“我们这样估计形势：再过4—5—6个星期，决定关头就会到来。我们认为，应当立即占领一个直接有利的阵地。我们根据总的形势提出以下的看法，在目前形势下，应当在实际上提出我们参加萨克森政府的问题。蔡格列尔的支持者准备保卫萨克森，使它不受巴伐利亚方面和法西斯分子的威胁——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当参加政府，立即武装5—6万人。不去理睬蔡列尔将军。在绍林吉亚也这样办”（Die Internationale, 1924, № 2/3, S. 34）。蔡列尔将军是第4军区（萨克森）的司令。

月初，德共中央成立了执行小组，即派往德累斯登的“科普甫”（“头脑”之意——译者）。就成立社会党—共产党联合内阁的条件问题，曾和萨克森社会民主党的代表举行谈判。在谈判的过程中，制定了以下的纲领<sup>①</sup>：1. 共产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合作的目的是，保卫共和国，改善劳动居民的处境。在共和国的范围内，力求在经济中进行社会主义改造（首先依靠建立国家企业的办法）。使土地所有权共和国化。让具有民主（共和）情绪的军官来担任军中要职。禁止共和制的敌对分子进行活动。清洗国家机关中的敌对分子。建立保卫共和国的无产阶级百人团。2. 对于企业主的怠工和企业的关闭问题，采取紧急的、果断的措施。保证失业者得到工作。建立反对投机活动的监督委员会（在宪法的范围内）。保证供给居民粮食。3. 向帝国政府提出使国防军共和国化的要求。从立法上规定8小时工作制。

在这一基础上，财政部长赫尔德和经济部长弗里什于10月10日停止行使自己的职权，而把职位让给共产党的代表了。10月11日，建立了有共产党人格克尔特和别特赫尔参加的新政府。布兰德列尔被任命为国家办公厅的主任。10月16日，在绍林吉亚建立了“工人政府”<sup>②</sup>。

我们研究一下萨克森的共产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合作的行动纲领<sup>③</sup>，就不难看出，这份纲领充满着“保卫共和国”的

① W. Fabian: 上引著作, 第165至166页。

② 登涅尔作经济部长，科尔什作司法部长，溇保埃尔则被委任为国家的顾问。

③ 类似的行动纲领，也成了绍林吉亚“工人政府”的基础。

精神，但主要的条件——武装工人——在其中却没有得到反映。在談判的过程中，薩克森社会民主党人的首領曾劝告共产党人放温和一些，不要坚持武装百人团，这些首領还表示，如果必要，工人们会得到武器的。弗列斯涅尔說：“我是左翼社会民主党人，你們可以信任我。作为警察总长，我是拥有武器的；需要的时候，全部武器都将掌握在我們手里。”<sup>①</sup>看看警察局地下室里保存的武器，布兰德列尔就感到心滿意足了<sup>②</sup>。社会民主党人和共产党人联合的目的是要防止內战，这一点社会民主党人并没有加以掩飾。这种思想成了蔡格涅尔政府宣言中的主要思想；在以前，蔡格涅尔就曾向斯脫萊斯曼保証說，他力求“用已有的一切手段，来捍卫現存国家制度的基础。”<sup>③</sup>

共产党人参加薩克森和紹林吉亚政府这件事的本身并不是个錯誤。恰恰相反，德国的革命形势已証明这一步驟是正确的。建立工人政府，被看作是一項專門的軍事政治任务，其目的在于使革命先鋒队易于取得进一步战斗的桥头堡，在于发出一个夺取全国政权的信号<sup>④</sup>。可是，这一計劃的成功，不仅取决于阶级力量总的配置和共产党的战斗力量，同时还取决

① Ф. 格克尔特：上引著作，第 60 頁。

② 同上，第 61 頁。

③ W. Fabian：上引著作，第 160 頁。

④ 德共中央通过的起义計劃中規定：“无产阶级在薩克森开始发动，起而保卫工人政府……薩克森的无产阶级试图利用国家政权来武装自己，并在无产阶级人口稠密的德国中部地区，在南方的巴伐利亚反革命势力和北方的法西斯势力之間建立起一道隔壁。同时，动员群众以后，党就在整个国家里进行活动”（Die Lehren...，S. 5）。

于共产党部长的活动情况。

实际上,参加工人政府是必然的。在彻底动员群众(这工作开始得晚一些)以前,这件事已经发生——是通过和薩克森社会民主党人的上层分子进行议会谈判而发生的。“但是,由议会集团中产生的工人政府,即纯粹由于议会而产生的政府,也能使革命工人运动活跃起来。”<sup>①</sup>假如这个政府根据革命政策进行活动,并坚决打退资产阶级反革命势力必然的进攻的话。“工人政府最基本的任务应当是,武装无产阶级,解除资产阶级反革命组织的武装,监督生产,把捐税方面主要的负担轉嫁到有产阶级的头上,并粉碎反革命资产阶级的反抗。”<sup>②</sup>在和“左倾”社会民主党人的联合宣告破产的问题提出以前,参加了工人政府的共产党人始终应当坚持实行自己的要求;在消灭业已动员起来的反革命势力的斗争中,“左倾”社会民主党人决不会同意采取什么坚决措施——明白了这一点,破裂的问题就会提出来的。

但是,这一类工作毫无进展,相反的事情却作了许多。共产党代表所进行的,是通常的“议会活动”。蔡格涅尔政府曾批准关于城堡和领地仍然为流亡的王室所有的草案,此外,还付给了王室 1,400 万馬克的“补偿金”。共产党的经济部长格克尔特就给政府以财政援助等问题,同薩克森的工业家和银行家举行过谈判。反动官僚一个也没有解雇,无产阶级的机构一个也没有武装,反动分子一个也没有逮捕,资产阶级的财产一点也没有没收。尽管工人們的房荒达到了极点,但富人

<sup>①</sup> “共产国际文献”,第 301 页。

<sup>②</sup> 同上。



的住宅一幢也沒有征用。

早在共产党人参加蔡格涅尔内阁以前，帝国政府就公开提出过要实行镇压的警告，在“工人政府”成立以后，国防军便逐渐在萨克森和绍林吉亚的边境上集中了；尽管如此，共产党的部长们从最初的时候起，却采取防御的立场，不相信作斗争是可能的，因而也没有作斗争的准备。慕列尔将军查封了共产党的报刊，禁止监督委员会和无产阶级百人团进行活动，并拚命地为解散萨克森政府作准备<sup>①</sup>。将军们的战略是这样的：要在对方摆开架势，转入进攻以前，就把对方打倒。然而，共产党的部长们总还是这样说，他们是“以宪法为依据的”，尽管关于紧急状态的法令已经破坏魏玛宪法；他们还不厌倦地一再說：他们“只对议会负责……”<sup>②</sup> 屠杀的威胁已明显地摆在眼前，“工人政府”却不关心自卫的问题；尽管在萨克森以及整个德国，都很清楚地听到了日益迫近的革命爆发的声音，但“工人政府”甚至不想认真地动员群众，来反击反动势力的进攻。德国的每个角落，都转入了自发的斗争<sup>③</sup>。阻止群众进行局部发动，使群众等待“一致的打击”，共产党已无法办到了。

在这种条件下，政府力图胜过革命力量，便在10月18日对萨克森采取了军事行动。根据德共的战略计划，这一着乃

① H. Gast; 上引著作, S. 459—463。

② Die Internationale, 1924, №2/3, S. 35; “真理报”, 1923年10月23日。还参阅：“共产国际关于德国局势的公报”, 1923年, 第6期, 第1至4页(10月17日别特赫尔在魏玛森议会的演说)。

③ 参阅：“共产国际关于德国局势的公报”, 1923年, 第2期, 第12页; 第3期, 第10至11页; 第6期, 第9至11页, 第14页; Rote Sturmflagge, 1923年10月18日; 1923年10月19日; 等等。

是轉入公开斗争的信号。10月20日，在德累斯登召开了“科普甫”会议，通过了起义的军事计划：在10月22日夜里，沿海地区的工人们一致奋起，保卫萨克森。其目的是，使等待萨克森爆发起义的国防军指挥部失掉方向，使部分军队离开萨克森和绍林吉亚的边境。汉堡的发动，应当成为全国开始斗争的信号。第二天即10月21日，德共组织和无产阶级百人团的代表举行了会议，会上宣布了关于发动的决定。一位中央委员立即赶到汉堡向台尔曼传达党的决定。德共中央在一分特别宣言里，曾号召工人、职员、官吏和劳动农民“准备作坚决的斗争。萨克森的无产阶级一宣布总罢工，全国的工人都应当一同参加。”<sup>①</sup>

党的领导机构忠于尾巴主义的策略，它要投入斗争，却又害怕由于篡夺和“专政”的意图而遭到责难；党的领导机构便决定要得到萨克森社会民主党上层分子的批准。

10月21日，在开姆尼兹召开了有工厂委员会、工会、监督委员会、行动委员会以及工人合作社参加的代表会议<sup>②</sup>，讨论保证供应居民粮食的措施，讨论财政等问题。这次会议的意图，必须是宣扬政府的美德。共产党人决定利用这次会

<sup>①</sup> “真理报”，1923年10月24日。

德共柏林组织的人员在10月21日举行了会议，有3,000多人出席。会议一致通过以下的决议：“德国工人阶级斗争的历史性时刻已经到来。宣传过激性的要求的时机已成过去。我们最后的口号，必须作为日程上的实际要求提出来”（Rote Fahne, 1923年10月21日）。

<sup>②</sup> 工厂委员会——140人，监督委员会——79人，工会——102人，行动委员会——16人，合作社——26人，共产党的地方组织——65人，社会民主党——7人；总共有500名代表（“真理报”，1923年10月24日）。

議，把它作为一次临时安排的“苏維埃代表大会”，并决定用會議的名义，号召全国人民举行总罢工。政府代表吹嘘自己所作的好事和未来的計劃，一連吹了6个小时<sup>①</sup>，为时甚久而又令人厌弃。嗣后由布兰德列尔发言，他代表德共提議立即宣布总罢工，宣布政府有权成立干部团，以应付紧急状态<sup>②</sup>。

但是，薩克森社会民主党的首領坚决反对共产党人的建議。劳动部长格拉烏普声称，假如总罢工的問題不取消，而提交表决，社会民主党人就要离开会场。共产党人应当如何行动呢？应当让格拉烏普之流滚开，应当向群众呼吁。甚至布兰德列尔也証明，會議上“有90%的优秀无产者。这些并不是共产党人，而是愿意斗争的人們。”<sup>③</sup>人們等待“工人政府”和共产党人采取坚决的行动。国内是一种战斗情緒。例如，萊比錫的人民留在街头好几夜，等待开始斗争的信号<sup>④</sup>。相当大一部分社会民主党人，也贊成总罢工，贊成和共产党人結成統一战綫<sup>⑤</sup>。尽管工人的武装很弱<sup>⑥</sup>，共产党在工厂委员会

---

① “共产国际第5次代表大会速記报告”，第225頁。

② “真理报”，1923年10月24日。

③ “共产国际第5次代表大会速記报告”，第215頁。60至70%的代表都是共产党人(同上，第249至250頁)。

④ Die Internationale, 1924, № 2/3, S. 43.

⑤ P. Merker. Deutschland. Sein oder nicht Sein (“德国的生存問題”——譯者)。Mexico, 1944, B. I, S. 91; Rote Sturmflagge, 1923年10月18日。

⑥ 在薩克森，工人們共有800支步枪(Die Lehren..., S. 6)。

和工会中还没有取得优势<sup>①</sup>，完全的胜利并没有保证，但是，軍閥的挑衅和群众积极性的提高，已使国内的局势日益紧张，并为夺取政权的斗争创造了有利条件。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前夕，列宁曾指出：“等待‘形式上’的多数……是幼稚的：任何一次革命都不要等待这一点。”<sup>②</sup> 在开姆尼兹会议期间，从德国各个角落派来的通讯员成群结队地挤在走廊里，等待总罢工的号召。

但是，德共的领导机构对形势作不出正确的估计。他们并不了解工人们真正的情绪。

为了使发动时机的选择不致于有错误，就应当在“生命的神經”跳动的地方进行。列宁曾写道：“把我们的整个党团都集中到工厂和营房中去，那我們就能正确估计到开始起义的时机。”<sup>③</sup> 而布兰德列尔仅仅在开姆尼兹会议上，才从国外归

---

① 秋天里，即在运动最高涨的时候，根据工会代表大会上的表决推溯，工会中的革命反对派已拥有3、4百万张票（“国际工会运动”，1923至1924年，第213页；“红色工会国际”，1923年，第9期，第290页）。早在1923年1月里，布兰德列尔就曾宣布，德共可以代表2、3百万工人说话（Die Internationale, 1923, № 1, S. 9）。在鲁尔、上西里西亚、萨克森、德国中部，德共的阵地是相当巩固的（Die Lehren., S. 23）。

② “列宁全集”，第26卷，俄文第4版，第2页。

③ “列宁文选”，1950年莫斯科中文版，两卷集第2卷，第142页。德共中央“作革命计划”是多么幼稚和轻率，从下列事实可以得到说明：早在8月里，就已把决定性的发动安排在11月革命周年纪念的时候。预定要发挥第2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作用的全德工厂委员会代表大会，决定在1923年11月9日召开。可是，德国的事态并不是按“计划”进展的，进展得比“计划”要快得多。这一点，使共产党的领导机构更为混乱了。他们往往无法选定打击的时机。

来以后破天荒第一次地……和无产阶级群众有了联系。”<sup>①</sup>他在共产国际第5次代表大会上承认过：“我并没有参加过任何会议。”<sup>②</sup>布兰德列尔分子害怕格拉乌普的威胁，把他的声明看作是群众的意见，他们甚至不想把总罢工的问题提出表决<sup>③</sup>，他们在没有共产党人在场的时候<sup>④</sup>，偷偷地投降了。布兰德列尔曾建议选出一个平等的委员会，以便使两党关于总罢工的看法取得一致<sup>⑤</sup>。委员会立即开了会，经过几小时的讨论以后，通过了一个关于建立“行动委员会”的调和性的决定，该委员会在形势紧张的情况下，可以宣布罢工<sup>⑥</sup>。这是一个退却的公式。共产党没有经过战斗，就交出了自己的阵地。6万个国防军的士兵起来反对萨克森，“屠杀”开始了，而共产党的部长们仍然无所作为。“科普甫”和拉德克“推迟了”起义，让萨克森的工人听任慕列尔将军屠杀，然后，他们就坐货车悄悄地溜到柏林去了。一直到月底——德国革命形势很紧张的日子里，德共的领导机构还在束手无策地乱窜一通，而把精力和时间都耗费在毫无结果的会议和讨论“做什么”上面

---

① “共产国际第5次代表大会速记报告”，第214页（引自布兰德列尔的发言）。布兰德列尔于10月8日，离开莫斯科回国（Die Lehren…, S. 24）。

② “共产国际第5次代表大会速记报告”，第215页；Die Lehren…, S. 25。

③ Die Lehren…, S. 6。

④ “共产国际”，1924年，第1期，第480至481页。

⑤ 建议以1票的多数而得到通过（“共产国际”，1924年，第1期，第472页）。

⑥ “真理报”，1923年10月24日。

了<sup>①</sup>。

应当做什么，汉堡的情况已经指明了。在开姆尼兹代表会议以悲剧而告结束的同一天，造船工人就在汉堡举行了会议。通过了这样的决议：在沿海地区发动总罢工，来捍卫萨克森<sup>②</sup>。工厂委员会中央执行委员会号召举行总罢工和起义的宣言，传遍了全城。宣言中说，“任何延误都是自取灭亡。必须在全国同时发动斗争，因为德国中部的工人孤立无援的斗争可能遭到失败……决定性的时刻已经到来。”<sup>③</sup> 10月21日晚，沿海地区德共组织的领导机构举行了会议，会上通过了在10月23日开始起义的决定。

10月23日拂晓，起义爆发了。共产党人的战斗队伍几乎手无寸铁，却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占领了汉堡和郊区的13个警察所。进攻是这样的意外和迅速，警察们根本来不及抓到武器，只好不战而降了。结果，起义者几乎是赤手空拳地夺到了武器。以台尔曼为首的300名共产党人同6,000个武装到牙齿的警察、国防军和海军陆战队的士兵，英勇地进行了三天三夜的搏斗<sup>④</sup>。许多街上都筑起了街垒。起义的中心据点，是汉堡郊区的巴尔姆别克。居民中各个阶层——妇女、老人、儿童，都尽力帮助了共产党人的队伍。修筑街垒的，主要是没有

① Die Lehren..., S. 6, 10 等等。“共产国际第5次代表大会速记报告”，第227页。

② “共产国际第5次代表大会速记报告”，第249页。

③ 引自瓦·达维多维奇的“1923年的汉堡起义”，“历史问题”，1948年，第11期，第31页（以下称：瓦·达维多维奇：上引著作）。

④ Rote Fahne, 1925年10月23日。

武器的工人及其妻子。他們还送来子彈和食物。斗争是在人民当中进行的，“况且在斗争火热的当中也好，在斗争结束以后也好，居民中連一个叛徒、一个告密者也沒有出现过。”<sup>①</sup>

汉堡警察局虽有装甲汽車和飞机的装备，却无法对付起义者。卢卑克的警察被請来援助汉堡警察局，国防軍已从整个德国北部的沿海地区集中<sup>②</sup>。中央政府也采取了紧急的措施来加以援助。

在斗争紧张的时刻，党的领导机构从柏林发出了电报，命令停止业已发动的起义。德共中央的专差带着相同的命令，

<sup>①</sup> “共产国际”，1924年，第1期，第343页。“真理报”的記者报导說：“对于战斗着的同志们，居民在这一次所表现的同情态度，我从来还没有见到过。工人们根本不用說了，甚至居民——小舖老板、官吏、自由职业者，对于埋伏在战壕里和街垒中的英雄們，也都是抱着明显的同情态度的。他們送东西給战士们吃，向他們提供各种有关敌人动静的情报。一位小舖的女老板冒着生命危险，穿过軍事区，而把120发子彈帶給了一位相熟的共产党员。修筑街垒的，主要是党外的妇女；砍倒古树，破坏桥梁，挖战壕，运送干这些活計的工具，都是这些妇女干的。在这些日子里，我亲自在城里跑了很多，听大家的談話，看短促的會議情况，但我根本沒有听到过一句责备共产党人的話。相反，我倒多次听到，人們高兴得要命地談論着‘这些青年人’的英勇行为。我曾走到一些衣冠整整的人們眼前，但他們也說：‘这些人难道可以責难嗎？’”（“真理报”1923年，11月7日）。

社会民主党在汉堡的警察局长甘哲曾以悲痛的笔調写道：“全部斗争中最重大的事件，并不是我們无法对付手上掌握的警察队伍这一威胁；最糟糕的是，这次和以前不同，共产党人非常秘密地进行了长期而又充实的准备工作，而我們却毫无所知。共产党人的情况，我們以前总是十分了解的。我們能了解，并不是因为派了暗探到共产党人那一边，不是因为这一点；善良的公众、特别是依附社会民主党的工人們，总是把共产党人的情况告訴我們。而現在，各界人士的情緒是：誰也不乐意向警察局汇报情况，各界居民都同情共产党人”（引自“共产国际”，1924年，第1期，第351至352页）。

<sup>②</sup> “共产国际”，1924年，第1期，第355页。

于10月23日来到了汉堡。薩克森不战而退，沿海地区的斗争已陷于孤立，原先打算发动各个港埠的台尔曼司令部知道了上述情况，便下令停止发动。可是，汉堡的战斗仍在继续。要说服起义者必须退却，是十分困难的。战斗已很明显地表明作斗争是可能的，胜利已近在眼前。送退却命令到街垒来的第一个工人信差，被猛打一陣嘴巴子而倒了下去。为了使起义者服从这道命令，台尔曼不得不亲自来到街垒中<sup>①</sup>。10月24日，当警察得到大批援军而开始用野炮轰击街垒的时候，退却便开始了。退却进行得很熟练，纪律非常好。不仅安然无恙地撤出了参加战斗的全部人马，同时还把武器藏好了<sup>②</sup>。尽管已经退却，但汉堡的无产阶级并不觉得吃了败仗。有了斗争，便能够感觉到工人阶级的力量，使工人阶级对未来的胜利充满希望，而树立坚定的信心。

汉堡起义最充分地反映了国内的革命形势。应当作什么，这次起义已明显地向德共指明了。但是，共产党依旧是不战而退，革命形势最后的时日便被放过去了。

### 反革命势力的胜利

当时，已掌握非常职权的政府和将官们加紧进攻了。汉堡的起义者遭到屠杀。国防军赶紧开到了薩克森<sup>③</sup>；在炮火的威胁下，斯脱莱斯曼10月27日提出了要蔡格涅尔于24小

① 瓦·达维多维奇：上引著作，第21页。

② “共产国际”，1924年，第1期，第356页。

③ Die Reichswehrgreuel in Sachsen im OK/Nov. 1923 und die Blutschuld der Sozialdemokraten (“1923年10至11月国防军在萨克森的暴行与社会民主党的血债”——译者)，B. 1924, S. 11—12。



时之内呈請辞职的最后要求——使用的借口是：共产党人宣傳暴力，政府里有他們参加是不符合宪法的<sup>①</sup>。

为了回答最后通牒，德共曾建議号召德国无产阶级举行总罢工。但是，蔡格涅尔只同意准备罢工<sup>②</sup>。同时社会民主党的薩克森組織也发表了宣言，要求“咬紧牙关”，“尽管有人挑衅，但要保持安静。”<sup>③</sup>再者，蔡格涅尔政府拒絕了斯脫萊斯曼的最后通牒。10月29日，艾伯特总统根据宪法第48条，委派帝国專員(加依哲)来改換薩克森政府。加依哲到达德累斯登以后，便建議蔡格涅尔打扫政府大厦。在約定的时刻，国防軍扛着机关枪，吹吹打打地占領了議會，用武力把部长們赶出了大門。同时，根据慕列尔将军的命令，对薩克森的其他机关也进行了武装“清洗”。

軍閥的恐怖行为，并没有遇到有組織的反抗。仅仅在10月30日，共产党、社会民主党和薩克森的工会才号召无产阶级进行为期3日的抗議罢工。响应这一号召的企业寥寥无几，这是因为预先沒有进行組織准备；工人們沒有武装起来，由于慕列尔以前的一些措施，工人們在各方面都弄得毫无生气了。此外，在“民主党”議員的支援下，第2天在薩克森成立了以社会民主党的弗里什为首的新政府，这个政府曾号召停止罢工，保持安静，遵守“秩序”。

① G. Stresemann. Vermächtnis, B. I, S. 184—187.

② 社会民主党的季特曼在“薩克森真相”一文(Vorwärts, 1923年11月2日)中写道，早在斯脫萊斯曼提出最后通牒以前，蔡格涅尔就已两次(10月23日、25日)表示，他要把共产党的部长赶出政府。

③ “国际工人运动”，1923年，第41期，第4頁

为了声援薩克森和汉堡的事件，全国都爆发了罢工和骚动，工人们同国防军、警察发生了流血冲突。但是，这些发动是自发的、分散的，时间先后不同，不是一致的行动。德共既然放过了引导群众进行革命的时间，现在就无法迅速地动员群众，把他们卷到运动中来。在“红色的薩克森”遭到镇压以后，紹林吉亚的“工人政府”也被解散了。战略上重要的桥头堡已经失去。同时，政府和垄断组织勾结在一起，依靠非常的职权和总的专政，夺去了德国无产阶级最重要的果实——8小时工作制。

德国资产阶级打击“左面的敌人”以后，对于“大联合”逐渐不感到兴趣了。和社会民主党人决裂之所以更为必要，是因为他们一参加政府，就造成了右面的反对派。形形色色的分立主义者、法西斯分子和民族主义者，都要求首先“结束社会主义”。对于他们的障地、特别是对于巴伐利亚独裁者卡尔的要求，资产阶级是极为关切的。斯丁纳很露骨地表示过：谁不和巴伐利亚达成和平协议，“谁就不能统治德国。”<sup>①</sup>另一方面，由于和资产阶级勾结在一起，由于参与对工人的血腥屠杀，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机构的名誉很坏，因此，恢复名誉、故意采取反对立场的问题，对于该党的领导机构来说，也是迫切需要的了。在“处死”薩克森以后，社会民主党的议会党团曾表示，现存的联合政府要维持下去，得作到以下几点：1. 取消紧急状态。2. 公开谴责巴伐利亚当局破坏宪法，对它们进行适当的制裁。3. 把建立薩克森秩序的任务交给警察。撤出国

<sup>①</sup> G. Streserunn. Vermächtnis, B. I, S. 197.

防軍(只是根据国内地方政权的要求)。赶走軍隊中的反动分子<sup>①</sup>。政府沒有接受这些要求,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部长們便在10月2日退出了斯脫萊斯曼政府。

“大联合”的建立在当时曾証明,资产阶级不和社会民主党合作,就无法維持自己的阶级統治;但是,“大联合”的瓦解并未証明,資本主义的統治是穩固的、持久的。实际上,社会民主党人退出政府只是斯脫萊斯曼辞去元首职位的序幕。斗争是圍繞着統治的方式和方法进行的。极端反动的民族主义集团和將官們,要求立刻向右大轉弯。早在10月初,即在由于社会民主党人离开而造成危机的时候,塞克特就向斯脫萊斯曼表示过(柏林市长馬列茨基这样証明):“您不能作元首,辞职吧,为祖国牺牲吧。”<sup>②</sup>11月8日希特勒在慕尼黑发动的“酒巴間暴动”以及分立主义者的阴謀(尽管到年底时已在平息)等等,都是这一斗争的反映<sup>③</sup>。

但是,建立公开法西斯专政的企图,并没有得到国内外有力的支持。德国资产阶级宁愿采用議会的統治方法(在复杂

---

① G. Stresemann. Vermächtnis, B. I, S. 197.

② 同上,第198頁。

③ 分立运动的最高潮,出现在10月下半月。10月21日,分立主义者布拉亨开始了武装发动,10月22日——在克列弗尔德,10月23日,占领了慕尼黑—格拉德巴赫和杜伊斯堡。10月22日,法国地区发生了分立主义者的暴动。几天之内,先后占领了基利巴登、美因兹和波恩等城市,到10月底,莱茵区的城市已占领一大半。10月25至26日,东科布林茨建立了莱茵共和国临时政府。分立主义者在国内革命局势激化的时候表现了很高的积极性,这并不是偶然的。他們的积极性表明,西方的大资产阶级力求通过分裂德国的途径,使革命不致于在德国的全部領土上取得胜利。

的情况下,这种方法比较安全和灵活),同时拥有非常的职权,和社会民主党人建立 *modus a vivendi*<sup>①</sup>。另一方面,英法两国的统治集团把民族主义势力和法西斯势力的胜利,看做是对凡尔赛条约的威胁<sup>②</sup>。这些情况、首先是德国人民对于民主与和平所表现的鲜明的意志,决定了法西斯暴动的命运:暴动并没有胜利。由于政府发生危机,结果在11月底组成了“纯资产阶级的”B. 馬克斯(中派的首領)內閣。斯脫萊斯曼担任外交部长的职务。在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的支持下,12月初通过了关于赋予政府非常职权的第二道法令。

国内的經濟情况,仍然是资产阶级政权不稳固的重要原因。尽管馬克已在11月下半月趋向稳定,但“痊愈中的危机”却很尖锐,同时生产减少,信用不够,工人失业的非常多。

德国就这样慢吞吞地、很费劲地摆脱了危机。统治德国的“上层”,几乎到年底还是忽冷忽热的。

由于工人阶级没有成熟的、有經驗的政党,“下层”不能采取革命行动,这是德国资本主义政权日益巩固的决定性条件。尽管德国社会民主党在群众中的影响很小,但是,这种影响仍然可以使无产阶级先锋队建立工人阶级统一战线努力化为烏有。德共不能抛开、甚至違反社会民主党的意志,来引导群众反对资产阶级的统治。从軍事技术上、政治上和组织上准备作斗争的期限,都错过了。后来,急急忙忙开始的动员群众的活动突然中断,而提出了不战而退的口号。这种情况,不能不在某一部分工人当中引起慌乱、冷淡以及“极左傾的”情緒。

① G. Stresemann. Vermächtnis, B. I, S. 193.

② 同上,第193、195、205頁。

經濟上長期破壞，人們的精力便衰退了。長期失業<sup>①</sup>、糧食等生活必需品不夠用以及生活上亂成一團，都消耗了工人們的體力和精力。此外，還有反革命勢力的恐怖活動所產生的後果。在進攻薩賓森以後，緊接着又對德共和無產階級組織進行了無數的迫害：成千上萬的黨的工作幹部和積極的工人被逮捕而關進了監牢，共產黨的報刊全被查封，印刷廠被沒收，罷工被宣布為非法行為，並遭到彈壓。鼓動群眾的機會，對共產黨人來說，已萬分難找。11月23日，德共被禁止活動了。

10月失敗之後，共產黨內立即展開了激烈的爭論，黨的戰鬥力因而削弱了。討論的中心問題是如何估價10月和統一戰線的策略。在鬥爭的過程中，黨分裂為三個部分：除左派和右派以外，還出現了一個“中派”。“中派”裏面有許多真正革命的工人，他們既反對德共的宗派主義，也反對德共的機會主義領導；但同時，在“中派”這一部分里，也有不少形形色色的調和主義者。

除極少一部分人以外，全黨都譴責布蘭德列爾分子的政策，這一事實很能說明問題。到1924年初，德共的右傾已被粉碎。布蘭德列爾輩成為無兵之將了。這種情況再一次說明了黨員群眾的情緒，說明“制止”鬥爭以及後來不戰而退的策略都是錯誤的。

“改良主義的堡壘”——工會發生嚴重的危機，乃是無產階級自發地抗議德國社會民主黨和德國工會聯合總會領導機

<sup>①</sup> 1923年12月，60至70%的工人成了失業者。德共有50至60%的黨員不在共產部門干活（“國際工會運動”，1923至1924年，第211、216頁）。

构的政策的表现。但是，舒馬赫所领导的<sup>①</sup>德共工会都处在左倾宗派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情绪的影响下，并没有争取团结，加强共产党在已有的群众组织中的影响，反而走上了建立无足轻重的“红色”工会的道路<sup>②</sup>。在“左派”的影响占优势的地区，几乎所有的成员都离开了德国工会联合总会。同时，还往往强迫革命分子离开工会。德国工会运动在组织上进一步瓦解的过程正在发展。劳动者建立统一战线的道路上，出现了另外的障碍。

分裂状态成了工人阶级胜利最重要的障碍，也成了反革命势力强大的主要条件。但是，西方采取了紧急措施来缓和德法两国的冲突和拯救德国资产阶级的统治，可见西方的支持也具有同样的意义。早在8月11日，即在革命危机显然已经成熟的时刻，英国政府就曾放弃“旁观者”的策略，而声明法国侵入鲁尔是非法的，并建议把全部问题提交仲裁法庭来解决<sup>③</sup>。10月22日，英国外交大臣寇松曾建议美国参加讨论德国支付能力的国际会议。10月25日，美国回答同意。在最紧急的关头，德国上层统治分子得到了这些“十分美好的消息”<sup>④</sup>，他们便把全部力量都用来镇压日益高涨的革命了。可见，在德国外部敌人的阵营里没有严重的纠葛，对于无产阶级

① 参阅：“共产国际第5次代表大会决议”，速记报告第2部分，莫斯科—列宁格勒，1925年，第116页。

② 1923年，有4个工会参加“红色工会国际”，1924年这样的工会已有12个（Jahrbuch, 1925/26, S. 747）。

③ G. Stresemann. Vermächtnis, B. I, S. 108.

④ 同上，第189页。引自斯脱黎斯曼在1923年10月29日内阁会议上的声明。

的失敗，具有重要的意義。

德國革命動力的分裂，英美資本在政治和經濟上的干涉，以及壟斷組織障地的鞏固，便為德國資本主義的穩定創造了前提。

\* \* \*

後來，關於“德國10月”失敗的原因還談論過不少。在10月退却以後，德共內部立即開始了討論。早在1923年11月初舉行的德共中央擴大全會上，布蘭德列爾的中央和反對派就對黨的策略提出了兩種不同的估價<sup>①</sup>。但在這次全體會議上，既沒有完全了解失敗的規模，也沒有徹底弄清失敗的原因。右派也好，左派也好，在自己的提綱中都認為，在最近，局勢進一步緊張起來是不可避免的。

全會召開以後，討論更加展開來了。布蘭德列爾及其志同道合者提出了故意歪曲10月中力量對比情況的統計，他們企圖證明：由於具有難以想象的困難，起義乃是一種百分之百的愚蠢行為。他們硬說：“10月的退却是正確的，是不可避免的。10月失敗的主要原因是客觀方面。實際上，這並不是中央策略上的錯誤……”<sup>②</sup>恰恰相反，左派則聲明，局勢有利於工人階級取得勝利，起義無疑是黨的職責。德共中出現的“中派”小組雖然不同意左派關於起義的勝利所抱的樂觀態度，同時也嚴厲地證實了布蘭德列爾黨中央的消極情緒。在1924年年初以前，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中的托洛茨基分子實

<sup>①</sup> 參閱：“共產國際關於德國局勢的公報”，1923年，第10期，Die Internationale, 1923, № 18。

<sup>②</sup> 參閱：格克爾特：主引著作，第62頁。

际上还在无条件地支持德共的右翼。

1924年1月里，苏共、德共（右派、左派和“中派”）以及其他几个国家的代表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在一起，开会讨论了“德国问题”<sup>①</sup>。左派的报导，就布兰德列尔对10月退却的情况所作的说明提出了重要的修正。但是，右派仍然替业已破产的策略作辩护。托洛茨基分子赶紧出来帮助右派了。拉德克代表托洛茨基、皮达可夫和他本人提出了一份提纲草案，其中表示：德共如果在1923年10月里宣布起义，那“它就是想马上让脑袋搬家；”又说转入退却“是符合情况的”，“应当加以赞同。”<sup>②</sup>实质上，季诺维也夫也是站在这种立场上的<sup>③</sup>。

1月会议弄清了10月失败的许多根本原因。10月可能取得胜利的问题（假如德共动员了一切力量来举行起义）虽然没有得到解决，但德共布兰德列尔中央的投降政策，却受到了严厉的批判和谴责。

后来，布兰德列尔分子又一再地企图为自己1923年执行的政策和策略恢复名誉，但，每次都遭到了反击。共产国际第5次代表大会和德共法兰克福代表大会（1924年）详细地讨论了“德国10月”失败的原因及其教训，嗣后，德共右倾所带来的严重后果便日益明显地暴露出来了。

台尔曼在“汉堡起义的教训”一文<sup>④</sup>中写道，从推翻古诺

① 这次会议的材料请参阅：Die Lehren der deutschen Ereignisse, Hamburg, 1924.

② O. B. 庫西宁：上引著作，第6頁。

③ “共产国际”，1924年，第1期，第501頁。

④ Rote Fahne, 1925年10月25日。



政府的时刻起，“和平解决已不可能便日益明显了。两个阶级之间要进行无情的强制性的斗争，已无法加以避免”。1923年10月里，“直接的革命形势已经出现。工人阶级取得胜利的一切条件都已具备，唯一缺少的，只是一个钢铁一般的、团结一致的和广大群众具有不可分割的联系的共产党，这个党要准备并且能够把劳动群众的自发斗争统一起来，并加以组织和领导。

在决定关头，我们党的领导机构支持不住了（versagte）。共产党的领袖和社会民主党的左派一起参加萨克森政府，只有在下列场合才是正确的：这个步骤只服务于唯一的一个目的——组织革命和群众运动，服务于在全德国展开斗争。可是，正是这个目的没有留在我们党当时领导机构的视线之内。我们的领导者没有利用自己在萨克森政府中的地位展开斗争，反而利用这一点来防止斗争……。总的说来，我们党还是太不成熟了，不能防止领导机构方面的这些错误。1923年秋天，由于缺乏革命最重要的条件——布尔什维克党，革命便遭到失败了”。

皮克追溯德共战后初期的历史时，曾在“德共布尔什维克化15年所走过的道路”<sup>①</sup>一书中分析道：德国社会民主党所推行的可耻的背叛政策，在1923年挽救了德国资本的统治。但是，这件事之所以发生，是因为“德共——能够引导无产阶级取得胜利的唯一力量，具有以布兰德列尔和塔里格麦尔为首的机会主义的领导者；因为机会主义在德共的队伍里还是

<sup>①</sup> “共产国际”，1934年，第3期。

根深蒂固的；因为德共还没有用列宁主义的理论和实践武装起来。”

由此可见，1923年和1918年一样，再一次暴露了德国革命的主观因素并未成熟——缺乏一种能够完成历史向德国提出的任务、即推翻德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社会力量。

这个问题的解决，成了德共以后年代里注意的中心。